

戰略與評估

論文

董慧明

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

吳宗翰

中國推動區塊鏈技術與
數位人民幣的戰略意涵

蔡東杰、盧信吉

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之調整：
威脅平衡視角之探討

Shiau-Shyang Liou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Sharp Power



Defense
Strategy &
Assessment
Journal

Vol.10, No.2,
September 2020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 N D S R



戰略與評估

第十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 九月

Defense Strategy and Assessment Journal

Vol.10, No.2, September 2020

出版：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發行人：霍守業
主編：歐錫富
執行主編：李哲全
編輯委員：王高成、李瓊莉、李俊毅、李哲全、沈明室、林成蔚、
林文程、馬振坤、劉復國、歐錫富、蘇紫雲
（依姓氏筆劃排列）
助理編輯：陳鴻鈞
校對：陳彥廷、李哲全、鍾志東
出版企劃：胡國荃
電話：(02)2331-2360 轉 314
傳真：(02)2331-2361
電子信箱：dsaj@indsr.org.tw
院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 號
ISSN：2223-9413

本刊論文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院立場

出版源由

衡諸 21 世紀國防事務發展趨勢，為整合國防政策之專業研究能量，拓展國際交流合作，以提升整體國防思維，建構符合國家發展、最適資源配置之政策建議，國防部參酌各先進國家國防智庫運作與發展經驗，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並發行本刊。本院設立宗旨：

- 一、增進國防安全研究與分析。
- 二、提供專業政策資訊與諮詢。
- 三、拓展國防事務交流與合作。
- 四、促進國際戰略溝通與對話。

本刊係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行之綜合性政策學術期刊，旨在提供國防安全研究專家與學者之專業諮詢與討論平台，提升我國國防安全研究能量。

稿約

- 一、《戰略與評估》以探討國防事務、區域安全情勢及戰略研究等議題為宗旨，每年三、九月出刊。本刊歡迎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踴躍投稿。
- 二、論文請依一般學術論文規格撰寫，使用註解，說明來源，並以另紙書明中英文題目、姓名，兩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及四個關鍵詞。文長以一至二萬字為宜。來稿請附電子檔。來稿請一併示知服務單位、職稱、主要學經歷、研究專長、聯絡地址和電話。
- 三、本刊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均須經本刊正式審稿程序，本刊對來稿有編輯與刪改權。
- 四、請作者自留原稿影本或電子檔，來稿未刊登者，本刊恕不退件。來稿一經刊載，除贈送作者本刊外，另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本刊恕不刊登翻譯著作。
- 六、本刊所載文章為作者個人之意見，僅供學術研究發展之參考，不代表本單位及任何機關政策或立場。
- 七、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 八、來稿如有違反著作權法，作者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另本刊不接受作者申訴。
- 九、稿件請以掛號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 號『戰略與評估』編輯部」或電子郵件寄至 dsaj@indsr.org.tw。

戰略與評估

第十卷第二期

目錄

論文

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	董慧明	1
中國推動區塊鏈技術與數位人民幣的戰略意涵	吳宗翰	38
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之調整：威脅平衡視角之探討	蔡東杰 盧信吉	62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Sharp Power	Shiau-Shyang Liou	88

作者簡介

- 董慧明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博士，現任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大陸問題、兩岸關係、中共軍事、國際關係、軍事政治學。
- 吳宗翰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國研究博士，現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中國政治、資訊安全與衝突研究。
- 蔡東杰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任法政學院院長、日韓總合研究中心主任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東亞區域研究、中國外交戰略、兩岸關係等。
- 盧信吉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東亞區域安全、朝鮮半島問題、日本外交等。
- Shiau-Shyang Liou Shiau-Shyang Liou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middle asia politics,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

董慧明

副教授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摘 要

軍事戰略決定軍隊建設，軍隊建設重點在覓得人才。本文聚焦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認為從近岸到遠海，中共在海軍建設不同時期對防禦、護衛、防衛亦有不同的要求和詮釋。其中，「遠海防衛」戰略對於指導中共海軍成為防衛型部隊，取得制海權至為關鍵。為能實現戰略目標，研究發現中共海軍正積極發展航艦戰鬥群戰力。儘管目前受限於航艦動力性能、艦載機種類等因素影響，惟中共仍然要求相關國有軍工企業設法突破海工軍備技術限制，並且著力於海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和國防科技人才培育。從中共用兵思維以觀，航艦戰鬥群戰力未來將以反介入／區域拒止為優先設想，削弱美軍和外軍在東海、臺海、南海，以及利益攸關區的軍事影響，進而衝擊區域安全局勢和臺灣安全，須審慎評估和因應。

關鍵詞：藍水海軍、遠海防衛、航空母艦、艦載機

A Study o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Aircraft Carrier Power Construction

Hui-Ming T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ilitary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Military strategy deter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my, and the focus of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the search for talent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 aircraft carrier power, and believes that from the "near coast" to "far se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for guarding and defense at different periods of naval construction. Among them, the "far-seas operation" strategy is crucial to guide the PLAN to become a defensive force and acquire command of the sea.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we found that the PLAN is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The PLAN currently limit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power performance, carrier-based aircraft types and other factors, but the CCP still requires relevant state-owned military-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make a breakthrough at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s of maritime engineering armaments, and focus on naval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personnel and national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cul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AN military thinking, the power strength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will be based on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in the future, weakening the military influence of the U.S. and foreign forc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Taiwan Strait,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reas of interest, and thus impact the regional security and Taiwan's security, which must be carefully evaluated and responded to.

Keywords: *Blue-water Navy, Far-Seas Operations, Aircraft Carrier, Carrier-based Aircraft*

壹、前言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中共第一艘自製航艦「山東號」（舷號：17）於海南省三亞軍港交付海軍正式服役。連同於 2012 年 9 月 25 日正式入列海軍的第一艘航艦「遼寧號」（舷號：16），中共聲稱海軍進入「雙航母」時代。¹ 再加上刻正陸續換裝的各型驅逐艦、護衛艦、兩棲攻擊艦、快速戰鬥支援艦、潛艇等主力戰艦，中共因具備航艦等各型艦艇自主研製能力，並且著力於軍隊各軍、兵種機械化、資訊化之新型戰力改革轉型，其軍備發展現況和未來動向備受各方關注，攸關印太區域安全格局的穩定。

中共海軍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思維，可從檢視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得到明證。該文件內容直指，要按照「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要求，將海軍轉型成為具備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以及綜合保障能力之遠海防衛部隊。² 有別於 2015 年公布《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版本時採用的「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用語，³ 中共海軍必須設法增進海上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才有助於達成新的戰略目標。其次，將中共海軍現代化對應於 2015 年末進入實質進程的「國防和軍隊深化改革」（以下簡稱：軍改），可見近年來除了持續加速水面艦艇部隊、潛艇部隊、航空兵、陸戰隊等兵種之軍備換裝外，有關繼續建造其他航艦的能力、作法、進度、性能、列裝服役時間以及戰力形成等情況，更是各界析察「遼寧號」、「山東號」航艦動態外，亦須同步掌握之焦點議題。

中共擁有航艦、自建航艦，不僅是海軍實現「藍水海軍」之重要指標，⁴ 長久以來散見於各類海洋安全和權益等相關著作中的中共「航

¹ 〈中國進入「雙航母時代」〉，《三亞日報》（海南省），2019 年 12 月 18 日，版 2。

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index.htm>。

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⁴ 以海洋地理學區分海軍的作戰類型，可區分在江河作戰的「內河海軍」、在領海、毗鄰區、專屬經濟區範圍附近活動的「黃水海軍」、突破中近海海域，到達大洋邊緣的「綠水海軍」，以及不受到任何海域限制，能夠航行於遠洋，長時間執行戰鬥和非戰鬥任務的「藍水海軍」。見宋忠平，《大國武器 2.0》，（北京市：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 年），頁 114。

母夢」更是國家綜合國力向上提升的象徵。⁵ 因此，早在 1970 年代，時任中共海軍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華清少將就曾對航艦進行專題論證，提交工程方案。至 1982 年 8 月 28 日，劉華清擔任中共海軍司令員，著力於海軍部隊現代化轉型後，航艦亦有了明確的發展期程構想。⁶ 儘管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尚不足以支撐航艦發展，惟中共海軍仍持續對航艦戰備價值、建設經費、技術、預研等問題進行相關研究和論證。⁷ 當前中共海軍積極投入多種海洋作戰平臺，以及航空兵、陸戰隊、岸防部隊等建設，諸般作為的目標即在建立航艦戰鬥群以及增進海洋遠程兵力投射之軍事能力。

當中共海軍軍事戰略已令其各兵種部隊向外擴張（expansion）發展，有關各型艦艇及配套產品研發、造修船、機等海工軍備的國防科技工業運作機制，則成為戰略目標實現的關鍵。以 2019 年 10 月 14 日成立的「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Limited, CSSC）（以下簡稱：中船集團）為例，即為中共海軍武器裝備科研、設計、生產、試驗、保修的主要供應單位。無論是「遼寧號」、「山東號」，或是尚在建造中的航艦，其主戰裝備的科研、生產，皆和中船集團等中國大陸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現況密切相關。⁸ 檢視公開資料可知，當前隸屬中船集團之 10 家軍艦造船廠主要分布於上海、大連、天津、廣州、武漢、重慶等地，成為觀察中共海軍艦艇建造之要處。此外，現已躋身全球十大軍工企業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Limited, AVIC）（以下簡稱：中航工業）亦為當前中共海軍航空兵主力殲擊機、轟炸機、殲轟機、反潛機、電戰機、預警機，以及直升機

⁵ 相關文獻可參見：宋宜昌、遠航，《駛向深藍：中國艦船工業騰飛紀實》，（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330-335；沙志亮，《刀尖上的舞者：「航母戰鬥機英雄試飛員」戴明盟的故事》，（太原：希望出版社，2017 年），頁 97-107；陳文中，《中國航母》，（北京市：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年）。

⁶ 劉華清曾被國外媒體稱為中國「現代海軍之父」和「中國航艦之父」。他認為航艦和核潛艇是海軍建設的核心問題，在他擔任海軍司令員期間，積極籌劃海軍的航艦建造方案。見賀海輪編，《延安時期著名人物》，（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248-250；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2007 年），頁 480。

⁷ 韓永，〈中國航母計畫出臺始末〉，《黨員文摘》（重慶市），第 10 期，2011 年 10 月，頁 55-56。

⁸ 天鷹，〈2017 大海軍序曲〉，《艦載武器》（鄭州），第 2 期，2018 年 2 月，頁 14-19。

之供應單位。⁹ 這些攸關中共海軍航艦戰鬥群戰力形成和兵力投射能力的國防科研自主情況亦應是瞭解中共航艦戰力建設不容忽視的面向。

中國大陸的海岸線長 1.8 萬公里，聲稱有近 300 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域，約占全部國土面積的 23.8%。¹⁰ 當維護海防安全和海洋權益成為中共海軍主要的任務使命，必須解決海上作戰半徑、機動作戰能力、海上戰區制空能力，以及海上支援、保障能力等可能造成「有海無防」之限制問題。因此，發展航艦是中共強化國家海洋優勢和增進海軍實力的有效處方。儘管目前中共航艦戰鬥群尚未形成有效戰力，惟對近海周邊國家仍然構成嚴重威脅。¹¹ 航艦可作為海上活動基地，它可遠離海岸，長期游曳於洋面；航艦也是一座可在海上移動的飛機場，搭配各型艦艇和飛行載具遂行軍事任務，它具有強大的制空、制海攻防能力，是世界主要大國因應戰爭型態和適應戰場環境需求的重要軍備。此外，當中共取得航艦研製能力的自主技術基礎條件後，在中國大陸國力和財政支出允許之下，未來勢將建造其他航艦、新型艦艇，以及性能更佳的艦載機。因此，從長遠發展趨勢而論，掌握中共海軍航艦戰力發展現況、限制因素和未來取向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當前服役於中共海軍的航艦及其相關機艦為主要研究對象，分別從海軍部隊建設和艦艇建造能力兩方面，回答欲實現「遠海防衛」戰略所遭遇的限制因素。此外，針對中共海軍在育才、訓才以及戰力部署所面臨的發展難題，亦從相關制度的調整、改革，評估其解決之道。

貳、中共的「遠海防衛」戰略和航艦籌建

中共海軍航艦的籌建發展歷程，和其軍事戰略思維息息相關。從近岸走向遠海；從護衛延伸為防衛，戰略思維的轉變，決定了海軍部隊現代化建設的主要方向。尤其在面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大國及其盟國正積極構建環伺中國大陸的防堵勢力，經濟、安全權益較勁愈趨劇烈，能夠在短時間內將軍隊轉型為面向國際的外向型軍隊，且不再自居於本土防衛性質，成為中共亟欲改變的問題核心。因此，為了

⁹ 李政編，《中央企業技術創新報告 2011》，（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年），頁 165。

¹⁰ 王海運，《國際風雲與中國外交》，（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307。

¹¹ 歐錫富，〈中國擱置建造核動力航艦〉，《國防安全週報》，第 77 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頁 1。

遏制任何來自海上對中國大陸海洋權益和安全之軍事威脅或武裝衝突等軍事任務所需，中共以海軍必須擴大防衛縱深戰略任務為設想，結合軍種功能特性，制定以藍水為戰略重點的國家海軍力量。¹²

一、遠海防衛戰略的理路與實際

「遠海防衛」戰略的理路和中共在《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提出的「海外利益攸關區」(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概念有著密切關聯。¹³ 儘管在這份官方文件中，中共宣稱要按照積極防禦戰略方針，透過國際安全合作方式維護中國大陸海外利益安全。惟在構建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方面，中共亦強調海軍要逐步實現由「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¹⁴ 其目的就是必須具備能夠保衛攸關中國大陸海外能源資源、戰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機構、人員、資產安全等問題所涉之海外利益區域。¹⁵ 因此，無論是學者專家的個人研究，或是來自智庫、官方等研究單位之報告，皆先後指出當中國大陸的經濟和世界緊密融合，不僅意味著機遇，更顯示其脆弱性。其中，外貿海上運輸、石油進口、海域資源、海外投資等皆是驅動海軍遠海戰略改變的主要因素。¹⁶ 而包括確保海上交通線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 安全，滿足人道援助及災難防救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 等非戰爭任務需求，¹⁷ 以及增進遠程精確打擊和武力投射 (power projection) 能力，¹⁸ 已成為中共海軍建設的具體戰略目標。

¹² 房功利、楊學軍、相偉，《解放軍史鑒：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史》，（青島：青島出版社，2013年），頁428。

¹³ “海外利益攸關區(haiwai liyi youguanqu):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Daily*, May 28,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5-05/28/content_20840858.htm.

¹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http://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¹⁵ 〈中國新國防白皮書提海外利益攸關區戰略〉，《BBC 中文網》，2015年5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26_china_defence_white_paper。

¹⁶ Nan L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in 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31.

¹⁷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January 15, 2019, p. 65.

¹⁸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1, 2020,

其次，學者 Andrew S. Erickson 在〈中國海上力量藍圖〉（China's Blueprint for Sea Power）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除了在中共國防白皮書中提及要改變「重陸輕海」傳統思維外，在 2016 年 3 月公布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內容中，亦將建立自身海上力量，積極推進「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撐建設列為重點項目。這些皆預示著中共軍事戰略前沿和海軍建設將從本國領土向外圍擴張、從陸地延伸至海洋。¹⁹ 為了梳理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理路，以下區分「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遠海護衛」，以及「近海防禦，遠海防衛」四個時期，深入分析海軍軍事戰略發展演變的特點及其差異。

（一）「近岸防禦」戰略

自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共海軍建軍至 1970 年代末，以防禦海岸、抵禦海上外來侵略，並且協助岸上地面部隊戰鬥，是海軍「近岸防禦」戰略的主要特點。在此軍事戰略發展階段，中共海軍的任務是在約 40 哩內的近岸，依託岸上兵力和海上島嶼，防止國家遭到大規模海上登陸攻擊，捍衛海防。其中，按照「空、潛、快」原則所建立的海軍力量，主要是指著重發展陸基海軍航空兵、潛艇、魚雷快艇和近海艦艇，並且發展海上游擊戰、破襲戰戰術，在海戰中強調靈活有效打擊來犯之敵，而非以奪取制海權為目標。²⁰

（二）「近海防禦」戰略

1979 年 6 月，鄧小平曾提出「近海作戰」戰略指導方針。²¹ 中共海軍按照此一海上積極防禦戰略指導，於 1985 年 12 月由劉華清提出「近海防禦」戰略，並且認為中共海軍必須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來認識「近海」，是在區域型積極防禦戰略下，打造海軍近海作戰空間為主要特色。他在擔任海軍司令員任內積極整頓和建設，認為海軍的任務已由協同陸軍、空軍進行反侵略戰爭，轉變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維護海洋權益、應付海上局部戰爭、遏止和預防來自海上的

pp. 44, 78.

¹⁹ Andrew S. Erickson, "China's Blueprint for Sea Power," *China Brief*, Vol. 16, No. 11, July 2016, pp. 3-4.

²⁰ 石家鑄，《海權與中國》，（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16。

²¹ 中央軍委辦公廳，《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論述選編》，（北京市：八一出版社，1993 年），頁 43-44。

侵略。²² 基此，為了因應周邊海域的海上局部戰爭或突發衝突，中共海軍的作戰海域須外擴至第一島鏈，以及沿著該島鏈的外沿海域，包括了黃海、東海、南海、南沙群島及臺灣、沖繩島鏈內外海域。劉華清亦認為，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和科技能力提升，海軍的作戰海域還要逐步擴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島鏈。²³ 有關劉華清提出的海軍戰略和建軍構想彙整如表 1 所示。

表1 劉華清任海軍司令員後的海軍戰略與建軍構想

項次	時 機	海 軍 戰 略 和 建 軍 構 想
1	1982 年 10 月 5 日 海軍首長集體辦公會議	整頓海軍直屬機關，置重點於院容、軍容、風紀、工作秩序。
2	1982 年 12 月 14 日 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議	提出要安定團結，齊心協力開創海軍建設新局面。
3	1983 年 1 月 5 日 海軍工作會議	研究《海軍現代化建設規劃綱要》，提出海軍近三年的建設規劃。
4	1983 年 2 月 7 日 南海艦隊機關科以上幹部會議	提出海軍改革問題，將體制編制、教育訓練、裝備科研、裝備修理、後勤保障、政治工作、基層建設列為後續 5 年改革重點項目。
5	1983 年 3 月 9 日 海軍黨委常委會	通過《貫徹第十二次全軍院校會議精神加強海軍院校建設的決定》，著重海軍複合型人才培養。
6	1983 年 7 月 9 日 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工作會議	組建海軍裝備論證研究中心。
7	1984 年 1 月 11 日 海軍裝備技術工作會議	考慮近海作戰，著手海軍裝備現代化建設，要從第一代向第二代過渡，並以潛艇和飛機為主力，加大戰鬥艦艇作戰半徑，主戰裝備在戰役戰術上形成體系。

²²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37-439。

²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34。

8	1985 年 8 月 28 日	頒布《海軍後勤保障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實施海軍後勤體制改革。
9	1986 年 1 月 25 日 海軍黨委擴大會議	確立「近海防禦」海軍戰略： 1、屬於防禦性質的區域防禦型戰略。 2、第一島鏈和沿該島鏈的外沿海區，以及島鏈以內的黃海、東海、南海海區為作戰海區，並逐步擴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島鏈。 3、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及海洋權益。 4、任務區分為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前者包括臺灣在內的國家統一；後者包括保護己方海上交通運輸線。
10	1987 年 2 月 2 日	中共海軍黨委審定《海軍2000年前發展設想和「七五」建設規劃》、《海軍2000年前裝備發展規劃》。
11	1982 至 1988 年	組織核潛艇各項試驗和訓練，並考量第二代核潛艇的研製問題。
12	1987 年 3 月 31 日	向共軍總部機關彙報關於航艦、核潛艇海軍裝備規劃問題。其中對航艦發展的構想設定為：「七五」開始論證，「八五」搞研究，對平臺和飛機的關鍵課題進行預研，2000年視情況上型號。
13	1988 年 1 月 29 日 海軍黨委六屆四次全會	強調海軍遠航和兵種協同訓練問題，針對未來海戰需要，提出採取錨泊、移地駐訓和出島鏈遠航等多種形式，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和協同作戰能力。

資料來源：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13-496。

（三）「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

習近平主政至今，中共先後發布 4 部國防白皮書，其中在海軍軍力建設和發展方面，「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海軍戰略是於 2015 年

5 月公布之《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被正式提出。除了延續強調嚇阻臺獨、解決海洋爭端和對美國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等攸關國土海疆安全的「近海防禦」戰略，中共亦著眼於海洋權益，從維護海外利益安全、海外利益攸關區的主張，將海軍活動的範圍涵蓋太平洋和印度洋。其中，「遠海護衛」的重點主要在於保護南海權益和突破「麻六甲困境」之海洋運輸線，並以海軍遂行護航等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以及國際安全合作為主要表現。²⁴「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並未超脫中共積極防禦指導方針，海軍在此戰略時期得益於「遼寧號」航艦，以及新型海基艦艇、艦載機等武器軍備相繼成軍，海上作戰力量大幅提升，也奠定遠航能力基礎。

（四）「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

中共自召開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設海洋強國」戰略以來，面臨的海事爭端和影響海洋安全形勢的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習近平基於總體國家安全觀，²⁵曾提出相關重要論述（如表 2 所示）。中共海軍作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武裝力量，於 2019 年再進一步地將軍事戰略提升至「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層次，主要是指為了抵擋來自外部的武力攻擊，同時必須保衛本國的國家安全及其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所採取的自衛作戰能力。²⁶儘管「近海防禦」任務要求不變，惟「遠海防衛」越發凸顯中國大陸面向遠海的制海權和海外利益，海軍必須更著重海上戰略投送能力建設，從遠海防禦型部隊向防衛型部隊轉型，逐步形成強大的近海綜合作戰能力和較強的遠海防衛作戰能力，²⁷以有效遂行海上多樣化軍事任務。

實現遠海防衛戰略，中共必須設法將海軍轉型成為一支不受海域

²⁴ Xu Qiyu, "Multipolar Trends and Sea-Lane Security," in Peter A. Dutton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Beyond the Wall: Chinese Far Seas Operations* (Newport, Rhode Island: U.S. Naval War College,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2015), pp. 30-31; 閻立金、張龔，《人文海洋》，（北京市：新華出版社，2018 年），頁 125。

²⁵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24。

²⁶ 閻雪昆、段廷志，〈國際法視野下的遠海防衛〉，《國防》（北京市），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79-82。

²⁷ 周立存，《強軍興軍的科學指南》，（北京市：國防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15。

限制，具有遠征能力的「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²⁸而在實際軍隊建設方面，中共海軍建立遠海機動作戰力量正積極籌建包括航艦、大型驅逐艦、快速戰鬥支援艦等大型水面艦艇，並嘗試多機種之艦載機、直升機起降，將防衛範圍向空中擴展。此外，包括遠海指揮管制系統等資訊作戰能力、遠海綜合保障能力亦為發展重點。²⁹按照中共軍力現代化三階段戰略期程，至 2049 年時，要將海軍打造成為具備遠海防衛能力之海上力量。屆時中共海軍的水面艦艇、常規和核子潛艇、主戰戰機及其相應之武器軍備、通信系統必須追上世界先進國家軍力。³⁰中共海軍在未來被定位於能夠有效防衛國家領土主權、海洋權益，擺脫戰略防禦縱深短淺，並且突破中國大陸海域和太平洋、印度洋聯繫等受制於人的現狀局面。³¹

表2 習近平「海洋強國建設」和海洋權益相關論述彙整表

項次	時	機	主 要 論 述 內 容
1	2012年11月8日主持起草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		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
2	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設海洋強國」第八次集體學習		做好應對各種複雜局面的準備，提高海洋維權能力，堅決維護中國海洋權益。
3	2013年10月3日在印尼國會發表《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講話		中國大陸願和東協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²⁸ Yoji Koda, "China's Blue Water Nav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7, p. 6,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Koda_BWN.pdf?mtime=20170320220424.

²⁹ 鄒舟，〈適應未來作戰需要加強海軍遠海防衛作戰力量建設〉，《國防大學學報》（北京市），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44-45。

³⁰ Thomas M. Oliver, "The Observable 'Cult of the Defensive': PLAN Strategic Shift Toward a Blue Water Navy and American Strategic Percep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8, No. 4, August 2018, pp. 216-219.

³¹ 周碧松，〈深藍海洋的激烈爭奪〉，（北京市：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66-267。

4	2014年6月28日中國大陸第五次全國邊海防工作會議	周密組織邊境管控和海上維權行動，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築牢邊海防銅牆鐵壁。
5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	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
6	2018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南海海域海上閱兵講話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國家海外利益不斷拓展，維護中國海外利益安全問題更加凸顯。海軍是最應該、最適合走出去的戰略力量，是保護國家海外利益安全的戰略依託和保底手段。
7	201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	著力推動海洋經濟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統籌海洋開發和海上維權，加速推進南海資源開發服務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建設。
8	2019年4月23日會見出席中共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外方代表團團長	提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呼籲各國應堅持平等協商，完善危機溝通機制，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推動涉海分歧妥善解決。

資料來源：董慧明根據公開文獻資訊自行彙整。

從「近岸防禦」到「近海防禦」；再從「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至「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檢視中共海軍在海上採取「防禦」、「護衛」、「防衛」三種不同涵義之軍隊建設特點。三者之間的最大差異除了攻守海域範圍的不同，更關鍵的則是中共海軍在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以及爭取制海權戰略優勢所必備之艦艇和艦載機等軍備性能，以及實現戰略目標的所需人才。以此檢視中共2019年《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容直指「按照近海防禦、遠海防衛的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的具體作為，³²即可印證無論是海上作戰力量、後勤保障能力，或是海上護航、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遂行海外撤僑、海上維權等行動，中共海軍的遠海防衛地理範圍，已擴大至攻擊國、特定第三國之領海、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大陸棚，以及公海海

³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index.htm>。

域；在軍備性能方面，則以遠程精準打擊、核嚇阻與反擊能力為要，並且能夠和其他軍兵種進行海上聯合作戰。這些實際的軍隊建設作為，皆在滿足於有限時間內，迅速取得海、空空間上的主導權，形成對敵戰力優勢之戰略任務需求。

二、中共籌建航艦的歷程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海外利益攸關區安全向來是中共海軍戰力建設不變的目標。劉華清在其回憶錄中直言：「航空母艦主要是用於解決對臺鬥爭需要、解決南沙群島爭端和維護海洋權益等方面的任務，平時還可以用於擴大維護世界和平的政治影響」。³³ 而研製、部署先進艦艇、飛機、武器系統，構建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部署，阻止美軍等外國武力介入東海、臺海、南海潛在的戰爭衝突亦為建立現代化海軍之戰略要務。可見航艦是中共海軍實現戰略目標之重大指標裝備，也是海軍航空兵自岸基延伸至海基國防能力的關鍵。³⁴ 在確立了明確的遠海防衛軍事戰略思維後，中共籌建航艦的歷程可溯及 1970 年代建立「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時期，³⁵ 在毫無任何建造經驗，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尚無法全力滿足研發所需經費條件下，汲取外國經驗，向外國採購海軍退役航艦成為具體的起步作為。中共的設想是，在具備自建航艦、創新航艦能力前，必須先設法獲得航艦成品。

除了前述打造「藍水海軍」的關鍵推手劉華清上將外，檢視公開資料可知，中共先後於 1985 年自澳洲購得皇家海軍使用的「墨爾本號」（HMAS Melbourne R21），以及已轉做為軍事主題公園用途的前蘇聯海軍退役之「明斯克號」（Minsk）（位於江蘇南通）、「基輔號」（Kiev）（位於天津市濱海新區）。³⁶ 這些退役航艦透過中國大陸艦艇科研和建造單位「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技術，一一被拆解，成為獲取航艦建造方式的技術知識主要來源之一。³⁷ 此外，向國外購買航艦建造設計圖，曾經也是中共籌建航艦的設想方

³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79。

³⁴ 〈中國海軍首支艦載航空兵部隊組建〉，《中國新聞》（北京市），2013 年 5 月 11 日，版 2。

³⁵ 張良福，《聚焦中國海疆》，（北京市：海洋出版社，2013 年），頁 313。

³⁶ 周明，〈為什麼選擇「瓦良格」號，歷數中國買過的航母〉，《國家人文歷史》（北京市），第 17 期，2019 年 9 月，頁 78-83。

³⁷ Andrew S. Erickson and Andrew R. Wilso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Dilemm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9, No. 4, Autumn 2006, pp. 12-45.

案。包括西班牙「國營巴贊造船公司」(Empresa Nacional Bazán)、俄羅斯「涅夫斯卡耶設計局」(Nevskoye Design Bureau)、烏克蘭「尼古拉耶夫造船廠」(Nikolayev Shipyard)皆是中共密切接觸探詢過的對象。儘管各國基於航艦建造技術輸出、智慧財產權的價格談判等方面多有疑慮，惟從結果而論，中共在聯繫諮詢過程中，仍然獲得航艦建造之相關技術資訊。吾人今日熟知的「遼寧號」，在其改造完成前，即為烏克蘭政府出價 2,000 萬美元未完工的「瓦良格號」(Varyag)航艦，正是中共對外國海軍退役之老艦進行研究、續建，摸索航艦設計基礎能力明例。³⁸

中共設法籌建航艦，曾因國家總體經濟實力難以支撐龐大的研製經費，而受限於「民間熱、官方冷；軍方熱、中央冷」，以及軍方內部「海航」、「海潛」兩個派系之間的理念之爭等因素的干擾。³⁹然而，從發展主軸而論，中共並未放棄航艦建造計畫。無論是組團前往外國參訪觀摩，或是邀請外國專家授課，自 1970 年代組織航艦專題論證，上報中共中央工程方案至 2004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准海軍、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等單位聯合向總裝備部、國防科工委提交發展國家航艦綜合論證報告，中共正式啟動航艦建造工程計畫，工程代號「048 工程」。⁴⁰有關中國大陸航艦發展的重要歷程事件彙整如表 3 所示。

表3 中國大陸航艦發展歷程

時間	重 要 歷 程 事 件
1970 年 5 月	「海軍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華清奉中共中央軍委會指示，著手航艦專題論證，海軍裝備部亦召開首次航艦論證工作座談會，上報工程方案，惟該項目後因「文革」因素無法落實。
1980 年 5 月	中國大陸國務院前副總理耿飴訪美，共軍副總參謀長劉華清陪同登上美軍「小鷹號」(USS Kitty Hawk CV-63)航艦參觀。

³⁸ Andrew Scobell, Michael McMahon and Cortez A. Cooper III,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Program: Drivers,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8, No. 4, Autumn 2015, pp. 64-79.

³⁹ 王信力，〈中共海軍發展航母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52，58。

⁴⁰ "New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Vayu Aerospace and Defence Review*, No. 1, Jan/Feb 2014, p. 167.

1985 年 開始	中國大陸艦艇科研和建造單位開始研究外軍退役航艦技術和設計。
1987 年 3 月	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向中共中央軍委會匯報海軍航艦、核潛艇裝備規劃兩大問題，對共軍總參謀部、國家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機關產生重大影響。
1987 年 4 月	中共海軍決定開辦飛行員艦長班，先期培養航艦及其戰鬥群指揮人才。
1998 年 3 月	中國大陸以私人購入方式，成功獲得「瓦良格號」，並於2002年3月拖回中國大陸「大連造船廠」。
2004 年 8 月	續建「瓦良格」號航艦工程啟動，代號「048工程」，確立航艦發展「三步走」戰略：第一，先用10年建造2艘中型航艦；第二，再用10年建造2艘大型航艦；第三，視情況發展大型核動力航艦。
2012 年 9 月	中共正式命名改造後的航艦名稱為「遼寧號」，並且在大連交付海軍入列服役。
2013 年 11 月	中共首艘國產航艦工程開工。

資料來源：董慧明根據媒體公開資訊自行彙整。

參、中共海軍航艦戰力發展

航艦是海上戰場上最重要的戰略性武器之一，一旦形成航艦戰鬥群後，更是集防空、反艦、反潛以及對岸攻擊作戰能力於一體之制勝戰力。它最早的發展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百年的發展經歷過傳統和現代戰爭，累積出多種類型和豐富的技術經驗。從擔負的任務而論，航艦有攻擊、反潛、護航，以及多用途等種類之分；從排水量和運載量區分，包括了輕型（不超過 3 萬噸）、中型（3 萬噸至 6 萬噸）和重型（6 萬噸以上）航艦。⁴¹ 此外，航艦的作戰體系除了航艦本身及隨行艦艇外，艦載機的武器性能、適應海象能力則決定了海戰向空中延伸的立體空間。因此，各國在設計、建造航艦前，必須詳實評估用途和搭配之戰機、艦艇。檢視中共海軍「遼寧號」、「山東號」航艦的用途和排水量大小，屬於多用途的中型航艦，其艦載機主要機種則是從海軍航空兵在陸上基地使用的主力機種加以改良而成（例如：

⁴¹ 〈首艘國產航母入列〉，《青年時報》（浙江省），2019 年 12 月 18 日，版 A8。

殲-15 戰機)。為了能夠深入探討中共航艦發展現況，分別從現役航艦設計建造、艦載機兩方面分析。

一、現役航艦設計建造

探討中共航艦設計建造議題，最主要的核心單位包括「中船集團」⁴²和「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又名 701 研究所）。首先，在「中船集團」成立前，主要是以「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船重工）、⁴³「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船工業）兩家國有造船軍工企業的營運模式，⁴⁴負責海軍各型艦艇的研製工作。俟兩大集團有限公司聯合重組「中船集團」後，包括承製「遼寧號」、「山東號」之「大連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大船集團），⁴⁵以及作為中共海軍第三代驅逐艦、護衛艦主要產製單位，以及正在承製 003 型的中共第 3 艘航艦之「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江南造船），⁴⁶皆成為「中船集團」下之直屬（控股）企業。其一北一南的配置分工，凸顯中共透過軍工國企重組，將研製軍用船舶的人員、技術、料件成本進行資源整合，有利於航艦自

⁴² 中船集團現有 147 家科研院所、企業單位、上市公司，資產總額計 7,900 億元，員工 31 萬人。該集團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造修船基地，具備完整的船舶和配套產品研發能力，能夠自行設計建造符合全球船級社規範、滿足國際通用技術標準，以及安全公約要求之船舶海工裝備。見〈「南北船」合體起航〉，《北京青年報》（北京市），2019 年 11 月 27 日，版 A9。

⁴³ 該公司以軍用船舶和科研能力為主要特色。擁有國家工程實驗室 4 個、國家級研發中心 3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1 個、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2 個、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 10 個、國防科技工業創新中心 2 個、國家創新基地 2 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 13 個、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 1 個。見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2018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北京市：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2019 年），頁 30。

⁴⁴ 除了中共海軍主戰艦艇和軍輔船裝備外，亦以民用船舶製造能力見長。擁有 10 家科研院所，產品種類涵蓋普通油船、散貨船、化學品船、客滾船、大型集裝箱船、大型液化氣船、大型自卸船、高速船、液化天然氣船、超大型油船（VLCC）及海洋工程等各類民用船舶與設施。見本書編委會編，《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年鑒 2015 版》，（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 年），頁 391。

⁴⁵ Andrew Scobell, Michael E. McMahon, Cortez A. Cooper III, and Arthur Cha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Program: Drivers,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in Andrew S. Erickson, ed.,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An Ambitious and Uncertain Course*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6), p. 252.

⁴⁶ "Chinese State-Owned Shipbuilder Swaps Assets Among Units,"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April 1, 2019,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ese-state-owned-shipbuilder-swaps-assets-among-units/>.

製能力和效率的提升，⁴⁷ 成為中共海軍軍備科研、設計、生產、試驗、保障的主要單位。

其次，負責研究、設計、開發航艦總體系統工程的核心科研事業單位「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同樣改隸「中船集團」體系。該中心位於湖北省武漢市，儘管不是位在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發展船舶工業，卻是中共海軍軍備最重要的研究機構和製造基地。除了兩艘現役航艦外，其主力戰艦的設計方案皆出自於該中心。中共借鑑美國研發神盾戰鬥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期間在紐澤西州穆爾斯鎮（Moorestown）麥田中建造水泥版的巡洋艦經驗，將「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打造成一座陸上的水泥航艦試驗模型，進行航艦艦島艙室、艦載機、機庫等尺寸之複雜計算，亦針對雷達電子裝備、電纜電路鋪設配置、艦載武器、艦載機電磁彈射技術等研發測試。該中心的艦島建築物本體採用海軍灰色塗裝，搭建和 052B 型驅逐艦相同的全封閉式桅杆結構，同時加裝相似的雷達天線，其目的就是模擬成為航艦測試的平臺，進行電磁兼容性能和通信電子設備安裝位置之測試評估。⁴⁸ 中共選在武漢市成立「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主要考量除了該市長久以來是中國大陸國防科技工業發展重鎮，資源、經驗豐富，更重要的是在內陸地區進行重要軍備研發，有助於國防科技機敏資訊或測試項目的隱密安全性提升。

中共啟動航艦改造、自製工程以來，歷經預先研究、總體系統立項論證、總體系統方案研究設計、總體系統工程研製、總體系統試驗定型量產、總體系統使用階段，⁴⁹ 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相繼完成「遼寧號」、「山東號」兩艘現役航艦。儘管官方、軍方尚未對外承認正在建造第 3、4 艘航艦，惟從中國大陸網民在網路上公開的相片資訊和美國的衛星偵照可知，位於上海市的「江南造船」已經接下航艦建造訂單，按照工期進度展開新階段的航艦自製任務（如表 4 所示）。⁵⁰

⁴⁷ 〈「南北船」合體，中國問鼎海洋強國〉，《大公報》（香港），2019 年 11 月 27 日，版 A11。

⁴⁸ 陳文中，《中國航母》，頁 62。

⁴⁹ Kevin Pollpeter and Mark Stokes, "China's Military Shipbuild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System," in Andrew S. Erickson, ed.,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An Ambitious and Uncertain Course*, pp. 180-181.

⁵⁰ Greg Torode and Ben Blanchard, "Exclusive: Images show construction on China's third and largest aircraft carrier-analysts," *Reuters*, May 7,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military-carrier-exclusive/exclusive-analysts-images-show-construction-on-chinas-third-and-largest-aircraft-carrier-idUSKCN1SD0CP>.

表4 中共航艦性能及建造計畫彙整表

比較項目	航 艦 型 號		
艦 型	001	002	003
智慧產權	以蘇聯「瓦良格」號為基礎改造	自主研製	自主研製
建造船廠	大船集團	大船集團	江南造船
艦 名	遼寧號	山東號	N/A
舷 號	016	017	N/A
艦體尺寸	長：300公尺 寬：70公尺	長：315公尺 寬：75公尺	N/A
甲板面積	約21,000平方公尺	約23,000平方公尺	N/A
動 力	常規	常規	常規
滿 載 排 水 量	67,000噸	70,000噸	85,000噸 (預判)
續 航 力	約7,000浬	約8,100浬	N/A
擔負任務 和 定 位	多用途（以科研、 試驗、訓練為主）	多用途 （以作戰為主）	多用途 （以作戰為主）
飛行甲板	滑躍	滑躍	電磁（預判）
艦 載 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4架殲-15 ● 4架直-18J預警直升機 ● 6架直-18F反潛直升機 ● 2架直-9C搜救直升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6架殲-15 ● 4-6架直-18J預警直升機 ● 6-8架直-18F反潛直升機 ● 2-4架直-9C搜救直升機 	N/A
艦載武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座海紅旗-10防空飛彈 ● 3座H/PJ-11型11管30公釐艦砲 ● 2座10管反潛火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座海紅旗-10防空飛彈 ● 3座H/PJ-11型11管30公釐艦砲 ● 2座12管反潛火箭 	N/A
雷達系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82型三座標雷達 ● 346B型相控陣雷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82型三座標雷達 ● 346B型相控陣雷達 	N/A
服役時間	2012年9月25日	2019年12月17日	建造中

附註	據網路公開資訊顯示，中共第4艘航艦（常規動力）可能於2021年在「江南造船」開始興建、第5艘航艦（核子動力）已設計完成，預劃在「大船集團」興建，惟受限於技術和資金，建造計畫暫時擱置。考量上述資訊並非官方或軍方所公布，真實性猶待查證，故本文不列入探討。
----	---

資料來源：董慧明根據媒體公開資訊自行彙整。

將「遼寧號」、「山東號」兩艘航艦做一比較，儘管兩艦在排水量、主尺寸、艦載機數量等方面差異不大，惟「山東號」航艦在艦橋、飛行甲板、機庫、飛機和彈藥升降機、自衛系統、動力裝置、雷達設施、資訊和電子設備等方面確有優化和升級。⁵¹ 因此，中共在航艦自製能力方面，已逐漸掌握自動化、資訊化和提升航空作業效率等能力。

二、艦載機

艦載機是航艦戰力的主要來源。中共投入大量資源研製航艦，積極換裝各式艦艇，除了要讓海軍轉型成為「藍水海軍」外，強化和發展海基空中航空兵亦為重點。從前述「遼寧號」、「山東號」航艦的艦載機種類可知，目前是以殲-15 戰機為主戰機種，現約有 20 架。⁵² 其他包括直-9C、直-18J、直-18F、直-20F 則分別擔負預警、反潛和搜救等特殊軍事任務。儘管中共海軍現役航艦已配置特定型號之定翼機、旋翼機，惟若參考美國發展航艦戰鬥群的經驗，亦可發現包括固定翼艦載預警機、電戰機、加油機是目前仍舊缺乏的機種，成為中共發展海軍航艦戰鬥群的裝備限制，⁵³ 亦是當前中國大陸軍用航空工業鏈設法解決、突破的難題。此外，艦載機亦是在航艦建造費用方面不容忽略的龐大開銷。以一架艦載機平均壽命 15 年和一艘航艦使用年限 50 年來計算，在服役期間必須歷經 3 次艦載機更換，為了能夠維持航艦戰力，艦載機的採購費用幾乎和航艦建造的費用相當，持續編列所需預算亦是重要課題。

（一）殲-15 戰機

⁵¹ 〈山東艦主要改進項目〉，《大公報》（香港），2019 年 12 月 27 日，版 A14。

⁵²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9* (London: IISS, 2019), p. 260.

⁵³ 李大鵬，〈山東艦服役意味著什麼〉，《中國青年報》（北京市），2020 年 2 月 6 日，版 7。

為中共海軍第一代艦載機，自 2012 年起服役於「遼寧號」航艦，目前也是「山東號」航艦之艦載機。此款戰機的設計是以烏克蘭 Su-33 艦載戰機的其中一架 T-10K-3 原型機為基礎，結合自製之殲 -11B 技術，由隸屬於「中航工業」下的「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瀋飛）所研製之艦載機，⁵⁴ 在戰機的世代上是定位為第四代戰機。「瀋飛」在中國大陸軍用航空工業上，主要是以殲擊機作為主要產品，除了殲 -15 戰機外，包括殲 -5、殲 -6、殲 -7、殲 -8、殲 -8II、殲 -11、殲 -16、FC-31 等型戰機，以及作為教練機之用的殲教 -1、殲教 -6 皆出自於「瀋飛」。⁵⁵ 殲擊機的主要任務在擊滅敵空中目標，奪取制空權，亦可作為攻擊地面和水面目標之用，由於機動性佳，飛行速度快，可以攜帶航空機關砲、空對空飛彈、空對地飛彈、炸彈、火箭彈等火力強大之機載武器，成為航艦極為重要的武器裝備。

艦載機對於中共現役航艦而言，主要受限於飛行甲板採用滑躍起飛方式，各型戰機在起飛時，發動機需要較大的推力，在機種的技術改裝方面選擇有限；另因戰機在起飛時無法滿載油彈問題影響戰機飛行距離，致使中共一方面必須設法突破航艦艦載機之技術難題，另一方面在必須滿足現役航艦戰需條件，只能在已研製成功的殲 -15 戰機基礎上，研改衍生型號。儘管從公開資料中可以推知該型戰機的數量尚未達到兩艘現役航艦滿載數，惟在衍生型號方面，殲擊機發展隨著發動機技術、火控技術、機身製造技術的不斷進步，性能獲得極大提升，功能亦趨多用途。以殲 -15 戰機而言，已知有包括：殲 -15S 雙座版本，且能掛載「夥伴加油吊艙」，進行夥伴加油；⁵⁶ 換裝主動相控陣雷達，可強化探測距離之殲 -15B；可掛載電子戰（ECM）莢艙，執行電磁攻擊、電子監聽、通信對抗、電子對抗、抗干擾等任務之殲 -15D。⁵⁷ 殲 -15 戰機主要功能仍以空中戰鬥為主，對地反艦能力較

⁵⁴ 東翼，〈軍迷眼中的殲 -15〉，《兵器知識》（北京市），第 9 期，2011 年 9 月，頁 38-39。

⁵⁵ 瀋陽市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編，《瀋陽讀本》，（瀋陽：瀋陽出版社，2009 年），頁 70-71。

⁵⁶ Jeffrey Lin and P.W. Singer, "Tanker Buddies: Chinese Navy J-15 Fighter Planes Refuel in Flight," *Popular Science*, May 7, 2014, <https://www.popsci.com/blog-network/eastern-arsenal/tanker-buddies-chinese-navy-j-15-fighter-planes-refuel-flight/>.

⁵⁷ 盧伯華，〈陸版超級大黃蜂，殲 15D 電戰機將首登遼寧艦試飛〉，《中時電子報》，2019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919004777-260417?chdtv>。

弱，其相關技術、性能和武器規格彙整如表 5 所示。

表5 殲-15戰機技術、性能和武器規格彙整表

規 格	項 目	數 據	資 訊
技 術 規 格	飛 行 員	1-2人	
	尺 寸	長度：22.28公尺 翼展：14.7公尺、折疊後：7.4公尺 高度：5.9公尺 翼面積：62.04平方公尺	
	重 量	空重：17,500公斤 載重：27,00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33,000公斤	
	發 動 機	2具渦扇-10（太行）發動機	
	推 力	89.17千牛頓	
	後 燃 器 推 力	135千牛頓	
性 能 規 格	最 高 速 度	2.4馬赫	
	戰 鬥 半 徑	1,270公里	
	航 程	3,500公里	
	實 用 升 限	20,000公尺	
	爬 升 率	325公尺/秒	
武 器 種 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挺GSh-30-1機砲，裝彈150發 ● 鷹擊-62反艦巡弋飛彈 ● 鷹擊-85反艦飛彈 ● 鷹擊-91反艦飛彈 ● 鷹擊-9多用途飛彈 ● 雷電-10反輻射飛彈 ● 霹靂-9空對空飛彈 ● 霹靂-13中程空對空飛彈 ● 各型炸彈 ● 電子戰莢艙 	

資料來源：董慧明根據媒體公開資訊自行彙整。

(二) 特種功能直升機

為能解決「遼寧號」、「山東號」現役航艦艦載定翼機種類、數量不足的問題，中共海軍航空兵將直升機作為艦載旋翼機，執行預警、反潛、搜救等特種軍事任務，成為目前所見之選擇方案。和定翼機不同的是，儘管直升機可依不同任務易於進行功能性的設計研改，採取低空機動飛行，並且能在小面積場地垂直起降，而有利於傷員搜救。惟若要發揮預警、偵測功能，保護航艦在航行時的安全，直升機低速和機頭方向不變的飛行特性便成為限制。因此，從長期來看，中共仍會將艦載定翼反潛機、預警機、電戰機列入發展選項。⁵⁸就目前而論，艦載直升機主要包括由隸屬「中航工業」之「昌河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昌飛）自製之直-8、直-18 直升機、「哈爾濱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哈飛）自製之直-9、直-20 直升機，⁵⁹以及由俄羅斯「卡莫夫設計局」（Kamov）產製之卡-28、卡-31，其相關技術、性能和武器規格彙整如表 6 所示。

表6 特種功能直升機技術、性能和武器規格彙整表

用途	直-8		直-18		直-9C		直-20F		卡-28		卡-31	
	預警、反潛、運輸、搜救		反潛、預警、運輸		反潛		反艦、反潛、搜救		反潛		預警	
技術規格	飛行員	2	2	2	2	2	2	1-3	2			
	尺寸	長度： 約19公尺 旋翼直徑： 約19公尺 高度： 約6.7公尺	長度： 約23公尺 旋翼直徑： 約19公尺 高度： 約6.7公尺	長度： 約13.5公尺 旋翼直徑： 約12公尺 高度： 約4公尺	長度： 20公尺 旋翼直徑： 16公尺 高度： 5.3公尺	長度： 11.3公尺 旋翼直徑： 約16公尺 高度： 5.5公尺	長度： 12.5公尺 旋翼直徑： 2×14.5公尺 高度： 5.6公尺					

⁵⁸ Jeffrey Lin and P.W. Singer,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Fighters Go Operational?” *Popular Science*, January 8, 2015, <https://www.popsoci.com/chinese-aircraft-carriers-fighters-go-operational>.

⁵⁹ 沈海軍，〈中國的艦載飛機〉，《百科知識》（北京市），第 18 期，2018 年 9 月，頁 2-6。

	重量	空重： 7,095公斤 可用載重： 3,00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3,000公斤	空重： 9,957公斤 可用載重： 4,064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4,022公斤	空重： 1,975公斤 可用載重： 1,863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3,850公斤	空重： 5,000公斤 可用載重： 4,00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0,000公斤	空重： 6,500公斤 載重： 11,000公斤 可用載重： 4,00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2,00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2,200公斤
	發動機	3具渦軸-6發動機	3具渦軸-6C發動機	3具渦軸-8發動機	2具渦軸-10發動機	2具Isotov TV3-117V渦輪軸發動機	2具Isotov TV3-117VMAR渦輪軸發動機
性能規格	最高速度	273 公里/小時	315 公里/小時	324 公里/小時	360 公里/小時	270 公里/小時	250 公里/小時
	巡航速度	N/A	N/A	250 公里/小時	290 公里/小時	205 公里/小時	205 公里/小時
	航程	800公里	900公里	1,000公里	460公里	980公里	600公里
	實用升限	6,000公尺	8,000公尺	6,780公尺	4,000公尺	5,000公尺	3,500公尺
武器種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機砲 • 魚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機砲 • 魚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魚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機砲 • 制導 / 非制導火箭彈 • AKD10 空對地飛彈 • 空射型魚雷 • 鷹擊9E 反艦飛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自導魚雷 • 火箭助推魚雷 • PLAB-250-120 反潛炸彈 • 深水炸彈 	N/A

資料來源：董慧明根據媒體公開資訊自行彙整。

肆、中共海軍航艦戰力未來發展重點

中共決意發展航艦，主要原因是看見航艦在各國爭相強化海洋權益優勢之際，對於提升海軍實力的實質效用。因此，從 2012 年「遼寧號」航艦服役後，中共便以其為設計建造藍本，於次年開工建造「山東號」航艦，並且於 6 年內再交付海軍列裝服役。如果說「遼寧號」是在解決中共海軍有無航艦的問題，「山東號」航艦則是解決了航艦總體設計、船體建造、主動力裝備國產化研製等重大基礎問題。⁶⁰ 儘管從目前兩艘現役航艦的性能規格和武裝配備而論，仍難以趕上像是美國這樣擁有 11 艘核動力航艦及強大航艦戰鬥群的國家，⁶¹ 惟對於已經掌握航艦自主能力的中共而言，仍有重大意義。尤其近年來中共海軍各種作戰平臺亦有長足發展，多艘 052C/D 型和 055 型驅逐艦、護衛艦、快速戰鬥支援艦、核常動力潛艇，已成為打造航艦戰鬥群不可或缺之重要軍備。惟就現況而論，中共海軍現役航艦發展仍有不足之處，必須設法解決，其未來發展將以尋求突破核動力、電磁彈射器技術，以及增加艦載定翼機種類、載量為增進航艦戰鬥群戰力之主要目標。

一、中共海軍航艦戰鬥群發展

中共海軍朝向以航艦為核心的軍力結構轉型，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就是以海基空中力量為指標的艦載機，以及由水面艦艇、潛艇組成的航艦戰鬥群。一個標準的航艦戰鬥群自成一個作戰體系，具有完整的進攻和防禦能力。參照美國海軍建立航艦戰鬥群的艦艇組成方式，除了航艦本身外，還須包括 2 艘防空巡洋艦、2 艘防空驅逐艦、1 艘反潛驅逐艦、2 艘防空、反潛護衛艦、2 艘潛艇、1 艘大型補給艦等 10 艘艦艇。⁶² 以此對應於中共海軍以大型驅逐艦（例如：055 型飛彈驅逐艦）取代防空巡洋艦和其他驅護艦艇、快速戰鬥支援艦、潛艇的種類和數量，可以預判在取得航艦自主研製技術後，將朝向建立航艦戰鬥群的主要方向發展。

⁶⁰ 〈首艘國產航母帶來哪些新突破〉，《新京報》（北京市），2016 年 8 月 12 日，版 A4。

⁶¹ Lindsay Maizland, "China's Modernizing Militar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odernizing-military>.

⁶² 劉興堂、劉力編，《現代武器裝備和作戰平臺》，（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02-203。

中共海軍航艦戰鬥群的主要任務並非以防禦作為目的，而是要能執行攻擊軍事任務。因此，在設想上，航艦戰鬥群將包括突擊、保障和預備三大群體。首先，在突擊群部分，擔負的是戰鬥突擊任務，並以艦載攻擊機作為突擊任務主力，對敵方目標實施有效打擊。此外，大型驅逐艦因配備有對空、對海、對潛完整的武器攻擊體系，具備海戰場上獨立作戰能力，⁶³而核子、常規攻擊型潛艇亦能對敵方水面艦艇構成威脅，故皆可對妨礙主力攻擊的敵方進行突擊，屬於輔助突擊角色。其次，保障群的功能主要在保護航艦戰鬥群本身的安全，其中又可再劃分為偵察、防空掩護，以及反潛三種群體。以共軍現有裝備而論，偵察群主要擔負戰鬥偵察任務，除了在預警機、電戰機有效航程範圍內，可由空警-200、空警-500、運-8、運-9執行相關任務，亦可運用艦載直升機（如直-8、直-18、卡-31）共同執行偵察任務。在防空掩護方面，中共海軍052C型驅逐艦、054A型飛彈護衛艦配置於航艦周邊，則可構成120公里範圍內之防空區域。第三，在反潛群部分通常包括：10至30浬、30至100浬、100至300浬之內、中、外3層反潛區域。其中，內層反潛區主要在阻止魚雷攻擊潛艇接近航艦戰鬥群；中層反潛區則是要阻止敵方潛艇接近航母戰鬥群，並須有效攔阻敵方的近程飛彈；外層反潛區主要由反潛機（如空潛-200）或艦載反潛直升機（如直-9C、直-20F、卡-28）進行反潛搜索，及早發現敵方潛艇並阻止進入發射遠程飛彈距離。⁶⁴

按照上述設想，中共海軍正持續強化建立航艦戰鬥群之各項要件。包括航艦、快速戰鬥支援艦、大型驅逐艦、兩棲攻擊艦、攻擊型核潛艇、先進第四代艦載機等軍備的持續建造，以及發展高超音速反艦飛彈、遠端區域防空飛彈、反導攔截彈、電磁軌道砲、攻陸巡弋飛彈等新型攻擊武器，⁶⁵皆是必須密切關注的重點。

二、中共航艦人才的培育

自習近平主政以來，以「強軍」作為治軍理念，且曾強調「治軍之道，要在得人」。⁶⁶可見共軍要能實現「強軍夢」，關鍵就在育才、

⁶³ 劉杰編，《伏波之劍：水面艦艇史話》，（北京市：海潮出版社，2012年），頁182-183。

⁶⁴ 陳文中，《中國航母》，頁271。

⁶⁵ 楊俊斌，〈10年跨世代，陸將擁5航母打擊群〉，《中時電子報》，2020年2月8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208000162-260301?chdtv>。

⁶⁶ 周立存，《強軍興軍的科學指南》，頁283。

訓才，而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健全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則是當前共軍人才培育重點。⁶⁷ 中共海軍亦是如此，尤其在新型艦艇、戰機相繼換裝後，對於操作應用的專業程度要求愈來愈高，設法解決高素質專業人才的甄補、培育等問題愈形迫切。⁶⁸ 首先，無論是航艦戰鬥群或是艦隊，除了需要熟悉艦艇操控和武器裝備操作的人才，更需要有海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其次，新型艦艇的創新亦需要科研和生產製造技術高明的人才。第三，則是對艦載機飛行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這些無論是戰鬥指揮員、飛行員或是專業技術人才，中共海軍必須建立完整的教育制度。

檢視此次中共軍改後的海軍教育體系的變革，可見 8 所海軍院校以及直屬中共中央軍委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進行大幅度的整併調整，惟仍然保持中、高級指揮院校，以及初級指揮和工程院校兩大體系。首先，中、高級指揮院校體系可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和「海軍指揮學院」為代表。兩校皆設置軍事文學、理學碩士、博士學程，成為海軍中、高級軍事、政治、後勤、裝備幹部進行任職教育的人才培訓管道。其次，初級指揮和工程院校體系主要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海軍工程大學」、「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海軍潛艇學院」、「海軍航空大學」、「海軍勤務學院」、「海軍軍醫大學」，以及「海軍士官學校」。這些院校設置高等專科、大學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學程，除了招收海軍現職官兵，也向中國大陸普通高中、中專、中職，以及大學學歷以上者招生，是培養初、中級軍官、士官，以及相關軍事工程、管理、醫學專業人才的主要管道。此外，為了鼓勵大學生從軍，包括海軍部隊在內，亦以中國大陸「211 工程」、「985 工程」大學教育體系為優先，覓取相關專才進入海軍初級軍官和士官、士兵，以及專業技術幹部、文職人員培育體系。

⁶⁷ 「軍事職業教育」是指共軍全軍官兵、文職人員在職期間，利用網際網路、軍綜網、圖書室、學習室，以及軍事職業教育離線學習系統，區分學歷、非學歷繼續教育，進行有組織、自主性學習，是軍隊院校教育和部隊訓練實踐的拓展和補充。見胡利民、楊超、李繼斯、趙詠梅、薛勇、張天良、馮昌慶、馮林，《軍事人才聯合教育論》，（北京市：國防工業出版社，2017 年），頁 38-41。

⁶⁸ Minnie Chan, "PLA Navy in Future will have World-Class Ships, but not the Expertise to Operate Them, Military Observer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7, 2015,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844164/pla-navy-future-will-have-world-class-ships-not>.

綜觀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儘管各型艦艇、艦載機是以俄羅斯的軍備種類為藍本進行研改，惟有關海軍實戰化戰術戰法的教育訓練，亦注重美國海軍發展經驗。特別是在育才、訓才制度設計方面，中共海軍過去主要受到蘇聯體制影響，在制度上著重專業分工，也因此發展出有別於美國海軍的教育體制，其異同之處比較如下。

第一，中共海軍直接從教育對象的層級，以及專業領域做出相對應的學校和學程設計，其性質較類似俄羅斯海軍針對不同專業、不同層次的軍官進行「兩段三級」培訓模式。⁶⁹ 因此，中共海軍並未像美國設置培養海軍初級軍官的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惟仍然能從層級和專業方面對應兩國之制度設計。例如：中共海軍「海軍指揮學院」設有戰役指揮系、戰術指揮系、政治指揮系、後勤指揮系和戰役訓練班，其性質類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War College），而潛艇、航空兵培訓則可對應於美國海軍潛艇和飛行學校。⁷⁰ 儘管學制上有所差異，惟中共海軍重視海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軍工造船人才，以及艦載機飛行員培育，和美國海軍著重海軍作戰理論、實務，以及海事技術等教育目標並無太大差異，且都強調各自國家的國家安全戰略、權益發展，以及海洋環境的實際操練。

第二，在中共海軍現代化轉型需求下，除了海軍戰略確立了軍力發展取向，更重要的是如何汰舊落後軍備。尤其航艦是造艦技術最密集、造價最高、工程最大、運用最複雜的超大型武器系統。因此，中共海軍人才培育的重點較偏重在艦艇、潛艇、航空兵等專業技術和科技工程領域。近年來，多種新型艦艇、艦載機入列服役，有關海軍聯合作戰、航艦戰鬥群指揮人才，以及打造完整的航艦運作體系亦成為需求重點。受到地緣環境因素的影響，中國大陸和美國的海洋戰略、國家安全戰略並不相同，然而當「海外利益攸關區」概念受到高度重

⁶⁹ 「兩段」是指初官任職前的培訓階段和現職軍官的深造階段；「三級」是指初級軍官、中級軍官和高級軍官 3 個培訓等級。其中初級軍官主要來自 10 所高等軍事學校和 1 所軍事專科學院，通常設有作戰指揮、工程指揮、工程技術、飛行駕駛、醫學等專業課程。見楊育才，〈俄軍院校：優秀軍官的「搖籃」〉，《解放軍報》，2019 年 12 月 5 日，版 11。

⁷⁰ Nan Li,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Naval Education,"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Nan Li, e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21st-Century Sea Power: Defining a Maritime Security Partnership*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pp. 415-416.

視，「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的戰略要求明確成為中共海軍未來發展取向，中共借鑑美國海軍教育注重政策與決策、聯合指揮、聯合作戰，以及海事綜合協調與指揮等教育特色，⁷¹ 也會對海軍人才培育和戰力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伍、結論

本研究循著中共海軍朝向建立「藍水海軍」，以及達成「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目標之軍隊建設脈絡，分別探討了從擁有航艦到自製航艦的核心考量、造艦歷程。以中共航艦發展現況而論，「遼寧號」、「山東號」兩艘航艦尚不足以滿足「遠海防衛」戰略所需，其主要原因仍在航艦數量不足、採用傳統動力技術的油耗問題以及缺乏固定翼的預警機、電戰機、加油機。儘管中共已透過建造如 901 型大型快速戰鬥支援艦來改善航艦和艦載戰機、直升機的燃油消耗問題，惟他型特種功能的固定翼艦載機，更是能否延伸航艦戰鬥群作戰半徑的關鍵。

其次，本文從國防科技工業，以及中共海軍育才、訓才的角度，分析中共設法從軍事教育體系和全國「211 工程」、「985 工程」大學中，找到所需的海上聯合指揮軍事人才、艦艇研製的高科技人才，以及能夠操控新型艦載機的飛行員。從相關作法中可以發現，中共一方面從模仿中尋求造艦技術的突破，另一方面則是從國防科技創新的角度，讓包括「中船集團」、「中航工業」等國有軍工企業的研發單位擔負起新型機艦建造技術和能力的責任。因此，當高科技和高素質人才成為中共推動軍力現代化轉型之鑰，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上，將可預見中國和世界主要大國的軍事和科技競爭情況將愈趨激烈。

第三，從比較的觀點而論，中共海軍在擁有航艦後，軍力定有大幅提升，且對區域安全格局造成衝擊。以中共海軍實現「藍水海軍」目標為例，主要設想區分為三階段：第一，是在從千島群島經琉球群島至菲律賓群島、大巽他群島的第一島鏈形成有效軍事行動的能力；第二，是將軍事行動範圍延伸至日本本州島經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馬里亞納群島至印尼哈馬黑拉群島的第二島鏈；第三，是要將軍事行動範圍擴大至全球各大洋。然而，以現況而論，中共海軍受限於

⁷¹ Jeffrey A. Harley, "U.S. Naval War College Strategic Plan 2017-2021," U.S. Naval War College, <https://usnwc.edu/About/>.

「遼寧號」、「山東號」航艦的傳統動力型式，欲赴遠海航行，必須伴隨快速戰鬥支援艦，適時補充燃油。另殲-15戰機亦因缺乏艦載加油機，僅能實施「夥伴加油」而無法在油彈滿載後做長距離飛行。因此，在近期內，兩艘航艦的活動範圍仍將侷限於西太平洋第一、二島鏈，尚難以稱之為成熟的「藍水海軍」，在遂行「遠海防衛」軍事任務方面亦有其限制。

目前「遼寧號」、「山東號」航艦的母港分別選定在中國大陸北部戰區的「青島綜合保障基地」和南部戰區的「三亞綜合保障基地」，直屬於中共海軍領導機構直接指揮管理。從用兵戰略思維而論，其一北一南的配置，主要是從山東半島直接監視美國和日本兩國海軍往南的軍事動態。其中，北部戰區海軍將兵力部署威脅範圍涵蓋包括臺灣東海岸以東之西太平洋第一、二島鏈區域，設法阻斷美、日兩國的海上要道，並且及時牽制位於關島美軍基地的海、空軍，完成大縱深封鎖。另外，位於中國大陸海南省的三亞錦母角軍港是中共因應南海問題的軍事要塞，而南部戰區海軍的主要任務就是維護南沙群島島礁的主權和安全。此外，近年來，中、美兩國不斷在南海較勁，美國海軍堅持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更是兩國在外交、軍事領域交鋒較勁的焦點。因此，隨著「山東號」航艦部署在南部戰區，未來將發揮扼控南海外緣及北印度洋作用，包括「殲-15」戰機，亦須形成以航艦為中心之作戰半徑在1,000公里為範圍的海上空中打擊力量，對亞洲多國的海上能源運輸交通線構成威脅。

最後，從臺灣國防安全面向而論，仍須關注共軍阻止美軍介入臺海衝突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部署。本文探討中共海軍航艦戰力建設，發現儘管其航艦戰鬥群戰力尚未形成，惟從中共多次動用海軍航艦進行「實戰化」遠海長航海訓之舉動來看，可見中共若欲對臺灣及周邊海、空域進行封鎖，航艦及其艦載機將作為阻止外軍馳援或軍事介入之意圖相當明確。以現況而論，隨著中共兩艘航艦已入列海軍服役，未來透過大規模聯合演訓磨合戰力的作法仍會持續。中共海軍除了從區域安全的戰略思維將航艦部署於西太平洋和南海要位外，針對臺灣問題必須採取的軍事作為，就是要設法取得臺灣東部、南部海域控制優勢，亦即有效牽制或削弱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介入能力。此外，近年來中共以打擊非傳統安全威脅為名，積極和東南亞國協國家進行海上軍事聯合訓練，並且持續升高聯演聯訓的層

級和規模，採取由雙邊到多邊、從參與到主導，採單艦到編隊，以及進行多種任務、綜合演練等實戰化訓練作法。這些軍事作為除了有利於提升中共海軍各級指揮員聯合作戰、組織指揮能力外，亦能從中擷取外軍作戰訓練的體制、程序和方法。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共藉由聯合演訓的常態化，在南海等「利益攸關區」保持彈性的軍力存在，一旦取得海洋運輸線安全防控優勢，勢必加劇中美兩國「灰色地帶」（gray zone）戰略競爭，⁷² 連帶牽動美中臺三角關係的穩定和影響臺灣安全。臺灣除了必須審慎關注兩國軍力較勁下的關係變化，更應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思維架構下，客觀評估中共海軍航艦戰力發展的虛與實，並且進一步思考加強臺灣東部地區海、空防衛能力可行作法。例如：在兼顧國防自主和對外軍購原則下，合理部署反艦、防空等反制武器。另針對中共海軍航艦編隊戰力建設不足之處，亦應建構不對稱作戰思維，找到發展弱點，採取適當因應對策，有效反制。

⁷² 「灰色地帶」行動在學者 Frank Hoffman 對於現代衝突光譜的定義中，是一種次於非正規作戰、混合作戰、政府作戰、戰區常規作戰和全球核戰的衝突類型，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模糊地帶。學者 Andrew Erickson 和 Ryan Martinson 認為中國大陸海上武裝力量除了海軍外，尚包括海警、海上民兵。它們做為準海軍武裝力量，透過「灰色地帶」行動助力海權擴張，對美國及其東亞海上盟國已形成新挑戰。美中兩國基於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優勢，競爭關係勢將愈趨激烈。見 Frank G. Hoffman, “The Contemporary Spectrum of Conflict: Protracted, Gray Zone, Ambiguous, and Hybrid Modes of War,” in Dakota L. Wood, ed., *2016 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Assessing America’s 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 p. 29; Andrew S. Erickson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China’s Maritime Gray Zone Operation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9), pp. 1-2, 22.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中央軍委辦公廳，《鄧小平關於新時期軍隊建設論述選編》，（北京市：八一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年）。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2018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北京市：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2019 年）。

王海運，《國際風雲與中國外交》，（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 年）。

本書編委會編，《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年鑒 2015 版》，（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 年）。

石家鑄，《海權與中國》，（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

宋宜昌、遠航，《駛向深藍：中國艦船工業騰飛紀實》，（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宋忠平，《大國武器 2.0》，（北京市：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 年）。

李政編，《中央企業技術創新報告 2011》，（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年）。

沙志亮，《刀尖上的舞者：「航母戰鬥機英雄試飛員」戴明盟的故事》，（太原：希望出版社，2017 年）。

周立存，《強軍興軍的科學指南》，（北京市：國防大學出版社，2014 年）。

周碧松，《深藍海洋的激烈爭奪》，（北京市：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 年）。

房功利、楊學軍、相偉，《解放軍史鑒：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史》，（青島：青島出版社，2013 年）。

胡利民、楊超、李繼斯、趙詠梅、薛勇、張天良、馮昌慶、馮林，《軍

- 事人才聯合教育論》，（北京市：國防工業出版社，2017年）。
- 張良福，《聚焦中國海疆》，（北京市：海洋出版社，2013年）。
- 陳文中，《中國航母》，（北京市：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
- 賀海輪編，《延安時期著名人物》，（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 劉杰編，《伏波之劍：水面艦艇史話》，（北京市：海潮出版社，2012年）。
-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市：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 劉興堂、劉力編，《現代武器裝備和作戰平臺》，（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閻立金、張龔，《人文海洋》，（北京市：新華出版社，2018年）。
- 瀋陽市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編，《瀋陽讀本》，（瀋陽：瀋陽出版社，2009年）。
- Erickson, Andrew S.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China's Maritime Gray Zone Operation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9).
-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9* (London: IISS, 2019).

二、專書論文

- Hoffman, Frank G., “The Contemporary Spectrum of Conflict: Protracted, Gray Zone, Ambiguous, and Hybrid Modes of War,” in Dakota L. Wood, ed., *2016 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Assessing America's 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
- Li, Na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Naval Education,”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Nan Li, e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21st-Century Sea Power: Defining a Maritime Security Partnership*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 Li, Na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in 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ollpeter, Kevin and Mark Stokes, “China’s Military Shipbuild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System,” in Andrew S. Erickson, ed.,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An Ambitious and Uncertain Course*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6).
- Scobell, Andrew, Michael E. McMahon, Cortez A. Cooper III, and Arthur Cha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Program: Drivers,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in Andrew S. Erickson, ed.,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An Ambitious and Uncertain Course*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6).
- Xu, Qiyu, “Multipolar Trends and Sea-Lane Security,” in Peter A. Dutton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Beyond the Wall: Chinese Far Seas Operations* (Newport, Rhode Island: U.S. Naval War College,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2015).

三、學術性期刊論文

- 天鷹，〈2017 大海軍序曲〉，《艦載武器》（鄭州），第 2 期，2018 年 2 月，頁 14-19。
- 王信力，〈中共海軍發展航母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52-75。
- 沈海軍，〈中國的艦載飛機〉，《百科知識》（北京市），第 18 期，2018 年 9 月，頁 2-6。
- 周明，〈為什麼選擇「瓦良格」號，歷數中國買過的航母〉，《國家人文歷史》（北京市），第 17 期，2019 年 9 月，頁 78-83。
- 東翼，〈軍迷眼中的殲-15〉，《兵器知識》（北京市），第 9 期，2011 年 9 月，頁 38-39。
- 歐錫富，〈中國擱置建造核動力航艦〉，《國防安全週報》，第 77 期，

2019 年 12 月 13 日，頁 1-4。

鄒舟，〈適應未來作戰需要加強海軍遠海防衛作戰力量建設〉，《國防大學學報》（北京市），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44-45。

閻雪昆、段廷志，〈國際法視野下的遠海防衛〉，《國防》（北京市），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79-82。

韓永，〈中國航母計畫出臺始末〉，《黨員文摘》（重慶市），第 10 期，2011 年 10 月，頁 55-56。

Erickson, Andrew S., “China’s Blueprint for Sea Power,” *China Brief*, Vol. 16, No. 11, July 2016, pp. 3-7.

Erickson, Andrew S. and Andrew R. Wilson,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Dilemm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9, No. 4, Autumn 2006, pp. 12-45.

Oliver, Thomas M., “The Observable ‘Cult of the Defensive’: PLAN Strategic Shift Toward a Blue Water Navy and American Strategic Percep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8, No. 4, August 2018, pp. 206-233.

Scobell, Andrew, Michael McMahon, and Cortez A. Cooper III,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Program: Drivers,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8, No. 4, Autumn 2015, pp. 64-79.

四、官方文件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January 15, 2019.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1, 2020 .

五、報刊

〈「南北船」合體，中國問鼎海洋強國〉，《大公報》（香港），2019 年 11 月 27 日，版 A11。

〈「南北船」合體起航〉，《北京青年報》（北京市），2019年11月27日，版A9。

〈山東艦主要改進項目〉，《大公報》（香港），2019年12月27日，版A14。

〈中國海軍首支艦載航空兵部隊組建〉，《中國新聞》（北京市），2013年5月11日，版2。

〈中國進入「雙航母時代」〉，《三亞日報》（海南省），2019年12月18日，版2。

〈首艘國產航母入列〉，《青年時報》（浙江省），2019年12月18日，版A8。

〈首艘國產航母帶來哪些新突破〉，《新京報》（北京市），2016年8月12日，版A4。

李大鵬，〈山東艦服役意味著什麼〉，《中國青年報》（北京市），2020年2月6日，版7。

楊育才，〈俄軍院校：優秀軍官的「搖籃」〉，《解放軍報》（北京市），2019年12月5日，版11。

“New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Vayu Aerospace and Defence Review*, No. 1, Jan/Feb 2014, pp. 166-167.

六、網際網路資料

〈中國新國防白皮書提海外利益攸關區戰略〉，《BBC中文網》，2015年5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26_china_defence_white_paper。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2015年5月2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index.htm>。

楊俊斌，〈10年跨世代，陸將擁5航母打擊群〉，《中時電子報》，2020年2月8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208000162-260301?chdtv>。

盧伯華，〈陸版超級大黃蜂，殲15D電戰機將首登遼寧艦試飛〉，《中時電子報》，2019年9月2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919004777-260417?chdtv>。

“Chinese State-Owned Shipbuilder Swaps Assets Among Units,”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April 1, 2019,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ese-state-owned-shipbuilder-swaps-assets-among-units/>.

“海外利益攸關區 (haiwai liyi youguanqu):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Daily*, May 28,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5-05/28/content_20840858.htm.

Chan, Minnie, “PLA Navy in Future will have World-Class Ships, but not the Expertise to Operate Them, Military Observer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7, 2015,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844164/pla-navy-future-will-have-world-class-ships-not>.

Harley, Jeffrey A., “U.S. Naval War College Strategic Plan 2017-2021,” U.S. Naval War College, <https://usnwc.edu/About/>.

Koda, Yoji, “China’s Blue Water Nav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7,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Koda_BWN.pdf?mtime=20170320220424.

Lin, Jeffrey and P.W. Singer,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Fighters Go Operational?” *Popular Science*, January 8, 2015, <https://www.popsoci.com/chinese-aircraft-carriers-fighters-go-operational/>.

Lin, Jeffrey and P.W. Singer, “Tanker Buddies: Chinese Navy J-15 Fighter Planes Refuel in Flight,” *Popular Science*, May 7, 2014, <https://www.popsoci.com/blog-network/eastern-arsenal/tanker-buddies-chinese-navy-j-15-fighter-planes-refuel-flight/>.

Maizland, Lindsay, “China’s Modernizing Militar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odernizing-military>.

Torode, Greg and Ben Blanchard, “Exclusive: Images show construction on China’s third and largest aircraft carrier – analysts,” *Reuters*, May 7,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military-carrier-exclusive/exclusive-analysts-images-show-construction-on-chinas-third-and-largest-aircraft-carrier-idUSKCN1SD0CP>.

中國推動區塊鏈技術與數位人民幣 的戰略意涵

吳宗翰

博士後研究

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

摘 要

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全球各領域力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特別是新興科技；這份雄心不僅包括市場，更包括所謂的「話語權」，即國際標準的制定。本文主旨在於分析中國政府追求強化區塊鏈技術的戰略意涵，並分別從中國區塊鏈技術政策發展沿革、《密碼法》上路、中國在國際領域作為以及其當前面臨的挑戰等議題，指出中國同時著眼於國內監管與國際競爭。兩者並行不悖，亦可相互支撐。

關鍵字：中國、區塊鏈、密碼法、數位人民幣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 Strengthening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Tsung Han Wu

Postdoctoral Fellow

Division of Cyber Security and Decision-Making Simulation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With its rise, China is expecting to expand its role in various fields, in particular novel technologies. China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market, but also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effort in strengthening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by discussing China's annual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of its Cryptography Law, and its challeng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is aiming for both social surveillance and winning global competition.

Keywords: *China, Blockchain, Cryptography Law,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DCEP)*

壹、前言

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全球各領域，特別是新興科技領域，力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份雄心不僅包括市場，更包括所謂的「話語權」，即國際標準的制定。根據媒體報導，2020年3月初北京已完成了「中國標準 2035」的規劃作業，並預料2020年會公布最終版本的相關文件。¹「中國標準 2035」是立基於「中國製造 2025」計畫之上更為宏大的計畫，其目的在於使中國主導全球科技標準；這既有利於其產品的上中下游整合，也有利於後續商品通路。在此脈絡下，北京爭取全球戰略制高點的企圖不言而喻。在這其中，與區塊鏈相關的技術與標準，以及一開始似乎是平行發展最後卻有所重疊的人民幣數位化議題，是中國執政當局著重之處。本文主旨在於分析中國政府積極強化區塊鏈技術的戰略意涵，按面向可分成國際與國內兩層面；本文亦分析相關重要政策的沿革與推移；區塊鏈的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演進過程雖然亦是重要議題，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中共對區塊鏈技術的關注可溯至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2019年10月，隨著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以及中國官方陸續發布的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如推動數位人民幣的進程、《密碼法》的通過與生效，上述舉措莫不引發外界議論。分析者尤其關切中國如何應用這些創新成果。本文以下分析中國區塊鏈技術政策沿革、《密碼法》上路、中國在國際領域作為以及當前中國區塊鏈面臨的挑戰等議題。

貳、中共發展區塊鏈技術的宏觀展望

區塊鏈最初是做為設計比特幣（Bitcoin）的基礎技術而受到關注。它是一跨領域技術，背後原理涉及密碼學（cryptography）、資訊科學、網路技術與貨幣學等。儘管深究起來複雜，但一般通說認為，「去中心化、難以竄改紀錄、可追溯」為其主要特性。²從2008

¹ Arjun Kharpal, “Power is ‘up for grabs’: Behind China’s plan to shape the future of next-generation tech,” *CNBC*, April 26,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4/27/china-standards-2035-explained.html>.

² 龔鳴，《寫給未來社會的新帳本——區塊鏈》，（台北：大寫出版，2019年），頁18-24，37-40。

年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提出至今，³ 區塊鏈已從原來的 1.0、2.0 乃陸續進展至 3.0 版本，應用層面也從金融領域跨越至物流等不同面向。⁴ 相關學者亦針對區塊鏈的技術本身（如演算法等）依照不同的需求進一步分別研究。

在中共的語境定義中，區塊鏈技術與比特幣或類似性質的數位加密貨幣（digital encrypted currency）不同，官方對它們的態度也迥然有異。基於防制犯罪洗錢、投資炒作與顧慮加密貨幣可能挑戰主權貨幣等緣由，北京長期以來在國內限制比特幣的市場發展；官方從 2017 年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即定調「發行虛擬貨幣為非法金融行動」。即使習近平在 2019 年 10 月底發表支持區塊鏈發展並帶動後續一波比特幣上漲的國際行情之後，官方立場至今仍然不見鬆動，反而在媒體上見到政府更加嚴格取締各地交易所的報導。⁵

另一方面，北京對於區塊鏈技術則是積極鼓勵。不僅有中央至地方的政策出台支持，提供經費予智庫、高等教育單位、企業等進行研發，電視台頻道、民間微信公眾號等亦多有專欄宣傳與探討相關技術。

就官方政策沿革而言，2016 年是一個關鍵年。首先，在 2016 年 10 月 18 日，由中國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指導的中國區塊鏈技術和產業發展論壇成立大會暨首屆開發者大會於北京召開，拉開了官方提倡區塊鏈技術的序幕。該會議發布了《中國區塊鏈技術和應用發展白皮書（2016）》，該白皮書內容探索推動中國區塊鏈技術、統一區塊鏈相關規格和產業發展路線圖。⁶ 接著，在 12 月發布的《十三五國家信息規劃》中，區塊鏈與物聯網、大數據、

³ Satoshi Nakamoto,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bitcoin, May 24, 2009,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⁴ Melanie Swan 著、沈佩誼譯，《區塊鏈》，（台北：基峰資訊，2018 年）。

⁵ 〈重大警訊：中國央行整治「交易所 區塊鏈應用」文件遭證實；幣安、波場官方微博遭封鎖〉，《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1 月 18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big-signal-china-will-ban-exchange-and-project/>；〈區塊鏈不等於虛擬貨幣 監管部門重申嚴打炒幣行為〉，《人民網》，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19/1126/c1004-31474467.html>。

⁶ 〈中國區塊鏈技術和產業發展論壇成立大會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6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5290031/content.html>。

人工智慧等共同被列為影響「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的關鍵技術，並被列為「戰略性前沿技術」。這是區塊鏈首次出現在五年計畫進程中。此後幾年間，政府各部門與各地政府得以依據計畫推出相關措施。⁷

2017 年 7 月，中國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強調要透過區塊鏈與人工智慧的結合以達至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此後在 10 月與 11 月，國務院於其所發布的《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以及《國務院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中再次提及區塊鏈技術創新對企業的重要性。⁸

2018 年 5 月 28 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再次指出要加快區塊鏈等領域的技術創新。⁹ 2019 年 10 月 24 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以「區塊鏈發展現狀與趨勢」為題，強調「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確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¹⁰

⁷ 〈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16 年 12 月 15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60221.htm。

⁸ 〈國務院關於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17 年 7 月 8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13/content_5231524.htm；〈國務院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1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1/27/content_5242582.htm。

⁹ 〈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18 年 5 月 28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29/c64094-30019426.html>。

¹⁰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0/25/c_1125153665.htm；區塊妹 Mel，〈中共勢要成就區塊鏈是必然？探究習近平如何一語轟動全球〉，《區塊客》，2019 年 10 月 28 日，<https://blockcast.it/2019/10/28/xi-jinping-wants-china-to-take-the-leading-position-in-blockchain/>；〈七家黨媒 1 周發布 62 篇區塊鏈報導：新華社發文最多，人民日報系最關注數據和產業〉，《互鏈脈搏》，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coingogo.com/news/38600>。

接收到上述來自中央的政策白皮書、政策以及共黨領導人談話，幾乎所有地方政府先後投入區塊鏈技術建設。其中，截至 2019 年 4 月的統計，廣東、貴州與浙江等地頒發的相關政策最多。¹¹ 得益於資金、人才等綜合型因素，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乃是發展相對最為蓬勃的地區。粗略來分的話，可以將當前中國大陸的區塊鏈產業聚集地分成四大版圖，依地理位置為：北方與環渤海區，以北京、青島為主體，涵蓋天津、山東；長江三角洲區，以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為主體；珠江三角洲區，包括廣州、深圳、佛山等地；中西部地區，以長沙、貴陽、重慶為該區發展主體。¹²

許多高等教育機構也各自透過或者設立研究單位，抑或設立相關課程培養人才。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均有類似設計。許多國營單位（例如銀行）與企業也在內部設立相關研究部門。

企業是觀察中國區塊鏈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當前，多家中國獨角獸企業（Unicorn）均有運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不同服務，包括百度、華為、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小米等集團，跨足硬體製造、金融、供應鏈、溯源、生活文化娛樂等業務。¹³ 根據中國工商銀行的金融科學院發布的資料，至 2019 年年底，全中國大約有 420 家的區塊鏈相關服務企業；其中，有 72 家是聚焦在金融服務上。¹⁴

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也極為密切。例如，2019 年 11 月 4 日，華為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了 2 份戰略合作協議與合作備忘錄。¹⁵ 各地方政府或有推出相關措施招商投資區塊鏈技術。¹⁶

¹¹ 中國區塊鏈生態聯盟、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政府、賽迪（青島）區塊鏈研究院，《2018-2019 中國區塊鏈發展年度報告》，2019 年，頁 20。

¹² 中國區塊鏈生態聯盟、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政府、賽迪（青島）區塊鏈研究院，《2018-2019 中國區塊鏈發展年度報告》，2019 年，頁 69-70。

¹³ 例如百度的超級鏈、華為的華為雲、阿里巴巴集團的螞蟻鏈、考拉海購、京東集團的智臻鏈等都是有運用區塊鏈技術的產品。

¹⁴ Jason Liu，〈中國首例！工商銀行 ICBC 發表《區塊鏈金融應用白皮書》，佈局欲領導產業方向〉，《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ese-bank-unveils-the-banking-sectors-first-blockchain-white-paper/>。

¹⁵ Candy Her，〈華為 (Huawei) 與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院」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1 月 5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pboc-digital-currency-research-institute-huawei-fintech-research/>。

¹⁶ 〈廣州印發《加速區塊鏈引領變革措施》鼓勵設立 10 億元區塊鏈基金〉，《中國

透過政策的鼓勵發展到導引技術發展走向，這些年的趨勢透露中國政府企圖掌握該技術的全面性知識。這背後不僅僅是為了促進科技能力的提升，更是看中區塊鏈技術可被用於強化政府對社會監管能力的潛力。北京提倡區塊鏈的同時並非全然接受其前述提到的「去中心化、難以竄改紀錄、可追溯」等主流特性。事實上，儘管中國各官方媒體在習近平談話後立即大量推送與區塊鏈相關的科普知識與專家論文，但仔細觀察後即可發現，這些訊息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該技術如何正面地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產業供應鏈以及電子紀錄可追溯與不被竄改等面向，卻少提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關係，顯見是刻意選擇過的報導。¹⁷ 此外，透過解讀政府下發的相關政策文件、給領導幹部的讀本與相關的媒體報導，也可以看到北京對區塊鏈的推崇其實都立基於「中心化管理」的前提。¹⁸ 換言之，儘管「去中心化」至今仍然是主流區塊鏈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性，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並透過「論述」導引出「技術面上可行」的結論；「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亦是中國央行對數位人民幣（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DCEP）的立場。就技術面來說，區塊鏈分成公有鏈、私有鏈與聯盟鏈，而後兩者其實均有屬於相對中心化的技術，也已為當前中國大陸政府著力鼓勵發展的項目。質而言之，中國政府著眼的是區塊鏈技術如何協助黨－國家對社會的治理。

從相關規範的制定來看，上述的思維更加明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精神一致，2019年2月15日開始施行的中國《區塊鏈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其中第八條內文即明確指出，區塊鏈在中國的使用將會採取實名制。¹⁹ 在金融領域，官方也早已指出，將採取「可控匿名」措施管理未來有關DCEP的使用。所謂「可控匿名」

外貿網》，2019年10月31日，<http://www.fayiyi.com/block/20191031/32529.html>。

¹⁷ 央視新聞客戶端，〈最近頻頻被點名的「區塊鏈」到底是個啥〉，《央視網》，2019年10月27日，<http://m.news.cctv.com/2019/10/27/ARTIU0KggD88iWFv9DYv19O4191027.shtml>；〈習近平定調為國策後，區塊鏈火了，官媒密集推出區塊鏈科普：什麼是區塊鏈？〉，《微信上的中國》，2019年10月28日，<https://chinaqna.com/a/99700>；金佳緒，〈政治局集體學習專議這項技術發展，習近平有何深遠考量〉，《新華網》，2019年10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10/29/c_1125164384.htm。

¹⁸ DAO 區塊鏈智庫，〈陳純：聯盟區塊鏈關鍵技術與區塊鏈的監管挑戰〉，《鏈聞 CHAINNEWS》，2019年10月28日，<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957872019898.htm>。

¹⁹ 〈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年1月10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2298.htm。

的意思是指政府將不會洩漏消費者的資訊給業者，但它可以察看交易數據。²⁰ 換言之，透過金流，政府將更為有效地獲知個人行動訊息，這樣的論調完全符合中國意欲建立社會信用制度與增強社會控制的趨勢。

參、中共通過與實施《密碼法》

2019 年 10 月 26 日，即習近平發表「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談話後的第三天，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密碼法》。該法旨在規範密碼的管理與應用，在其「總則」處，即明示「密碼歸黨管理」的原則；該法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高度配合，相互補充。²¹ 因此，當前中國提倡區塊鏈技術可謂是與共產黨「依法治理網路」和實現「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的精神相一致，也是其具體表現。

這裡一個簡單卻需要澄清的概念是密碼的定義。在法案總則的第二條有提到，「本法所稱密碼，是指採用特定變換的方法對信息等進行加密保護、安全認證的技術、產品和服務」，由此可見，這個法案所指的密碼（encryption）是管制與監控密碼的相關技術，而不是日常生活當中所謂的密碼（password）。

《密碼法》的規劃始於 2017 年 4 月。歷經 2018 年 9 月 7 日第 13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立法規劃、2019 年 6 月 25 日第十一次常務會議進行審議，最終於 10 月 26 日第十四次常務會議表決通過。該法全文共 5 章 44 條，成為中國密碼領域的「綜合性、基礎性法律」。

就時程安排與通過時機來看，《密碼法》的通過緊接著在習近平的談話之後，這使得多數分析者認為，此法是針對區塊鏈而來，並將用以「法治化」後者。²² 該法的主管單位為「國家密碼管理局」。遑

²⁰ 〈採雙層運營體系 可控匿名〉，《文匯報》，2019 年 9 月 3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9/03/FS1909030004.htm>；帥青紅、段江、夏可，《區塊鏈+時代：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台北：崧燁文化，2019 年），頁 92。

²¹ Raymond Zhong, "China's Cryptocurrency Plan Has a Powerful Partner: Big Broth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8/technology/china-cryptocurrency-facebook-libra.html?_ga=2.255420044.584171952.1573183874-423200469.1572396114；〈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26/c_1125156896.htm。

²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26 日，

反法律者除民事懲罰最高可罰 100 萬元人民幣，亦可能有刑事上的責任。然就下文可以看到，密碼（encryption）的涵蓋範圍不止於區塊鏈，實際上更為廣泛，這可謂是中國政府已為未來局勢超前部署的作法。

《密碼法》與區塊鏈的關係主要來自區塊鏈涉及的密碼原理。從圖 1（見下頁）可見，區塊鏈的構成基本可分作 6 大層。其中，數據層指的是底層數據區塊、鏈式結構、時間戳、非對稱加密、密碼算式函數等，是區塊鏈技術中最基礎的部分；網路層指的是點對點（Peer-to-Peer, P2P）網路架構、資料傳播與認證機制等。透過網路層，區塊鏈得以有自動組網功能；共識層主要涉及區塊鏈網路節點的共識演算法，例如工作量證明機制（Proof of Work, POW）、權益證明機制（Proof of Stake, POS）、股份授權證明機制（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等；激勵層涉及經濟獎勵的發行與分配設計；合約層指的是各類封裝腳本與算法，提供區塊鏈可編成特性；應用層則是各種應用場景。在這六項中，由於數據層、網路層與共識層是構成區塊鏈的底層技術，而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激勵層、合約層與應用層則不是。從這樣的結構來看，區塊鏈根本無處不存在「密碼」（encryption）。這便是外界主張《密碼法》的設立將提供政府伸掌控管區塊鏈的依據。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26/c_1125156896.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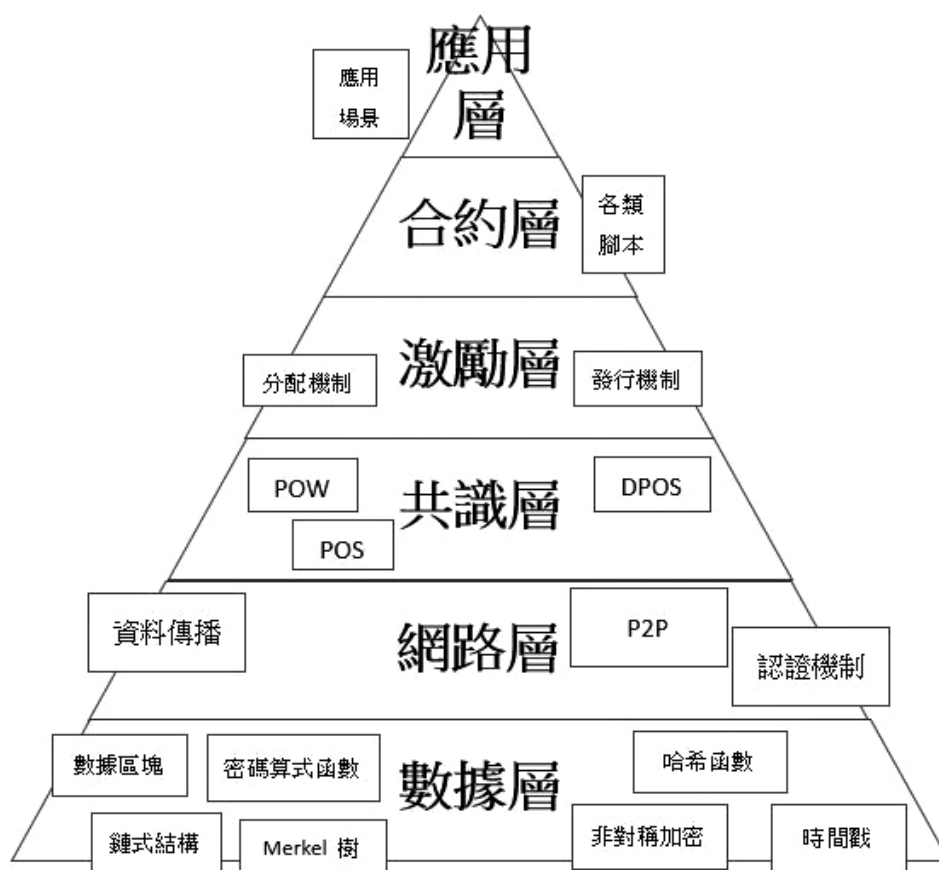


圖 1 區塊鏈的 6 層模型概念圖

資料來源：吳宗翰自製。

鑒於目前所有涉及網路的加密系統均有賴密碼的參與建構，有分析指出《密碼法》的出現可謂是中國「金鑰託管」（key escrow）概念的落實。²³ 這個概念指的是執法單位可在特定情況下取得解密的金鑰。此外，《密碼法》將密碼按照性質區分成「核心密碼」、「普通密碼」與「商用密碼」，分別列管與賦予權利。前兩者屬於國家級保護，涉及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密碼，須由國家密碼管理局審定核可使用；後者則不涉機密。有論者認為這種看似保障密碼使用與標準化規範，體現了官方「簡政放權、加強監管、優化服務」（放管服）的思

²³ 杜貞儀，〈中國《密碼法》之分析〉，《國防安全週報》，第 80 期，2020 年 1 月 3 日，頁 2-3。

維。²⁴ 然而，由於部分內容定義不明確，有關意見指出，該法限制的目的恐大過於放鬆。直言之，由於該法並無進一步闡釋三類密碼的劃分原則，又因為當前世界「公、私」混用普遍，三類密碼之間的關係界線與轉換的認定劃分恐怕最後僅由北京政府掌握裁量權。²⁵

再者，基於《密碼法》的規範性質，相關分析亦指出北京未來可能得以透過再制訂子法律要求管理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以及任何與中國境內有來往的數據資料。²⁶ 就這點來說，《密碼法》的實施可從法制層面實質上強化北京長期以來推行的「數據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政策。

綜合上述，回歸至社會監控的核心，本文認為《密碼法》對中共區塊鏈發展以及產業的影響主要在於提供政府得以從「底層面」管理「加密技術」。由於《密碼法》剛剛實施不久，具體影響仍然有待未來進一步的實例分析。

肆、爭取國際標準與金融科技的制高點

隨著《中國製造 2025》與《中國標準 2035》計畫的陸續推動，中國同時在國內外追求標準化（standardize）技術規格，目的是整合與推動本國產品的各類技術規格（含密碼、協議等）成為國際通用標準。這不僅有利於本國產品在全球的通路行銷，更有利於搶得未來市場競爭的先機。近年來，有關區塊鏈的這類工作包括：在 2019 年 10 月，包括 POS 系統、ATM 終端、雲端運算平台、嵌入式安全元件在內等 11 種常用於在線支付與區塊鏈的技術被納入中國央行的認證體系。在 2019 年 11 月，中國國務院底下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出〈國家標準委新建一批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的通知，表示「圍繞區塊鏈技術……等社會關注的熱點領域……加快推動標準化技術組織建設工作，啟動區塊鏈和分散式記帳技術等一批技術委員會籌建工作」。²⁷ 而在 2017 年 10 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²⁴ 許慈真，〈中國密碼法淺析〉，《北美智權報》，254 期，2020 年 2 月 12 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mainland/IPNC_200212_0802.htm。

²⁵ 比特律，〈《密碼法》頒布的意義及行業趨勢〉，《鏈聞 CHAINNEWS》，2019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22054647346.htm>。

²⁶ 杜貞儀，〈中國《密碼法》之分析〉，《國防安全週報》，第 80 期，2020 年 1 月 3 日，頁 4。

²⁷ 〈國家標準委新建一批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samr.gov.cn/bzjss/sjdt/gzdt/201911/>

和中國人民銀行數位貨幣研究所聯合代表產業界向國際電信聯盟標準化部門（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T）的分散式帳本焦點組（Focus Group on Application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FG DLT）提交了「可信區塊鏈：一個分散式帳本技術評估框架（Trusted Blockchain: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的技術提案，對國際區塊鏈標準提出建議。在 2019 年 10 月底，中國稅務監管部門也開始推動一款由騰訊企業發展的發票系統（也是立基於區塊鏈的技術）成為全球標準規格。²⁸

在這些以中國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環境中，最為外界關心的恐怕莫過於 DCEP。根據目前的資訊，DCEP 的發行採「雙層架構」，直言之就是中央人民銀行會先把貨幣兌換給其他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而後這些機構再向社會發放。DCEP 的設計將是採「雙離線支付」。這指的是收支雙方只要都安裝數字錢包，在不需要網絡與信號的情況下就能完成即時轉帳。這使得它在實際運作上宛如現金；社會上原有的支付寶、第三方支付、銀聯卡與信用卡等消費方式不受影響。²⁹

上文在回顧中國關於區塊鏈技術的政策沿革時，提及北京甚為防範比特幣等數位加密貨幣在中國的市場發展；然而，中國政府在另一方面卻非常積極投入關於人民幣數位化的研究。自 2014 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即宣布開啟相關計畫，研議未來發行數位貨幣的可行性。不過，在當時始終未有鬆口究竟將採用何種技術。這個問題直到 2019 年中國央行才正式宣布將採用區塊鏈技術。值得注意的是，DCEP 的設計是「選擇性的」使用區塊鏈技術，它的核心仍然是「中心化的」。前面部分提到的「可控匿名」措施：即用戶訊息在前台營運機構是有

t20191119_308640.html。

²⁸ Jason Liu，〈騰訊獲中國國家稅務局批准，為「區塊鏈發票」制定全球統一標準〉，《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tencent-to-lead-drafting-of-international-blockchain-based-invoice-standard/>；Jason Liu，〈中國人民銀行推進「國家統一認證體系」，為 11 種支付、區塊鏈等金融技術嚴格把關〉，《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announces-new-regulatory-authority-to-certify-digital-payments-blockchain-products/>。

²⁹ Binance Research，〈Binance 幣安研究：大眾對中國央行「數位人民幣 DCEP」的迷思（完整報告）〉，《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cbdc-dcep-cryptocurrency-revolution-binance/>。

限的，在後台中央銀行是全面的，會是主要管理模式。³⁰

經過數年的研發，2020 年 4 月中旬中國政府也已經正式在深圳、江蘇蘇州、北京雄安新區、四川成都以及冬奧預定地進行封閉式內部測試；19 家包括麥當勞、星巴克、Subway 等外商公司與中國公司也都參與測試。³¹10 月 30 日當華為公布其新款手機 Mate 40 系列時，業務執行長余承東更表示其為首款內置支援「數位人民幣硬體錢包」功能的智慧手機，儘管目前只在試點地區內的白名單的用戶可使用。³²由於目前揭露的資料有限，有關結果以及後續仍有待觀察。

針對中國近年來加快推動區塊鏈的相關技術以及開展的一系列舉措，特別是密集且又高調地宣示推動關於 DCEP，讓外界紛紛揣測原因。本文認為，這其中既有宣示性的意義，³³也有實質上的突破；中美越發激烈的戰略競爭格局更是一不可忽視的脈絡。就後者而言，欲藉科技成果突破已持續數年的中美貿易戰／科技戰僵局是重要考量。

首先，就「推動 DCEP」的行動而言，本文認為它蘊藏中方對美元世界霸權的回應。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

³⁰ 任之劼，〈技術解讀央行數字貨幣 DCEP：架構、匿名性、錢包、雙離線支付等〉，《鏈聞 CHAINNEWS》，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033862459902.htm>；〈十問數字人民幣：哪能用？會取代紙幣？與支付寶有何不同〉，《新京報網》，2020 年 4 月 21 日，<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20/04/21/719185.html>；01 Binary，〈關於中國央行數位貨幣 DCEP，讀完這篇文章才算是懂了！〉，《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4 月 26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dcep-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Michael，"China's National Digital Currency DCEP / CBDC Overview," *BOXMING*, June 4, 2020, <https://boxmining.com/dcep/>.

³¹ 〈傳聞中的法定數字貨幣真的來了！〉，《人民網》，2020 年 5 月 14 日，<http://ip.people.com.cn/n1/2020/0514/c136655-31708570.html>；Frank Tang, "China includes McDonald's, Starbucks, Subway on list of foreign firms to test digital curren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3, 2020,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81291/mcdonalds-starbucks-subway-among-foreign-firms-set-test>.

³² Rosie Wu, 〈首創！中國華為發表 Mate 40 系列手機，支持「數位人民幣」硬體錢包〉，《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huawei-mate-40-digital-yuan-hardware-wallet/>。

³³ 陳建奇，〈央行數字貨幣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FT 中文網》，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615?topnav=innovation&subnav=digitalmoney&archive>。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上的發言來說，³⁴DCEP 的推出不僅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亦有助於人民幣擺脫依賴以美元跨境結算的美國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由於現行的國際結算制度有考慮到時差性，一旦區塊鏈的「即時性」被引入，無可避免的，當前的貿易清結算體系必然受到巨大衝擊。

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總體趨勢發展，未來 DCEP 的推動可望再加速此一進程。根據中國銀行在 2020 年 4 月發布的報告顯示，人民幣在 2019 年已經成為全球第 6 大支付貨幣，在同年也已經成為全球第 8 大外匯交易貨幣與全球第 5 大外匯儲備貨幣，人民幣在跨境結算、跨境投融資以及在全球大宗商品成為計價貨幣的重要性也相較於過去有顯著提升。目前中國已經在 9 個「一帶一路」計畫參與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也與 21 個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假如 DCEP 實現與「一帶一路」計畫參與國的金流計算，人民幣區域化與國際化的態勢將更明顯。³⁵

再者，中方透過搶先在國際間推出 DCEP，以及該模式對國家在貨幣政策制定上的啟示，也可能期望在國際間達到「示範效應」，進而在國際間推廣自身的模式。這與北京意欲推動「中國標準」的目標仍然一致。如此，美元世界霸權的地位難保不會受影響。影響所及，目前世界多國政府也紛紛展開本國貨幣數位化的研究。³⁶

與此同時，臉書在近年來推出的 Libra 貨幣亦可能對 DCEP 有推波助瀾的效果。Libra 計畫自推出後即在美國國內受到國會強力阻擋，臉書與國會之間的對談至今仍陷於泥淖；在世界各國中引起的迴響亦

³⁴ 〈黃奇帆：中國人民銀行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中國金融信息網》，2019 年 10 月 28 日，<http://rmb.xinhua08.com/a/20191028/1894989.shtml>。

³⁵ 王力宏，〈從功能深化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觀察》，第 82 期，2020 年 3 月，頁 1-24；Dylan MH Loh, “Rise of e-RMB: Geopolitics of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RSIS Commentary*, No. 117, June 2020, pp. 1-3。

³⁶ Elponcho, 〈日美歐聯合抗衡！沒有中國的七國巨頭 G7，將針對央行數位貨幣 (CBDC) 展開合作〉《鏈新聞》，2020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abmedia.io/g7-is-cooperating-on-cbdc-issue/>。

有限，目前已經大幅改變其最初打造超國界貨幣的企圖。³⁷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北京高調推動 DCEP 的動作無疑展現出巨大的反差形象。這樣一來，北京的舉措不僅是在其國內場域進一步希望再促進區塊鏈技術發展，在國際場域，中國亦期望在中美戰略競爭格局下能於科技與金融領域主導新議題的開展與進程設定。

綜上所述，中共區塊鏈發展在過去 5 年間已經取得高度成就。從政府（包括黨／中央與地方）、國營與民間企業、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來看，中國區塊鏈發展已經從下而上涉及全方位的基礎技術、應用技術以及相關法規規範；這些項目之間相互支持、亦互為補充；政府也在這個過程中由內而外，制定與推動標準。中國區塊鏈發展已為全球區塊鏈發展下不可忽視的重要觀察對象。

伍、中國當前區塊鏈技術發展的可能挑戰

就當前的投資規模與產出成果而言，中國區塊鏈的技術發展已可謂是全球相關產業的先進國。然而，這其中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有待克服。本文最後略微分析之。

首先仍然是技術本身的安全問題。³⁸ 正如任何的數位產品一樣幾乎難以保證不存在任何的安全漏洞，區塊鏈更由於本身涉及跨領域的密碼學、網路技術以及分散式傳輸協議等眾多技術，使其構成相當複雜。而欲大規模運用此技術以取代現有的運作體系，特別是 DCEP 的上路，官方的態度毋寧需要謹慎。

第二，區塊鏈平台建設與規則標準化仍然有待完善。依據不同應用場合的實際狀況，許多平台之間的原始資料庫建構完成度也不一，這進一步提高不同平台之間的後續整合困難度。同時，許多基礎與應用層面的協議、框架、標準化程度（standardization）也有待建立。再者，由於在許多方面當前區塊鏈技術本身帶來的效果未必比現有技

³⁷ Libra, “libra White Paper,” <https://libra.org/en-US/white-paper/#cover-letter>.

³⁸ Nidhee Rathod and Dilip Motwani, “Security threats on Blockchai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ol. 5, No. 5, November 2018, pp. 1636-1642; Shams Tabrez, Siddiqui Riaz Ahmad, Mohammed Shuaib, and Shadab Alam, “Blockchain Security Threats, Attack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Yu-Chen Hu, Shailesh Tiwari, Munesh C., Trivedi, and K. K. Mishra, eds, *Ambient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ystems*,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pp. 51-62.

術優越，這也影響產業投入的意願。

第三，相關領域人才仍然缺乏。儘管前文提到高等教育機構與國/民營企業已積極開設課程培養人員，人力的增長速度仍然追趕不上龐大市場的需求。根據《2018-2019 年中國區塊鏈發展年度報告》，2018 年第二季度的人才需求比 2017 年第三季的需求成長 646.83%，但僅 7% 符合門檻。³⁹ 又根據《2020 年中國區塊鏈人才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19 年的企業職位需求以及求職者投遞的比率仍有 5-13% 的落差，這些集中在技術類、產品類、管理類與行銷等。這顯示市場需求與人才供給仍然失衡。⁴⁰

第四，中國大陸威權政治體制的負面影響。透過翻閱政府相關提供予領導人員關於區塊鏈技術的科普讀物，本文發現多數內容僵化、知識偏差，文章常反覆強調堅持中心化管理思維，著眼於主導發展走向。例如，在《區塊鏈領導幹部讀本》中即有這樣的句子：「過於追求去中心化、充分的民主自由，實際上就會脫離現實 ... 設想建立一個『去中心』、無政府的網路世界和超主權的世界貨幣，完全擺脫現實世界國家法律的約束，去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獨立於國家概念的網路平台同樣是不現實的」等族繁不及備載。⁴¹ 此外，有鑑於許多政府機關囿於黨國體系思維，往往採取「一刀切」方式監管企業，在鼓勵與管理之間缺乏彈性，從長遠而言這亦無形中扼殺了區塊鏈產業發展的創新能力。⁴²

陸、結論

區塊鏈技術與其支撐的比特幣被創造的初衷是以「去中心化」甚至「反中心化」為旨，然此目的卻已在世界局勢的變動中異化。習近平執政以來戮力打造中國為「科技強國」、「網路強國」、「數字中國」，並先後推出《中國製造 2025》與《中國標準 2035》等計

³⁹ 中國區塊鏈生態聯盟、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政府、賽迪（青島）區塊鏈研究院，《2018-2019 中國區塊鏈發展年度報告》，2019 年，頁 97。

⁴⁰ 互鏈脈搏、獵聘，《2020 年中國區塊鏈人才發展研究報告》，2020 年 3 月，頁 16。

⁴¹ 任仲文編，《區塊鏈領導幹部讀本》，（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 年），頁 31。

⁴² Danny Lin，〈公有區塊鏈抗審查中國要全面納管！頒布《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要求公司註冊、用戶實名制〉，《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 月 2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gov-crypto-ban-2/>；Qiang Wang, Min Su, and Rongrong Li, “Is China the world’s blockchain leader? Evidence, evolution and outlook of China’s blockchain resear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264, 2020, p. 9。

畫。與這些目標一致，在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上，中國採取了進取型（aggressive）的姿態，從法規到實際的技術應用，推動構築成一個上下連貫的網絡。並且，隨著中美戰略競逐扮演了催化劑效果，中國國家主導一切的路線被更為凸顯與實行。

這些舉措進一步還可從「對內」以及「對外」意涵探討。就前者而言，中共推動區塊鏈技術很大一部分是著眼於技術本身有助於國內治理。過去幾年間，中國政府早已鋪天蓋地的收集民眾個資以建構全社會「社會信用體系」，2019 年底以來爆發的 COVID-19 更是推波助瀾，中國政府得以完善其資料庫。儘管這些個別運行的大型資料庫之間未必有順暢地橫向聯繫，但可以想見的是，一旦政府克服現有缺陷，並搭配區塊鏈技術的優勢，政府對整體社會的監控能力將可更大幅度的提升。而有鑑於區塊鏈技術高度仰賴加密技術，《密碼法》的出台與實行將可用來輔助政府對該技術的掌控。此外，就該法目前所載的內文而言，該法未來可能成為其他更細則法律的母法，而有更廣泛的用途。

在對外的意涵上，習近平也早已經明確地將區塊鏈的技術發展提高至國家戰略的高度。中國政府意欲主導未來全球產業界在相關技術與規格制定已是各國高度關注的議題。

最後，針對兩岸關係的特殊情勢以及兩岸人民來往的密切，本文提出以下幾點事項供實務界與相關人士進一步研議。首先，因應 DCEP 的上路、衝擊等政策，其重要性自不在話下。再者，針對區塊鏈被應用至中國社會的各方層面，包括文件儲存、金融徵信、社交通訊與身份驗證等影響，相關單位亦有必要關注。

第三，面對中國大力推動其國內標準國際化的舉措，相關單位可共同與產學界思索因應辦法。事實上，依據個別產業的情況，中國區塊鏈發展對我國的影響本來就可能有所差異。對於兩岸產業處於競爭狀態者，中國高度整合的模式恐將借助區塊鏈之效益而再大幅增加其優勢。相比之下，我國長期以來在政策立場多與美歐各國類似，主要採取鼓勵多元發展，而不過度介入。例如，在 2019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成立「區塊鏈大聯盟」，政府仍以促進產官學合作的橋梁角色自居。然而，中國目前在世界區塊鏈研究已獨占鰲頭。2019 年上半年全球區塊鏈企業發明專利排行榜中，中國公司在前 10 名中占有 7 名，前 2 位更是阿里巴巴的關係企業螞蟻金服與中國三大

金融集團之一的中國平安；百度、中國聯通均榜上有名。可以預測，未來，隨著中國大陸地區企業藉由進一步整合所帶動的增長優勢恐非我國相關產業能競爭。我國該思考台灣相對優勢之處，集中資源發展以為因應。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任仲文編，《區塊鏈領導幹部讀本》，（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

帥青紅、段江、夏可，《區塊鏈+時代：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台北：崧燁文化，2019年）。

龔鳴，《寫給未來社會的新帳本—區塊鏈》，（台北：大寫出版，2019年）。

二、專書譯著

Melanie Swan 著、沈佩誼譯，《區塊鏈》，（台北：基峰資訊，2018年）。

三、專書論文

Tabrez, Shams, Siddiqui Riaz Ahmad, Mohammed Shuaib, and Shadab Alam, “Blockchain Security Threats, Attack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Yu-Chen Hu, Shailesh Tiwari, Munesh C., Trivedi, and K. K. Mishra, eds, *Ambient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ystems*,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pp. 51-62.

四、學術性期刊論文

王力宏，〈從功能深化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觀察》，第82期，2020年3月，頁1-24。

Rathod, Nidhee and Dilip Motwani, “Security threats on Blockchai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ol. 5, No. 5, November 2018, pp. 1636-1642.

Wang, Qiang, Min Su, and Rongrong Li, “Is China the world’s blockchain leader? Evidence, evolution and outlook of China’s blockchain resear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264, 2020, pp. 1-24。

五、官方文件

〈中國區塊鏈技術和產業發展論壇成立大會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6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5290031/content.html>。

〈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16 年 12 月 15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60221.htm。

〈國務院關於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17 年 7 月 8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13/content_5231524.htm。

〈國務院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1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1/27/content_5242582.htm。

〈國家標準委新建一批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samr.gov.cn/bzjss/sjdt/gzdt/201911/t20191119_308640.html。

〈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 年 1 月 10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2298.htm。

六、非學術性雜誌、研究機構報告

互鏈脈搏、獵聘，《2020 年中國區塊鏈人才發展研究報告》，2020 年 3 月。

中國區塊鏈生態聯盟、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政府、賽迪（青島）區塊鏈研究院，《2018-2019 中國區塊鏈發展年度報告》，2019 年。

杜貞儀，〈中國《密碼法》之分析〉，《國防安全週報》，第 80 期，2020 年 1 月，頁 1-4。

許慈真，〈中國密碼法淺析〉，《北美智權報》，254 期，2020 年 2 月 12 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mainland/IPNC_200212_0802.htm。

Loh, Dylan MH, “Rise of e-RMB: Geopolitics of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RSIS Commentary*, No. 117, June 2020, pp. 1-3.

七、網際網路資料

〈七家黨媒 1 周發布 62 篇區塊鏈報導：新華社發文最多，人民日報系最關注數據和產業〉，《互鏈脈搏》，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coingogo.com/news/38600>。

〈十問數字人民幣：哪能用？會取代紙幣？與支付寶有何不同〉，《新京報網》，2020 年 4 月 21 日，<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20/04/21/719185.html>。

〈中國人民銀行推進「國家統一認證體系」，為 11 種支付、區塊鏈等金融技術嚴格把關〉，《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announces-new-regulatory-authority-to-certify-digital-payments-blockchain-products/>。

〈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26/c_1125156896.htm。

〈重大警訊：中國央行整治「交易所 區塊鏈應用」文件遭證實；幣安、波場官方微博遭封鎖〉，《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1 月 18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big-signal-china-will-ban-exchange-and-project/>。

〈區塊鏈不等於虛擬貨幣 監管部門重申嚴打炒幣行為〉，《人民網》，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19/1126/c1004-31474467.html>。

〈採雙層運營體系 可控匿名〉，《文匯報》，2019 年 9 月 3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9/03/FS1909030004.htm>。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

- 展〉，《新華網》，2019年10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0/25/c_1125153665.htm。
- 〈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18年5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29/c64094-30019426.html>。
- 〈習近平定調為國策後，區塊鏈火了，官媒密集推出區塊鏈科普：什麼是區塊鏈？〉，《微信上的中國》，2019年10月28日，<https://chinaqna.com/a/99700>。
- 〈黃奇帆：中國人民銀行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中國金融信息網》，2019年10月28日，<http://rmb.xinhua08.com/a/20191028/1894989.shtml>。
- 〈傳聞中的法定數字貨幣真的來了！〉，《人民網》，2020年5月14日，<http://ip.people.com.cn/n1/2020/0514/c136655-31708570.html>。
- 〈廣州印發《加速區塊鏈引領變革措施》鼓勵設立10億元區塊鏈基金〉，《中國外貿網》，2019年10月31日，<http://www.faiyi.com/block/20191031/32529.html>。
- 01 Binary，〈關於中國央行數位貨幣 DCEP，讀完這篇文章才算是懂了！〉，《動區 BLOCKTEMPO》，2020年4月26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dcep-central-bank-digital-currecny/>。
- Binance Research，〈Binance 幣安研究：大眾對中國央行「數位人民幣 DCEP」的迷思（完整報告）〉，《動區 BLOCKTEMPO》，2020年4月27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a-cbdc-dcep-cryptocurrency-revolution-binance/>。
- Candy Her，〈華為 (Huawei) 與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院」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動區 BLOCKTEMPO》，2019年11月5日，<https://www.blocktempo.com/pboc-digital-currency-research-institute-huawei-fintech-research/>。
- Danny Lin，〈公有區塊鏈抗審查中國要全面納管！頒布《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要求公司註冊、用戶實名制〉，《動區 BLOCKTEMPO》，2019年1月2日，<https://www.blocktempo.com/pboc-digital-currency-research-institute-huawei-fintech-research/>。

com/china-gov-crypto-ban-2/。

DAO 區塊鏈智庫，〈陳純：聯盟區塊鏈關鍵技術與區塊鏈的監管挑戰〉，《鏈聞 CHAINNEWS》，2019 年 10 月 28 日，<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957872019898.htm>。

Elponcho，〈日美歐聯合抗衡！沒有中國的七國巨頭 G7，將針對央行數位貨幣 (CBDC) 展開合作〉，《鏈新聞》，2020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abmedia.io/g7-is-cooperating-on-cbdc-issue/>。

Jason Liu，〈中國首例！工商銀行 ICBC 發表《區塊鏈金融應用白皮書》，佈局欲領導產業方向〉，《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chinese-bank-unveils-the-banking-sectors-first-blockchain-white-paper/>。

Jason Liu，〈騰訊獲中國國家稅務局批准，為「區塊鏈發票」制定全球統一標準〉，《動區 BLOCKTEMPO》，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tencent-to-lead-drafting-of-international-blockchain-based-invoice-standard/>。

Rosie Wu，〈首創！中國華為發表 Mate 40 系列手機，支持「數位人民幣」硬體錢包〉，《動區 BLOCKTEMPO》，2020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huawei-mate-40-digital-yuan-hardware-wallet/>。

比特律，〈《密碼法》頒布的意義及行業趨勢〉，《鏈聞 CHAINNEWS》，2019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22054647346.htm>。

央視新聞客戶端，〈最近頻頻被點名的「區塊鏈」到底是個啥〉，《央視網》，2019 年 10 月 27 日，<http://m.news.cctv.com/2019/10/27/ARTIU0KggD88iWFv9DYvI9O4191027.shtml>。

任之劼，〈技術解讀央行數字貨幣 DCEP：架構、匿名性、錢包、雙離線支付等〉，《鏈聞 CHAINNEWS》，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033862459902.htm>。

金佳緒，〈政治局集體學習專議這項技術發展，習近平有何深遠考量〉，《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xxjxs/2019-10/29/c_1125164384.htm。

區塊妹 Mel，〈中共勢要成就區塊鏈是必然？探究習近平如何一語轟動全球〉，《區塊客》，2019 年 10 月 28 日，<https://blockcast.it/2019/10/28/xi-jinping-wants-china-to-take-the-leading-position-in-blockchain/>。

陳建奇，〈央行數字貨幣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FT 中文網》，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615?topnav=innovation&subnav=digitalmoney&archive>。

Kharpal, Arjun, “Power is ‘up for grabs’: Behind China’s plan to shape the future of next-generation tech,” *CNBC*, April 26,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4/27/china-standards-2035-explained.html>.

Libra, “libra White Paper,” <https://libra.org/en-US/white-paper/#cover-letter>.

Michael, “China’s National Digital Currency DCEP / CBDC Overview,” *BOXMING*, June 4, 2020, <https://boxmining.com/dcep/>.

Nakamoto, Satoshi,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bitcoin, May 24, 2009,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Tang, Frank, “China includes McDonald’s, Starbucks, Subway on list of foreign firms to test digital curren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3, 2020,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81291/mcdonalds-starbucks-subway-among-foreign-firms-set-test>.

Zhong, Raymond, “China’s Cryptocurrency Plan Has a Powerful Partner: Big Brothe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8/technology/china-cryptocurrency-facebook-libra.html?_ga=2.255420044.584171952.1573183874-423200469.1572396114.

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之調整： 威脅平衡視角之探討

蔡東杰

特聘教授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盧信吉

博士後研究員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摘 要

針對後冷戰時期環境變遷，在 1996 年通過「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日本並於 1999 年根據新防衛指針制定「有事三法」後，不僅 2005 年美日「2 + 2 協商」達成「共同戰略目標」，繼 2006 年提出「實施整編之美日路線圖」將安保對象擴及全球反恐，美日更於 2015 年公布新版「防衛合作指針」，做為 21 世紀同盟轉型的綱領性文件，其結果除了可能擴大雙方防衛合作範圍之外，主要來自中國之外部威脅感上升，一方面成為安倍政權 2012 年以來持續擴軍與配合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布局之背景，至於全球結構變遷與美中互動後續發展，亦可能影響美日同盟之下一階段內涵。

關鍵詞：威脅平衡、中國崛起、日美同盟、同盟戰略

Adjustment of Japan's Alliance Strategy: Perspective of Balance of Threat

Tung-Chieh Ts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Hsin-Chi Lu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1996 and adoption of the Three Emergency Related Laws in 1999, US-Japan relations began to improve rapidly. Not only did the “two plus two dialogue” in 2005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strategic scope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Asia Pacific and mention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2006 “realization of the revised US-Japan roadmap” further expanded the objective of the joint alliance to global anti-terrorism. Such moves suggest that Japan will be completely embedded in Washington's global strategy and its main task will be to complement US strategy and contain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level of external threats which mainly from China increase and Japan continues its military expansion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he US-Japan alliance can be expected to adjust accordingly as well.

Keywords: *Balance of threat, China rise, Japan-US alliance, Alliance strategy*

壹、前言

儘管在美國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因珍珠港事變對日宣戰後，美日兩國直到 1945 年 8 月均處於戰爭敵對狀態，隨著戰後美國占領日本以及尤其韓戰在 1950 年陡然爆發，在日本未完全取回主權的情況下，雙方首先在 1951 年 9 月《舊金山和約》簽署日同時簽訂了一項《安全條約》，正式為軍事同盟關係鋪路，並於 1960 年修正為《美日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美日安保條約），從而建構了迄今長達 70 年的同盟關係。

從某個角度來看，前述同盟最初乃美國建構戰後世界與區域秩序安排之一環，未必全然基於雙方互利，因此，至少在 1959-60 年修約過程中曾在日本內部引發激烈辯論乃至大規模示威抗議浪潮，成為戰後最大規模社會運動，不僅迫使岸信介內閣下台與艾森豪取消訪日，1970 年續訂條約時再度引發抗爭活動。基於冷戰權力結構現實及其後內涵變遷，一方面美日曾於冷戰後期的 1978 年與後冷戰時期的 1997 年兩度制定防衛合作指針，針對同盟運作方向進行微調，另方面則日本完成戰後重建與經濟迅速發展，在提升國力之餘亦浮現更多自主利益思考，加上 1990 年代「假想敵」消失（蘇聯崩解與中國崛起尚未明朗化）帶來的結構性影響，都促使日本不斷重新審視與反思此一同盟的未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全球與區域環境持續迎來重大變化，美日雙方在 2015 年又制定了新防衛指針，雖顯示彼此存在維繫同盟之共識，從原先「美主日從」浮現逐漸朝平行結構邁進之跡象，不僅日本在同盟框架中的自主性有所提升，其戰略思考或將為同盟未來提供更大的影響力。

面對此一新的轉折發展，為深入理解日本自身國家安全思考重點，對美日同盟未來之可能安排，以及在外交合縱連橫中面臨之挑戰，除了針對政策內涵進行文獻分析，本文將聚焦「同盟戰略選擇」，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威脅平衡研究途徑切入，在簡單回顧並檢視理論之餘，試圖從更動態之周邊環境與現實利益評估角度，瞭解日本下一階段對美國同盟政策之可能脈絡。

貳、國際現實主義發展脈絡之遞衍

一、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及其互動

以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歷史（尤其是歐洲部分）發展作為觀察基礎，現實主義者（realist）向來將其國際關係研究聚焦於所謂「權力」（power）論述，認定國家行為者普遍傾向透過追求並累積權力，換取在國際殘酷考驗下的存活機會；¹ 據此，其辯證主軸集中於「權力」的定義、運用、策略或效果，尤其是將權力之思考與運用融入國家行為者之決策過程與具體作為。然而，權力運用顯然並非只是某種「主觀」認定下的結果，行為者對「客觀」國際現實狀態之檢視與判斷既同樣重要，此一外部變數亦經常被描述為「無政府狀態」，亦即因為不存在高於各國之權威，致使國家行為者必須自力更生，尋找在此不確定環境下存續的最大機會。由於「無政府狀態」同時暗示國家行為者的權益除「自救」外沒有其他司法保障，在高度危機意識感導致手段選擇缺乏道德篩選的情況下，從而不斷浮現並形成現實主義者所稱之「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²

除了國家行為者個別擁有之權力外，具結構性特徵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乃影響國際關係的最重要環境變數。³ 例如世界大戰結束後，在 1950-80 年代形成的世界就被認為具有「兩極體系」（bi-polar system）特徵；⁴ 前述結構特色不僅制約了多數國家的外交決策與對外行為，高度重視此一結構變數的看法通常也被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無論如何，在冷戰隨著蘇聯於 1991 年崩解而告終結後，表面上由於美國的相對力量看來如此強大，以致部分學者認為此種優勢至少可持續幾十年，甚至「單極體系」（uni-polar system）來臨也是可預期的。⁵

¹ William E. Scheuerman, *Hans Morgenthau: Re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² John Herz,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p. 411-416;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³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James L. Ray, *Global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pp. 515-517.

⁴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p.76.

⁵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Michael Brown et al.,

當然，與此相對的保守看法並非不存在，⁶ 美國所謂「單極霸權」事實上也有明顯力有未逮的例證（尤其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後），一方面不啻削弱了由霸權主導國際體系的制約性，也讓原本受結構約制的國家自主性有了伸展空間；由此，為更有效解釋部分大國外交政策偏離體系要求的現象，現實主義乃被迫引入更多國內政治、文化觀念與地緣位置等新變數，其中，由於觀察焦點更多地從體系層次轉向國內利益思考層次，此種新理論方向也被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⁷

倘若回頭檢視傳統現實主義的主張，尤其是 Hans J. Morgenthau 的假設，⁸ 或許不難發現，其針對行為者在自然環境中的競爭結果相對較為悲觀；非但政治受限於人性深處客觀規律，致使行為者與環境之間充滿牽制與羈絆，領導人根據自訂權力目標與利益內涵而行動，亦未必全然符合「理性」，除此之外，「生存」被設定為所有國家行為者之最基本目的與核心利益，不僅經常被擴大詮釋，且因抽象和普遍道德原往往不適用於國家，從而讓手段選擇充滿「道德風險」。更重要的是，為了生存而追求自我保存固然是邏輯下的結果，很顯然，即便擁有相對較多權力要素的國家，也未必能滿足自保目標，由此讓建立同盟（alliance）成為某種替代選項。問題是：相較追求生存，同盟既是一個政策選項，也應有其催化性起點。對 Morgenthau 等古典現實主義者而言，同盟乃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下的自然條件反射，⁹ 也就是國家行為者面對國際均勢可能被打破以致影響其生存時的選項，但此種說法很難進行操作性觀察；對此，例如以 Stephen Walt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者，便在冷戰後期轉而更重視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影響，至於在冷戰結束後，面對聯盟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 305, 309.

⁶ See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9);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⁷ See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ffer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3, 2000/2001, pp. 131-132.

⁸ 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2005).

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192-203.

特徵呈現出的新變化，尤其因蘇聯瓦解導致威脅頓失的影響，例如 Randall Schweller 便從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角度出發，¹⁰ 說明國家在均勢穩定且未必面對威脅的情況下，仍可能以考慮自身利害關係為前提，與強權結盟以獲取和確保利益。

二、威脅平衡概念之論點與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條件反射性的權力平衡假設，無論威脅平衡或利益平衡雖然都為國家選擇同盟政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觀察假設，但若回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前提，至少就邏輯而言，威脅平衡還是更具「一以貫之」特徵，至於利益平衡則不啻有部分自由制度主義的影子。

Stephen Walt 在《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書中試圖解答：「國家為何結盟」這一問題，從而引導出所謂「威脅平衡」概念。¹¹ 相較傳統上將同盟視為制衡特定國家或聯盟之「不對稱」手段之一，儘管美國在冷戰後期或後冷戰時代中擁有強大實力，顯然並未出現「權力平衡」之邏輯預測結果，亦即未有其他國家組織了一個廣泛的反同盟以平衡美國的權力，對此，Walt 指出或許「威脅」是比「權力不對稱」更關鍵的變數，並提出 4 項威脅構成要件：¹² 首先是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包括人口、工業與軍事能力、技術水準等），此一實力不僅將成為決定制衡或追隨強者的動因，一般來說，一國綜合實力越強，對他國構成之潛在威脅亦愈嚴重；其次是地緣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亦即與本國鄰近的國家，比距離相對遙遠的國家更可能構成安全上的威脅；第三是進攻實力（offensive power），也就是將國家綜合實力與地理條件等要素轉化為軍事攻擊的潛在能力（例如有效動員大規模軍事能量），當其他要素相同時，進攻能力強大者更可能形成威脅並促使他國產生制衡動機；最後是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一國顯示出的侵略意圖越強，越可能促成同盟成立，對前述意圖之認知乃同盟成立最關鍵因素。

¹⁰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 72-107;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

¹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²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22-25.

Walt 指出，事實是國家未必會單純針對體系內權力消長而改變其政策，必須視其他國家的政策意圖與行為而定；如果崛起中的區域強國具有挑戰現狀之意圖，則相關國家將針對此一威脅採取平衡或圍堵政策，以防範體系秩序與穩定遭到挑戰；換言之，國家的平衡行為（balancing behaviors）並非僅僅針對國家之間權力消長而來，而應該理解為面對威脅時的認知反應，從而也回歸了現實主義重視權力鬥爭（struggle for power）的傳統觀點，並修正新現實主義者將體系結構制約凌駕於國家外交政策的想法。¹³ 至於因感知安全「威脅」所進行的同盟，可分為扈從（bandwagoning）與制衡（balancing）兩類，前者指交好威脅來源國以便轉移威脅，或在該國未來獲勝時分享利益，後者則接近傳統權力平衡假定，指為了避免受強國侵犯控制而展開結盟。於此同時，Walt 也探討了大國與中小型國家應對威脅時的行為差異，相較後者主要關注自身生存安全，大國則可能採取積極平衡或限制對手收益的政策，又或者採取某種容忍性調適交往政策（policies of accommodation or engagement），以使得其趨於支持現狀；即使假想敵地位與權力尚不及己。¹⁴

近年來，無論美國或日本，「中國威脅」（China Threat）概念既充斥於其安全報告中，往往也是它們設定與調整自身戰略布局，乃至決定彼此互動模式之思考邏輯與政策正當性來源。在此，本文試圖以日本為例，分析它在冷戰結束後如何重新定義自身國家安全威脅內涵，並據此調整與美國的同盟框架以及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方向，希望有助於瞭解並預測其未來同盟策略之發展。

參、日本同盟策略選項與檢證

一、中國崛起與美日同盟之調適回應

根據 Stephen Walt 在「威脅平衡論」框架下，運用國家行為者「位置」（物質因素）與「身分」（非物質因素）來觀察國際關係變化的

¹³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59-60;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88.

¹⁴ Maria Papadakis and Harvey Starr,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Small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409-422.

分析視角，如何應對近期日趨明顯之「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不啻當前西太平洋或東亞主要國家之戰略佈局思考核心，尤其著重它對區域權力平衡造成之衝擊，¹⁵ 特別是諸如「新絲綢之路」或「一帶一路」等新的政策概念，或暗示中國已將其戰略布局從歐亞大陸邊緣擴及其心臟地帶，甚至愈來愈趨向與俄羅斯聯手構建新歐亞大戰略，¹⁶ 致使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在 2013 年針對「中國與中亞關係」舉行的聽證會中，¹⁷ 便指出近期中國大量資本輸出將很可能在控制中亞經濟後，使其得以對該地區政治發展施加重大影響，因此強調並建議美國必須在亞太地區有所作為。¹⁸ 事實上，在 2013 年「一帶一路」概念浮現後，隨著 2014 年推動建設工作會議並組織工作小組、2015-16 年推動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2017 年起定期召開國際高峰論壇等，不僅政策積極性持續提升，也為既存霸權美國與周邊國家（包括日本）帶來一定程度之壓力。

除此之外，鑑於新型大國關係乃中國對美國追求「對等外交」（diplomacy for equality）的結果，亦即目標是向美國「爭平等」，儘管從北京角度來說，此一政策頂多是希望「分享」頂層地位而非「挑戰」霸權，但因「修昔底德陷阱」本即源自作為美國外交指導原則、從零和競賽出發的現實主義邏輯，¹⁹ 這意味著中國必然是美國領導下

¹⁵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p. 98-107; Elizabeth Economy,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 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809-832.

¹⁶ 趙葆珉，〈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2 期，2012 年 3 月，頁 101-109；李興等，《亞歐中心地帶：俄美歐博弈與中國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3 年）。

¹⁷ "China's rapi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s in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hearing befor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 April 16 2013, Serial No. 113-22,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3hhrg80462/pdf/CHRG-113hhrg80462.pdf>

¹⁸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trategic Forum*, No. 231, April 2008, <https://www.files.ethz.ch/isn/55111/SF231.pdf>.

¹⁹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的現狀「挑戰者」。據此，中美關係不僅是「當前世界主要國家中矛盾最深刻的一對關係」，²⁰ 由於將中國視為「正在崛起且不滿當前國際秩序現狀之大國」，即便優勢正逐漸消失，亦很難想像美國選擇採取放棄領導權的政策。當然，這未必暗示雙方必然爆發大規模衝突。尤其在具有濃厚相互依賴特徵的全球化環境當中，例如 Susan Shirk 便指出，「中美經濟日趨相互依賴，扭轉了中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思考方向」，尤其「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更使中國必須小心維護與美國這位大買家的關係」；²¹ 儘管如此，美國日益惡化的財政負擔顯然正衝擊著前述關係，結果首先是讓雙方地位更加「平等化」，並使華府對中國戰略作為透露出「硬的更硬，軟的也硬」的新走向，無論強化區域軍事部署措施或不斷擴大演習規模、藉由超強話語權在東亞與全球繼續形塑「中國威脅論」氛圍，乃至 2018 年正式發起「貿易戰」等，無疑都反映出美國對當前現實發展之某種焦慮感。²²

對日本而言，儘管在經濟（泡沫困局）與政治（政黨輪替）因素牽絆下，日本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一度有所遲疑，日本最終仍選擇了強化美日同盟的道路，例如 2012 年版《東亞戰略概觀》報告中便強調，日本應設法實現「動態日美防衛合作」、加強自衛隊在西南諸島力量，推進並構築日美韓和日美澳安保同盟網絡，同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擴大國際裝備合作等。²³ 總的來說，當前美日雙邊關係呈現以下 3 個新特徵：首先是假想敵由冷戰時期的蘇聯轉為目前的中國；其次，聯合行動由保守防禦轉趨積極，甚至暗示先制打擊之可能，這可以從雙方於 2015 年通過一份「新防衛指針」以及日本在 2016 年正式實施《新安保法》以落實「解禁集體自衛權」看出；第三則是雙方互動更趨於平等，不僅回應日本自 1980 年代以來推動「普通國家化」長期追求的「平行外交」目標，也反映出美國受困於

²⁰ 王緝思，〈中美關係：尋求穩定的新框架〉，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13。

²¹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0-251.

²² 根據美國官方說法，貿易戰源自主要反映於逆差之「不平等貿易結果」，根據其官方數據，美中自 1985 年起出現貿易逆差，分別在 1990、2002、2005、2012 年跨過 100 億、1,000 億、2,000 億與 3,000 億大關，2017 年來到 3755 億美元，甚至 2018 年還在貿易戰中創下 4192 億美元的歷史最高點。

²³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2012,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

金融海嘯與國內財政壓力的現實，因為可以從美日安保體制轉型中看出（尤其在超越「周邊有事」規範之後），日本扮演角色將逐漸吃重，美國需要日本的協助，不再只是「專守防衛」。²⁴

從某個角度來說，「安倍外交」其實頗接近所謂「小泉外交」，差別在於小泉純一郎希望利用美國 George W. Bush 時期的「全球反恐」，提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間接遂行「正常國家」的建構，安倍則藉由呼應 Barack Obama 之「再平衡」戰略，將美日同盟引導擴大與南韓、澳洲、印度等美國亞太安全盟邦之連結，並以此為正當性來源，實現自中曾根康弘時期以來的「戰後政治總清算」目標。²⁵事實上，安倍在 2006 年底首度執政時，便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新方針，目標則在聯合亞太各國與日本共畫一道同盟弧線以建構隱性之「中國包圍圈」，2012 年再度組閣後，新口號改成「自由海洋之弧」，不僅在戰略上與美國愈發接近，目標還是構建一個「中國包圍圈」。²⁶2017 年，安倍在前述構想上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希望將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作為重視自由、法律和市場經濟的場域，推動基於國際法的基礎建設、貿易投資和海洋安全合作，²⁷在 Trump 於同年 11 月在 APEC 中也宣示將推動「印太戰略」後，外相河野太郎 2018 年 4 月在內閣會議上進一步報告日本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主要精神為讓「法治」在此地區紮根，並宣稱將在確保海上交通安全和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援助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協助加強其海上執法機構的能力，儘管 2018 年底安倍在出席 ASEAN 與 APEC 高峰會時將前述戰略改稱「印太願景」（Indo-Pacific Vision），配合美國在南海反制中國之意味大致上仍相當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周邊軍事行動加大與美國強化反制，日

²⁴ 〈解禁集體自衛，日承認專守防衛概念轉變〉，《中央通訊社》，2015 年 6 月 1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010439-1.aspx>。

²⁵ 〈安倍展開日本戰後外交總清算〉，《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1 月 13 日，<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32991-2018-11-13-05-00-40.html>。

²⁶ 蔡東杰，〈安倍新政權時期：外交戰略轉型〉，收於李世暉等著，《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6 年），頁 98。

²⁷ Michael D. 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本一方面在 2019 年修改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標準，針對從福建起飛的所有中國戰機加強應對措施，在同年 5 月與美國、印度、菲律賓於南海展開聯合演習後，美國、日本與澳洲再度於 2020 年 7 月於菲律賓海進行演習，美日兩國也在同盟屆滿 60 周年之際誓言強化雙邊關係。

二、近年日本官方白皮書內容檢視

具體來說，近年日本對於自身安全之威脅認知，可以從官方出版《防衛白皮書》（日本の防衛）內容一窺究竟。例如 2018 年版白皮書共 441 頁，分為「圍繞我國的安全保障環境」、「我國的安全保障，防衛政策與日美同盟」、「徹底守衛國民生命，財產和領土，領海，領空的活動」等 3 部分；²⁸ 其中，針對中國軍事發展部分延續過去幾年指責北京軍費用途欠缺透明化的看法，特別指出其軍事已加入「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政治項目，至於在軍事威脅感受之描述，則包括中方在釣魚台（尖閣諸島）周邊軍事活動之質量提升與定期化，並列舉中國核潛艇自 2004 年起頻繁進入日本領海、軍艦在 2013 年違反國際法對日本護衛艦實施火控雷達照射、以及 2018 年轟 6 戰機進入日本海上空等記錄。

接著，2019 年版白皮書分為 4 大部分，內容包含「圍繞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衛政策」、「日本防衛三大支柱（為達到防衛目標的手段）」，以及「防衛力量的核心要素」等。²⁹ 與過去相同之處，在於論述日本外部國際社會變遷描述佔了白皮書前兩部分，至於差異處則在於將日本國內應對措施分別列舉為防衛支柱與核心要素，其中，第三部分包含美日同盟與多邊安全保障合作等，另一部分則列舉資源、人力調派等內部舉措。中國部分，則主要描述其軍改後續進程，尤其重視其飛彈能力發展與愈趨頻繁穿越第一島鏈之活動，以及透過「一帶一路」經濟構想擴大影響力並為中國軍隊前進印度洋與太平洋鋪開道路；如同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所言：「中國正迅速增加軍事支出，因此我們必須有更多版面加以描述」，他也直接指出中國軍力加強已成為日本主要威脅，勝過北韓核武以及與俄羅斯

²⁸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8," 2018,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

²⁹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9," 2019,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9/DOJ2019_Full.pdf

的領土紛爭。

2020 年版白皮書同樣分為 4 大部分，³⁰ 包括日本周邊安全保障環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衛政策、日本防衛三大支柱，以及防衛力量核心要素等，除了將防衛概念的說明區隔為內外層次，並列出當前疫情之影響外，針對中國方面則指出其軍隊現代化目標是讓解放軍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一流軍隊」，至於其不斷駛入釣魚台周邊海域，「執拗」企圖片面改變現狀之嘗試，不斷透過散布假訊息進行宣傳工作，以及台海兩岸軍事平衡已朝對中國有利方向傾斜之發展，加上正試圖利用全球肺炎疫情建立「有利於己的國際秩序」等，都不啻使其成為區域安全最大挑戰。

檢視 2018-20 年防衛白皮書內容，顯見日本對當前國際環境與秩序內涵充滿不確定性，包括大國（美中對抗）結構變遷、先進科技（假訊息）的影響、崛起大國（中國）挑戰現狀加劇，乃至非傳統安全（新冠病毒）侵擾等，一方面深化了日本的周邊安全威脅，至於印太地區依舊缺乏有效安全保障機制，以及灰色地帶議題之常態化與可能出現突發惡化等，更必須持續關注。對此，日本其實早在 2012 年版白皮書中便強調，應設法實現「動態日美防衛合作」並構築日美韓和日美澳安保同盟網絡，同時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擴大國際軍事裝備合作等建議。除此之外，隨著 1995 年「中國威脅論」開始浮現，防衛研究所一方面自 1996 年起每年發布《東亞戰略概觀》，持續關注周邊安全情勢與中國角色變化，更自 2010 年起每年發布《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5 年除外），這也是日本唯一鎖定特定國家發布之官方報告，目標相當明確。例如 2020 年版《東亞戰略概觀》便指出中國可能跨越第二島鏈在西太平洋全境展開軍力，戰略選項之一是從背後瞄準美軍太平洋據點關島，從而引發新冷戰。³¹ 於此同時，應對中國首艘自製航母山東艦在 2017 年下水並於 2019 年正式服役，日本在 2018 年 12 月批准的《防衛計畫大綱》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中，也針對海上自衛隊發展部分提及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將研擬搭載 F-35B 戰機「使短距起飛、垂直著陸飛機的運用成為可能」，從而使其朝「航母化」發展以強化反制戰力。

³⁰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20," 2020,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

³¹ 〈日本防衛省東亞戰略概觀，指中國在西太平洋擴軍〉，《中央通訊社》，2020 年 4 月 1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100399.aspx>。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除了持續關注兩岸軍力失衡問題，一方面北京正式凌駕北韓成為其主要威脅，對於中國威脅之描述焦點更逐漸從「行為面」轉向「戰略層次」，顯示出某種感知升級之現象。

肆、日本之戰略思考與政策變遷

一、國家利益思考重點演進

無論日本最終戰略與政策選擇為何，根據現實主義邏輯，出發點必然是其主觀設定下的國家利益；對此，可分成以下幾個層面觀察。³²首先，基於所處地緣環境與日本自冷戰時期以來的發展結果，由於經貿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東亞地區任何可能衝突與經濟動盪均勢必影響到日本的和平發展，至於為維繫區域穩定以保障國家利益，日本必須致力防止國家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升級，促進地區問題和平解決，並針對不確定性安全因素（新世紀初期鎖定北韓，近期則聚焦中國威脅）尋求共同（與美國同盟）對策。除了區域穩定性，其次則必須防止周邊出現可能為日本安全帶來負面影響之敵對國家或政權（北韓或中國），當然，日本首要選項乃是尋求創造雙贏局面，但一方面深受國內民族主義影響，另一方面在美日峰會於 2014 與 2017 年（日本為安倍，美方則是 Obama 與 Trump）兩度公開宣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台議題的情況下，日本既成為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與推動印太戰略樞紐之一，在 2018 年貿易戰升高美中對立之餘，勢必影響日本處理與周邊假想敵（中國）之關係。

第三則作為工業大國，日本自然著力保護從中東經由麻六甲海峽，再由南海向北抵達日本的「海上生命線」航道，這也是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對此，除仰賴美國第七艦隊與「南海自由航行」維護航線安全之外，日本也積極參與處理海盜、恐怖主義等問題的國際合作。最後，受到全球化影響，日本認為東亞地區不斷深化之經濟相互依存，需要各國彼此協調合作，才能透過共享地區整體利益，並藉此實現自身國家利益，因此應該在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中發揮主導作用。

據此，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期望以美日同盟為依託，藉此尋求突破戰後《和平憲法》下「專守防衛」帶來之限制以實踐不同階段的國

³² 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譯，《日本走向何方》，（北京：中信出版，2009 年），頁 93-97。

家利益設定，³³ 在認為中國經濟崛起乃「機會而非威脅」的前提下，2001 年底提交的《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指出，³⁴ 維護日本和平與安全、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結構、維護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以及積極推動國際學術、文化和教育交流等，為國家核心利益所在，至於北韓核武與中國軍事現代化分別是短期與中長期安全威脅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小泉時期略有突破但仍基本保守的態度，在 2006 年繼任的安倍晉三在 2007 年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動作引發各方關注，儘管隨後卸任，在 2012 年再度組閣之後，又繼續在 2013 年 12 月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和新版《防衛計畫大綱》，2014 年 1 月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與 4 月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後，7 月更透過閣議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接著則是在 2015 年與美國發表新版《防衛合作指針》並正式於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制」。³⁵ 進言之，前述發展反映出安倍政權揭棄之「積極的和平主義」原則；³⁶ 相較過去透過自身非軍事化來落實世界和平的「消極的和平主義」，如今日本則希望以「普通國家化」為出發點，強化自身能量並走出國門以直接作為貢獻於世界和平。³⁷

二、安倍時期日本對外戰略與政策方向

2010 年的釣魚台撞船事件，一般被認為是中美日關係發展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儘管中日關係在小泉時期（2001-06）略有齟齬，無論 2006-09 年自民黨政權（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抑或 2009-10 年的民主黨政權（鳩山由紀夫、菅直人），至少都因經濟因素而選擇不直接挑戰北京；無論如何，由於中國自此打破「擱置爭議」原則，正式介入釣魚台主權爭議，加上美國「重返亞洲」推波助瀾，都讓日本開始調整過去的消極態度，自 2010 年起每年出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例如 2011 年版便指出中國正從「近洋國家」逐漸發

³³ Michael J. Green, "Balance of Power," in Steven K. Vogel, ed., *U.S.-Japan Rel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 9.

³⁴ 金熙德，〈戰略創新乎，戰略貧困乎：評《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日本學刊》，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48-60。

³⁵ 古詩涵，〈新安保法制之戰略意涵與影響〉，《國會季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6 月，頁 85。

³⁶ 安倍晉三在 2013 年 10 月 12 日於首相官邸召開關於國家安全戰略之座談會上首度提出。

³⁷ 北岡伸一，〈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走進日本》，2014 年 4 月 22 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展為「遠洋國家」，將對日本及美日安保體系造成極大威脅，至於野田佳彥首相在 2011 年底宣布將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亦不啻象徵自鳩山內閣以來，美日同盟的漂流危機終於結束。³⁸

前述轉變也反映在 2006 與 2012 年兩度安倍內閣的路線差異上。相較第一次組閣時的相對保守並嘗試推動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2012 年二度就任首相後，安倍晉三隨即在一年內出訪 24 個國家，其中半數以上位於東亞，並毫不掩飾指出中國擴張帶來的威脅，公開警告東海與南海已快要淪為「北京湖」。2013 年 7 月贏得參議院大選後，安倍更致力推動「俯瞰地球儀外交」，《朝日新聞》則稱其為「甜甜圈外交」，³⁹意指他刻意漏掉中國和韓國，甚至奉行「包圍中國的外交路線」。例如 2013 版《東亞戰略概觀》報告便指出，日本應該特別關注中國的舉動（尤其綜合國力及軍力增強以潛藏之不測事態，同年版《外交青書》也提及 2012 年 9 月日本將釣魚台收歸國有之後，中國對日本「領土、領海和領空的威脅」。⁴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替 2015 年後美日同盟合作升級提供了正當性背景，⁴¹並讓日本在美國全球防衛布局中扮演愈發積極的角色，非但安倍自 2014 年 AEPC 峰會起便試圖改善對中關係，自 2016 年以來，中日雙方亦似乎都希望突破陷入低潮的雙邊互動，例如安倍便傾向藉由某種程度的「破冰」為陷入困境的「安倍經濟學」注入活水，2016 年 9 月對國會施政演講所稱「將從大局觀點出發改善（日中）關係」便是一例，但迄今實質進展有限。

儘管安倍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成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位最久的首相，不僅自 2012 年以來力推的「安倍經濟學」陷入僵局，所謂「戰後外交總清算」目標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問題與簽署《和平條約》努力依舊原地踏步，面對北韓金正恩在 2018-19

³⁸ 何思慎，〈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27-28。

³⁹ Tung-Chieh Tsai, "Abe's New Foreign Strategy and Its Challenges," *Prospect Journal*, No. 11, 2014, pp. 99-126.

⁴⁰ 〈日本外交藍皮書指中國動向威脅日本領土〉，《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

⁴¹ 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日本研究》，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94；林柏州，〈美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與其影響〉，《戰略與評估》，第 6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5-17。

年推動的「峰會笑臉外交」，日本成為六方會談架構中被「獨漏」的一方，2019年7月與韓國爆發的貿易戰一度波及《情報交換協定》存續，同年8月中日相隔7年重啟戰略對話與12月於成都召開的中日韓高峰會，雖然有助緩和情勢，2020年初陡然爆發的COVID-19疫情在切斷各國聯繫與既定規劃（例如原規劃習近平於上半年訪日）之餘，中國推動《港區國安法》與美中對抗明顯激化外溢之發展，也讓日本陷入政策兩難。⁴²在內外交迫窘境下，安倍於2020年8月以健康理由辭職，隨即由長期擔任其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獲選自民黨總裁並繼任首相；一般認為，菅義偉過去以輔助性官僚身分為主且較無外交事務經驗，短期內或以追隨安倍路線為主，但亦由此留下某些懸念。

伍、威脅平衡下的日本同盟戰略前景

一、對美國扈從之同盟政策基調

根據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觀點，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行為者因感知安全威脅，因而傾向在扈從（bandwagoning）與制衡（balancing）之間選擇其同盟戰略；據此，無論從綜合實力（中國經濟崛起）、地緣鄰接性（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進攻實力（中國軍事現代化與近期習近平推動新一波軍改）、侵略意圖（中國自2012年以來愈發積極「走出去」並穿越島鏈）來看，儘管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單一超強的現實，從權力平衡邏輯可能引發反同盟之政策制衡，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當前國際秩序面臨之新挑戰，它也是日本戰略考量中必須應對的主要思考核心。在 Walt 的理論模型中，越強大的國家行為者越可能採取抗衡策略以對抗威脅，但國家行為者若實力不足，則可能選擇扈從選項，加入某個陣營以制衡其威脅來源，至於結盟與否的意識型態因素將隨威脅程度增加而下降。目前看來，相較美國自2012年推出「再平衡」（re-balancing）以對抗中國，同年正式加入 TPP 談判並於2015年接受新防衛指針的日本，一方面藉由前述官方報告確認了中國作為威脅來源，在做法上則無異選擇了「透過扈從進行制衡」路線，至於2013年以來連續8年增長的防衛費用，亦顯示日本之自我安全認知與逐步加強軍事能力的想法。

⁴² 〈日本對中國外交的兩難：政治壓力和經濟引力〉，《BBC 中文網》，2020年6月9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82948>。

進一步來說，中國威脅並非全然主觀認知下的結果；根據防衛省統計，2018 年度日本針對中方軍機緊急升空次數為 638 次，2019 年度更達 675 次，甚至截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中國海警船已連續百日在釣島周邊海域執行任務，創下 2012 年 9 月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最長紀錄，⁴³ 在迫使日本修改自衛隊緊急升空標準之餘，繼前述 2020 年 7 月與美、澳在南海聯合軍演後，不僅美國隨即宣布將以 230 億美元出售 105 架 F-35 隱形戰機給日本，創下史上第二高軍售紀錄並使後者擁有美國之外最大規模同型機隊，日本也公開邀請英國參與明年的美日演習，並表態將加入「五眼聯盟」(Five Eyes) 情報合作體系，⁴⁴ 直接反映其「中國威脅」之戰略感知，⁴⁵ 至於 2019 年美日「2 + 2」磋商宣示將共同關切太空、網絡和電磁波譜等領域技術進步之挑戰，亦暗示雙方合作或將由傳統安全擴及部分新興非傳統領域，儘管雙方（如同美韓）依舊存在防衛費用分攤挑戰，短期內確實顯現強化正面戰略互動之跡象。

二、日本同盟戰略之可能演進

源自冷戰遺產的美日同盟，自新世紀以來雖浮現某種從「紙上同盟」朝「行動同盟」邁進之跡象，⁴⁶ 不能否認，在「美主日從」的結構特徵與行動現實的暗示下，倘使日本不過是美國的「侍從國」(client state)，⁴⁷ 在缺乏完全政策自主性的前提下，能否落實 Walt 基於理性選擇之假設，顯然不無疑問；例如孫崎享針對二次戰後日本

⁴³ 〈尖閣諸島沖合 中国海警局の船が 100 日連続航行 最長に〉，《NHK》，2020 年 7 月 22 日，<https://vietnam.vnanet.vn/japanese/%E6%97%A5%E6%9C%AC%E3%81%AE%E5%B0%96%E9%96%A3%E8%AB%B8%E5%B3%B6%E6%B2%96%E5%90%88-%E4%B8%AD%E5%9B%BD%E6%B5%B7%E8%AD%A6%E5%B1%80%E3%81%AE%E8%88%B9%E3%81%8B%E3%82%99100%E6%97%A5%E9%80%A3%E7%B6%9A%E8%88%AA%E8%A1%8C-%E6%9C%80%E9%95%B7%E3%81%AB/452170.html>。

⁴⁴ 〈強まる日本のファイブアイズ参加論 情報保護が壁〉，《産経新聞》，2020 年 8 月 4 日，<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200804/2008040047-n1.html>。

⁴⁵ Wajaha Khan and Masaya Kato, "China's rise forges new bond between Japan and Five Eyes," *Nikkei Asia Review*, August 7, 2020,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China-s-rise-forges-new-bond-between-Japan-and-Five-Eyes>.

⁴⁶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62-174。

⁴⁷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Verso, 2007).

外交決策界「隨美派」與「自主派」鬥爭之討論，⁴⁸ 同樣指出美國對於日本決策過程之關鍵影響力，以及東京在美日雙邊互動中長期扮演之相對弱勢角色。

儘管如此，無論是「自主派」短暫但間或取得執政機會，抑或自 1990 年代以來日本菁英推動「普通國家化」之共識，在維繫了日本一定程度自主戰略思考空間之餘，隨著國際情勢與結構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與 2018 年美中爆發貿易戰之衝擊下，不斷出現結構轉型與權力轉移暗示，加上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自 2017 年上任後一連串「退出主義」動作帶來的疑慮，雖然因為美國提供之國家安全承諾（同時基於某種政策思考慣性），乃中國現階段在經濟利益之外無法給予的替代物，致使日本在安全威脅疑慮下選擇持續扞從美國來抗衡北京，事實證明，包括日本在「尼克森震撼」下決定於 1972 年逕行與中國建交、1990 年代初期美日「同盟漂流」危機、⁴⁹2006-10 年從自民黨到民主黨接連推動對中「破冰」，乃至在 2019 年 4 月第五次外長級經濟高層對話後，中日宣稱雙方關係「重回正軌」之發展趨勢，⁵⁰ 在在證明，非但美國也時常被日本視為「威脅」潛在來源（主要指外交而非安全，例如 Nixon 時期的「越頂外交」或 Reagan 時期的匯率政策，至於 Trump 的非傳統性亦不啻是潛在威脅），特別是 2018 年中日兩國總理實現年內互訪（5 月李克強訪日與 10 月安倍訪華），在雙邊關係史上已然非常少見，接下來包括 2019 年 6 月參加大阪 G-20 峰會的習近平與 10 月訪日並會見安倍的王岐山，北京政壇「三巨頭」在 1 年半之內接連到訪日本，亦不啻透露某種新訊息，從某種角度來說，若非 2020 年突發全球疫情衝擊，美中日三邊互動發展態勢或未可知。

可以這麼說，即便日本未來仍將繼續維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短期內也看不到轉向與中國結盟之可能性，隨著全球結構持續變遷與其安全自主思考空間之提升，日本勢將更多地反思「威脅」之內涵並檢視各種政策調適選項；如同後冷戰時期以來美日同盟之實際發展一

⁴⁸ 參見：孫崎享，《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 年）。

⁴⁹ 參見：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

⁵⁰ 〈王毅：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中時新聞網》，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15002609-260408?chdtv>；〈中國日本「重回正軌」摒棄前嫌的現實考量〉，《BBC 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573228>。

般，其下一步仍將持續受到國家利益與區域結構變動所牽引，至於日本是否更多地向「等距避險」方向挪移，或許是可加以觀察的焦點之一。

陸、結語

現實主義論者針對國際關係發展之描述，主要仍著眼於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者追求生存之理性選擇。值得注意，正因權力分配並非一成不變，於是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研究乃應運而生，加上結構環境亦有影響強弱之別，於是有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相繼出現提供不同詮釋，至於考量到傳統權力平衡概念缺乏操作指引，無論威脅平衡或利益平衡，顯然都試圖進一步理解國家選擇同盟的動機起點。進一步來說，國家既須根據環境變遷帶來的新內涵去調整自身「求生存」政策設想，基於多數行為者均屬中小型國家（相對弱勢）的權力分配現狀（即便日本並非真屬弱勢，但憲政環境與美日互動結構仍對其產生重大關鍵制約），本文也選擇了威脅平衡作為理解其同盟戰略抉擇的思核心。

根據 Walt 的詮釋，國家行為者對「威脅」的認知包括客觀（綜合實力、地緣鄰接性、進攻實力）與主觀（侵略意圖）兩部分，特別是對意圖之感知乃是它在選擇並調整戰略時的關鍵所在。就日本而言，儘管對中國之客觀威脅能力存有不同認知（因此有時傾向認為挑戰與機會並存），至少在主觀認定其潛在意圖方面，近 10 年來各種官方報告確實持續鎖定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包含中國軍隊快速現代化、近 30 年來國防預算增長超過 40 倍、成立航母艦隊，以及解放軍機艦於日本周遭海空域日益頻繁活動的跡證等，相較冷戰時期被動受到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牽引，這些都促使日本在後冷戰時期與尤其新世紀以來，更多地從「威脅平衡」視角進行自主思索，一方面描繪中國對於「現況」的挑戰，同時根據長期政策慣性與意識形態趨近性，選擇以強化對美國聯繫作為主要戰略回應，加上後者自 2009 年以來持續聚焦亞太（印太）區域發展，從而使一度「漂流」的美日同盟出現強化與升級的趨勢，尤其 2015 年的新防衛指針更暗示雙方或朝「對等夥伴」關係發展。

當然，由於「威脅」認知本來便存在主觀調整空間，這一部分解釋了日本自 2014 年 APEC 峰會以來持續摸索改善對中關係之道的背景，特別在安倍於 2020 年 8 月突然卸任加上 2021 年國會改選將屆，

無論外部環境挑戰（後疫情時期與美國政黨輪替）或其國內政局之可能變化，都將影響其「威脅」與「安全」之認知，並讓下一階段日本對美國同盟戰略發展存在變數，對此，確實值得我們加以追蹤觀察。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譯，《日本走向何方》，（北京：中信出版，2009年）。

李興等，《亞歐中心地帶：俄美歐博弈與中國戰略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3年）。

孫崎享，《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Al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Brzezinski, Zbigniew,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Economy, Elizabeth,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

Goldstein, Joshu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9).

Lobell, Steven E.,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cCormack, Gavan,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Verso, 2007).

Morgenthau, Hans J., revised by Kenneth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2005).

Ray, James L., *Global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Scheuerman, William E., *Hans Morgenthau: Re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9).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二、專書論文

王緝思，〈中美關係：尋求穩定的新框架〉，收於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公司，2006年），頁313。

蔡東杰，〈安倍新政權時期：外交戰略轉型〉，收於李世暉等著，《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6年），頁93-104。

Green, Michael J., "Balance of Power," in Steven K. Vogel, ed., *U.S.-Japan Rel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 9-34.

Papadakis, Maria and Harvey Starr,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Small S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409-422.

Wohlforth, William,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Michael Brown et al.,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 273-308.

三、學術性期刊論文

古詩涵，〈新安保法制之戰略意涵與影響〉，《國會季刊》，第46卷第2期，2018年6月，頁84-106。

何思慎，〈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3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49。

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日本研究》，第1期，2012年1月，頁93-98。

林柏州，〈美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與其影響〉，《戰略與評估》，第6卷第3期，2015年9月，頁1-26。

金熙德，〈戰略創新乎，戰略貧困乎：評《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日本學刊》，第1期，2003年1月，頁48-60。

趙葆珉，〈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2年3月，頁101-109。

Banlaoi, Rommel C.,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p. 98-107.

Goh, Evely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809-832.

Herz, John,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4, 2003, pp. 411-416.

Mastanduno, Michael,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88.

Schweller, Randal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Schweller, Randall, "Unanswered Threa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

201.

Taliaferro, Jeffery W.,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31-132.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Tsai, Tung-Chieh, "Abe's New Foreign Strategy and Its Challenges," *Prospect Journal*, No. 11, 2014, pp. 99-126.

四、官方文件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8," 2018,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8/DOJ2018_Full_1130.pdf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19," 2019,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19/pdf/DOJ2019_Full.pdf

Th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20," 2020,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2," 2012,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f/2012/east-asian_e2012_07.pdf

五、網際網路資料

〈中國日本「重回正軌」摒棄前嫌的現實考量〉，《BBC 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573228>。

〈日本外交藍皮書指中國動向威脅日本領土〉，《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7_japan_china_policy.shtml。

〈日本防衛省東亞戰略概觀，指中國在西太平洋擴軍〉，《中央通訊社》，2020 年 4 月 1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100399.aspx>。

- 〈日本對中國外交的兩難：政治壓力和經濟引力〉，《BBC 中文網》，2020 年 6 月 9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82948>。
- 〈王毅：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中時新聞網》，2019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415002609-260408?chdtv>。
- 〈安倍展開日本戰後外交總清算〉，《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1 月 13 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2991-2018-11-13-05-00-40.html>。
- 〈解禁集體自衛，日承認專守防衛概念轉變〉，《中央通訊社》，2015 年 6 月 1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010439-1.aspx>。
- 北岡伸一，〈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走進日本》，2014 年 4 月 22 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 “China’s rapi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s in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hearing befor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 April 16 2013, Serial No. 113-22, <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3hhrg80462/pdf/CHRG-113hhrg80462.pdf>
- Allison, Graham,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 Frost, Ellen L.,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trategic Forum*, No. 231, April 2008, <https://www.files.ethz.ch/isn/55111/SF231.pdf>.
- Khan, Wajaha and Masaya Kato, “China’s rise forges new bond between Japan and Five Eyes,” *Nikkei Asia Review*, August 7, 2020,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China-s-rise-forges-new-bond-between-Japan-and-Five-Eyes>.

Swaine, Michael D.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 201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3/02/creating-unstable-asia-u.s.-free-and-open-indo-pacific-strategy-pub-75720>.

〈尖閣諸島沖合 中国海警局の船が 100 日連続航行 最長に〉，
《NHK》，2020 年 7 月 22 日，<https://vietnam.vnnet.vn/japanese/%E6%97%A5%E6%9C%AC%E3%81%AE%E5%B0%96%E9%96%A3%E8%AB%B8%E5%B3%B6%E6%B2%96%E5%90%88-%E4%B8%AD%E5%9B%BD%E6%B5%B7%E8%AD%A6%E5%B1%80%E3%81%AE%E8%88%B9%E3%81%8B%E3%82%99100%E6%97%A5%E9%80%A3%E7%B6%9A%E8%88%AA%E8%A1%8C-%E6%9C%80%E9%95%B7%E3%81%AB/452170.html>。

〈強まる日本のファイブアイズ参加論 情報保護が壁〉，《産
経新聞》，2020 年 8 月 4 日，<https://www.sankei.com/politics/news/200804/pln2008040047-n1.htm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Sharp Power

Shiau-Shyang Liou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mixed security threat. With regar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ans, it is a new typ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but with regards to the object it intends to affect, the security threat of China's sharp power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Furthermore, in the broadest sense,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soft power, with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As for whether or not China's sharp power represents a paradigm shift, further observation of its subsequent influence is still required.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rap effects defin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sharp power. China's ambition for hegemony is stronger than Russia's, so to a certain extent, so-called sharp power can be said to be tailored for the rise of China. In practice, China has wielded its sharp power to avoid the traps of empire, but this has not achieved its desired effect. On the contrary, China has entered a negative feedback loop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sharp power.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sharp power is tantamount to throwing down the gauntlet to China, but democratic values are not a priority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of affair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Sharp Power." Thus, China's sharp power is tied to the survival of democratic values, but a policy of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will not be easy to re-implement.

Keywords: Sharp power, great power politics, trap effects, containment

中國銳實力的安全意涵

劉蕭翔

助理研究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

摘 要

中國銳實力是一種混合型態的安全威脅。依其手段特徵，其乃新型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但依其所欲影響對象，中國銳實力的安全威脅又與傳統安全無異。再者，最廣義而言，中國銳實力可謂帶有硬實力的壓迫特性，卻以軟實力手段包裝的一種軟實力。至於中國銳實力是否造成典範轉移，尚需視其後續效應。

大國政治與陷阱效應為中國銳實力的驅動力。由於中國爭霸的野心更甚於俄羅斯，故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的銳實力實為中國崛起而量身打造。在實踐上，中國運用銳實力以避開大國興衰陷阱，卻未獲得其所欲的效果，中國反倒陷入惡性循環而更依賴銳實力。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出銳實力之舉形同向中國挑戰，但民主價值並非川普最重視者，而且國際情勢並不利於「反中國銳實力聯盟」的形成。因此，中國銳實力雖涉及民主價值的存亡，卻仍不易再引發意識形態的「圍堵」。

關鍵詞：銳實力、大國政治、陷阱效應、圍堵

I. Introduction

Since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harp power at the end of 2017,¹ discussions about sharp power have become a popular trend. Democracies are concerned over the impact of sharp power and how to respond, and autocracies accused of wielding sharp power to infiltrate others have rebutted all accusations. China especially believes that such accusatio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accept the rise of China. It has in turn made counter-accusations that similar actions taken by democracies are framed as benign soft power, whereas Chinese soft power is framed as malicious sharp power.

There a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scussions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however, discussions of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ver the essence, dynamic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sharp power are still relatively lack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academically discuss the above topics in succession.

A. Essence

(A) A Mixed Security Threat

The stat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he subject of security and the referent object of research. War and the threat of force have always been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security. However, traditional security is concerned with a dimension that is too narrow and easily generates bias. For example, direct violence dominated the discipline and even became synonymous with security studies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it is just a subfield of security studies - Strategic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there was some reflection on how to define and achieve security. As the referent objects of research and the means of achieving security chang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by the academia.²

¹ See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pp. 8-25.

² Alan Collins, "What is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

Barry Buzan believes that the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have generall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What is the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 (2) Are security issues internally driven or externally driven? (3) Should the scope of security issues be extended beyond military security? (4) W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should be adopted for security studies? (5) What kind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should be chosen as the basis for security studies?³ After thorough examination, we find that the fundamental basi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the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 and “the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First, the referent object determines the dynamics of security issu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 considered an external threat to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ferent object at that time was undoubtedly the state, and its essence was holistic and externally drive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threat of the Soviet Union no longer existed. Although the structuralists still regard external threats as research objects, increased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human security,” and its essence has been more atomized and internally driven. Second, the scope of security issues depends on the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During the Cold War, due to the focus on military capabilities, “national security” was synonymous with military security in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time, the sources of security threats were naturally war and the use of force, which were the domain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y contrast, when threats originated from other fields, the scope of security issues correspondingly expanded beyond traditional security, relating instead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nall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re covered in the choice of research theory. For example,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ased on realism consider the threat to survival commonplace.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under anarchy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and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state. However,

ty Studie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 Ole Wæver and Barry Buzan, “After the Return to The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93-410.

³ Barry Buzan,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orl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o. 1, 2010, pp. 119-122. (in Chinese)

schools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elieve that such a predicament can be altered, as people cannot fight endlessly for survival. In other words, the referent object is still the crux when def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between realism and other school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 and the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are the core issues of security studies, with other related topics being derived from them. The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 is concerned with “whose security,” and relates to the dynamics of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choice of theoretical basis. The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relates to the scope of security issues.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is relatively narrow and belongs to the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on the contrary, other subjects belong to the dimension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se two core indicators, we can clarify the essence of China's sharp power.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wo scholars 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provided the definition for sharp power. They believe that autocracies, such as China and Russia,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openness of the democracies to export their influence after the Cold War. Moscow only intends to make democracy appear relatively less attractive, as Russia enjoys better optics by comparison as long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West looks bad. On the contrary, China is more aggressive, aiming to expand its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o suppress criticism abroad. Although China and Russia employ different methods, they all stem from the ideology that state power overrides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y are fundamentally in opposition to freedom of speech, open debat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democratic populations receive manipulated information, autocracies need to infiltrate the political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target country. Such a coercive technique can be called sharp power. Sharp power enables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cut into the core of the target country's society, incite and escalate tensions within, and even compel others to censor themselves. The influence projected by sharp power is

undoubtedly malicious and aggressive.⁴

Sharp power as proposed by Walker and Ludwig is seemingly a phenomenon wherein autocracies exert inappropriate means to export their political values to the target country, thereby diverting attention and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However, as far as the “security referent object” is conc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Walker and Ludwig, the purpose of China's sharp power is to expand its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so its real target is still the state. In other words, the object that China's sharp power intends to affect i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For example, China infiltrated Australian domestic politics, using agents to influence Australian authorities into respecting Chinese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⁵

In terms of the “source of security threats,” sharp power wielded by autocracies is not only diverse in means but also quite threatening in the target country. Many of China's means of sharp power are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such as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 Confucius Institute, economic cooperation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overseas support groups –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and academic collaboration with Western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⁶

⁴ Walker and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8-25.

⁵ Huang Xiang-mo,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businessman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CPPRC), has donated more than 2.6 million Australian dollars to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National Party since 2012. In 2014, Australian former Labor Party Senator Sam Dastyari received A\$40,000 from Huang to pay legal fees. In June 2016, Dastyari violated the Labor Party's position and told the media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China's own business, and Australia should maintain neutrality and respect China's claim.

⁶ For example,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 Confucius Institutes overseas since 2004, but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highly controversial due to its opaque operations. In 2014,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function as an ar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re allowed to ignore academic freedom. Hungary has benefited from China's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has repeatedly opposed the EU's criticism of China's human rights issues. This is because Hungary is not only a “17+1” member, but also the first EU country to

These means of reshaping foreign views on China and securing Chinese politico-economic interests do not use traditional military forces, so they still belong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owever, their dynamics are still holistic and externally driven, and they ultimate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target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⁷

Obviously,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China's sharp power is to secur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s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to infiltrat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the target country and reshape the views of outsiders on China otherwise. Thus,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mixed security threat. With regar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ans,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new typ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but with regards to the object it intends to affect, the security threat of China's sharp power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B) Paradigm Shift?

Walker and Ludwig further explore sharp power on the basis of Joseph Nye's definition of soft power. They point out that a country's hard power is based on its ability to coerce, through means such as military or economic might; on the contrary, soft power is based on the

sign the memorandum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have also become a new lev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Chi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have mobilized and sponsored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atriotic operations through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established new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ICAS) in Washington, and the Fudan-UC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China even actively collaborates with universities and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EIP). The purpose behind it is to compete for discourse power. As China's influence increases, foreign research is inevitably affected and they cannot but avoid crossing China's red line.

⁷ In its first issue in 1976,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ted that energy supp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od and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seem to be less important, should still be included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his is because these factor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ation state syste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its member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use, threat, and control of force. See "Forwa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1, Summer 1976, p. 2.

positive attraction of a country's culture, political ideas, policies, and active independent civil society. However, some techniques employed by autocracies to exert influence, while not "hard" in the openly coercive sense, are not truly "soft," either. After the Cold War, democracies viewed influence from autocracies through the familiar lens of soft power, and were thus infiltrated by autocracies via asymmetric openness.⁸

According to Walker and Ludwig, soft power is attractive while hard power is coercive, but the means of autocracies are neither hard nor soft. Instead, the means are sharp, and will "pierce" the political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democracies, and so should be accordingly labeled as sharp power. As such, sharp power has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but it is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Walker and Ludwig clearly allege that Nye's concept of soft power is outdated and unsuited for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resulting in democracies being deceived and therefore unable to uncover the true intentions of autocracies in time.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as proposed by Nye in 1990 is undoubtedly a paradigm.⁹ Nye's insights into power are also constantly reinterpreted and referenced, such as through the synthesis of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to form effective strategies – smart power is such an example. In response to Walker and Ludwig's appeal to reflect on soft power, Nye wrote two articles to clarify the relevant misconception. Nye addressed a belief that sof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through attraction and persuasion rather than the hard power of coercion and transaction, and that the term is sometimes used to describe any exercise of power that does not involve the use of force; such a belief is a mistake, and most have misunderstood soft power.¹⁰

⁸ Walker and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9, 13.

⁹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Autumn 1990, pp. 153-171.

¹⁰ Joseph Nye, "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4,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soft-and-sharp-power-by-joseph-s--nye-2018-01>.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Nye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Sometimes, it is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hard power from soft power, to say noth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and sharp power. Thus, Nye cited many examples to supplement his explanation. Nye believes that sharp power, the deceptive use of information for hostile purposes, is a type of hard power. Information warfare, for example, is a kind of hard power. It manipulates information intangibly, but intangibility is not a feature of soft power. Verbal threats, for example, are both intangible and coercive. Therefore, the crux is whether power is coercive or not.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sharp power from soft power, because all forms of persuasion involve choices about how to frame information. Only when that framing slides into deception, which limits the subject's voluntary ability to choose, does it cross the line into coercion. Truthfulness and openness are the dividing lines between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in public diplomacy. When China's Xinhua News Agency broadcasts openly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the exertion of soft power. It should still be accepted even if the message is unwelcome. When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overtly backs radio st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crosses the line into sharp power, which should be exposed. Chinese economic aid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y be benign and attractive, but not if the terms become untenable, such as with the Hambantota Port project in Sri Lanka.¹¹

However, Nye's explanation was made in hindsight. As he said, when communication becomes deceptive and restricts the subject's voluntary ability to choose, soft power will cross a line and become coercive sharp power. Nevertheless, it is not easy to identify the deception, and when the truth is later revealed, it is often too late. Nye claims that official public diplomacy is merely propaganda and cannot produce soft power, but public diplomacy that emphasizes soft power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ce won

concept of soft power has been misused. It can be seen that similar situations are quite common. See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Y: Public Affairs, 2011), p. 81.

¹¹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4,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Nye, "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

the favor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was beneficial to China's soft power, but the African public's resentment against China is intensifying. This is because Chinese development in Africa has not only yielded no benefits to local populations, but has also generated many negative effects.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are criticized for violating local mining laws in Ghana, and are also criticized in Zambia for ignoring local immigration laws. Furthermore, China's mining of uranium has not alleviated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Namibia, to say nothing of multiple scandals, including tax evasion, money laundering, and poaching. Therefore, the African public is worried that they will become part of China's sphere of influence or colony. However, China still intends to divert outside attention and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to silence critic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debt trap. It is here that China's coercive intentions hidden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revealed. Thu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undoubtedly a tool of sharp power. Moreover,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sharp power is state behavior not accepted by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ractices.

It is not entirely correct to say that sharp power is a kind of hard power which has a hostile purpose and deliberately deceives others. Sharp power has the sam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as hard power, but sharp power has the unique trait of infiltration. By contrast, hard power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pressing others without deception or infiltration. The aforemention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ing packaged itself in soft power, can infiltrate other countries due to its economic advantages, but this was revealed as sharp power after its deceptive and coercive intentions were uncovered. These qualities of infiltration and coercio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harp power. I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shown the coercive intentions of hard power from the start,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romote its initiative around the world. In any case, we can at least confirm truthfulness, openness, and coercion as the dividing lines between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nd infiltration 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sharp power and hard power. Moreover,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to say that sharp power is a kind of soft power rather than a kind of hard power.

In fact, Nye already pointed out in 2011 that soft power is only a descriptive concept rather than a normative one. Like any form of power, it can be wielded for benign or malicious purposes. Thus, soft power shares no contradiction with Realism, but it is not a form of idealism or liberalism, either. It is just a form of power and a way to achieve desired outcomes.¹² According to Nye's clarification, soft power does not carry value judgment, and is simply a tool that depends on how it is used. In proposing such a new concept such as sharp power, the intentions of Walker and Ludwig are obvious: they hope to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wherein autocracies export their values with "sharp" means, and the value judgment herein is very strong. However, such a description is still not outside the scope of Nye's previous definition, and with its malicious characteristic, sharp power actually remains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soft power.

Sharp power may seem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dichotomy between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but it sometimes shares only a fine line with soft power. For example, China's sharp power has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but is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Once it crosses the dividing lines of truthfulness, openness, and coercion, China's sharp power will remove its soft power camouflage and reveal the hard power of its true coercive intentions. As for whether China's sharp power causes a paradigm shift or not, further observation of its subsequent influence is needed. If it becomes a recognized standard for defining how autocracies export its ideological influence hereafter, has a similar status to soft power, or arouses a sense of crisis within democracies that aligns them collectively against China, then China's sharp power may cause a paradigm shift. But until then, we can only say that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kind of soft power with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¹²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p. 81-82.

II. Dynamics

A. Great Power Politics

Great power politics have been the main driv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t not only brings up security issues but also directs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dominated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eve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bipolar to “uni-multipolar,” the importance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remains undiminished. It even reflect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le great powers compete for the power to direct discourse.¹³

China has risen due to the success of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Russia has also risen again on the back of its energy exports. With the rise of their national power, China and Russia have further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and remain subject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eve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report,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oints out that China and Russia have actively reshaped their image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local media and academia in Argentina, Peru, Poland, and Slovakia. However, China and Russia did not w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se countries with soft power. Instead, they attempt to “conquer” the minds of local policy makers and the public by manipulating and distorting information, thus eliminating local criticism of autocracies.¹⁴

¹³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the world from a unipolar perspective, but other great powers act on multipolar logic.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itself as the creator of the global order and is therefore concern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causality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it faces. In contrast, Europe insists on a wider concept of security, such as w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count as a security issue and how to conceptualize security. See Wæver and Buzan, “After the Return to The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curity Studies,” pp. 402-403.

¹⁴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are China's most powerful tools in Latin America, and such an engagement reaches and influences almost anyone deemed influential in local societies: from journalists, scholars, diplomats, and students to entrepreneurs, politicians, and future leaders in all fields. When Xi Jinping addressed the Peruvian Congress in 2016, he even declared that China would expand the number of training opportunities of various kinds to 10,000 Latin Americans in the coming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efines the influence that China and Russia has wielded toward democracies as sharp power. However, in the eyes of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ay be more threatening than Russia, as Beijing has a far stronger tendency to export its political values compared to Moscow, as is its intention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may only intend to diminish the attractiveness of Western democracy, but China intends to expand its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Moreover, in contrast to Russia's weak economy and limited capabilities, China has not only risen but continues to grow.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form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 Mike Pompeo, also believes that America's greatest long-term security challenge is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 not Russia.¹⁵ In other words, China's future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state of affairs may be far greater than Russia's.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 held a hearing, "The Long Arm of China: Ex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December 13, 2017. Co-Chairman Senator Marco Rubio believed that there has already been much discussion of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American elections, but Chinese efforts to influence America's public policy and basic freedoms are far greater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This is an all-out effort to not simply promote China in a better light but to target America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¹⁶ Thus,

three years. Furthermore, China even shapes public perceptions favoring China in media, academia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China-CELAC Forum. Although Poland has always suspected anything from Russia, Russia's penetration of anti-American, anti-EU, and anti-Ukraine narratives; and the promotion of a brand of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values as an antidote to the "decadence"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make Russian propaganda effective in Poland. This is because these themes align well with the ideology of the present PiS government. See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27-28, 117.

¹⁵ Bill Gertz, "CIA Gives More Power to Spies to Bolster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Washington Free Beacon*, July 26, 2017, <https://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cia-gives-power-spies-bolster-intelligence-operations/amp/>.

¹⁶ Josh Rogin,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are causing alarm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the true intention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is to use these examples to draw global concern toward the threat of China's sharp power, as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is a serious victim.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we can say that sharp power is tailored for the rise of China.

However, why does China wield sharp power?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it?

B. Trap Effects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a fact. Aside from economic concerns, Robert Kaplan believes that China also poses an ideological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its unique authoritarian system, China provides dependable development assurances for its people and even its neighbor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at least somewhat attractive to the West. However, China's economic achievements have rendered it too arrogant, and it has overused its own strength. For example, China has excessively promoted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its economic growth rate over the next decade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support it. As a result, China has drawn close to the traps of empire.¹⁷

Kaplan brings up the exam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illustrate China's excessive expansion, which is both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in nature. This is becaus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oes not solely promote the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as its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approach with its emphasis on soft power is also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its "Five-Pronged Approach."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refers to the bridging of cultur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mportance of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becomes more evident when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causes controversy, but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chinas-foreign-influencers-are-causing-alarm-in-washington/2017/12/10/98227264-dc58-11e7-b859-fb0995360725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3d2025f73ac1.

¹⁷ Robert D. Kaplan, "The Trap of Empire and Authoritarian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5,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trap-empire-authoritarianism-24761>.

itself is the weakest lin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it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beautific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image, and does not actually resolve its controversies,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 tool to cover for and push China's sharp power.¹⁸ Hence, as mentioned earlier, soft power is only a tool, and when it crosses the red line, it becomes sharp power, possessing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but packaged within soft power.

How does a great power avoid decline? Numerous scholars have identified traps that a great power should avoid. With regards to China, Yaqing Qin,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lieves that China should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ye proposes the "Kindleberger trap"; Yeh-chung Lu, Vice-President of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poses the "James Dean trap." These traps constitut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sharp power to a certain extent. Moreover, understanding these traps will help in better managing China's sharp power.

(A) James Dean Trap

Drawing upon American actor James Dean's portrayal of a teenager lacking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in the film *Rebel Without a Cause* as an example, Yeh-chung Lu believes that China should avoid the "James Dean trap." This is because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re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character in this film, in that it believes no one knows China nor wants to know China. Furthermore, China harbors negative and skeptical attitudes toward the West or its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due to its historical leg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mutual trust among countries is very important,

¹⁸ Nian Peng, th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China's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in Southeast Asia. Most official activities are only one-way communication and not deep enough, and there are not enough Chinese enterprises capable of responding, not to mention their negligence or deliberate inaction. Nian Peng, "How c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hieve its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August 31, 2019, <http://www.nanhai.org.cn/info-detail/26/8287.html>. (in Chinese)

and the first step in building mutual trust is to not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 each other's actions.¹⁹

In other words, a risen China is eager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 countries, and hopes to attain the power to direct discourse and a status that befits a great pow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China intends to silence negative opinions from abroad, going as far as to impose its own will and values on others. Negative opinions of China is tantamount to a denial of China, and once China attains the power to direct discourse, it can manipulate and achieve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²⁰ However, it is not easy for China to win the trust of most democratic countries as a communist authoritarian state, to say nothing of its attempts at attracting democratic countries with its authoritarian system. Moreover, China believes that it is wielding soft power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but Western democracies believe that these means are inappropriate and regard them as sharp power. We can thus say that the “James Dean trap” prompts China to wield its self-perceived soft power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but Western society regards it as the export of ideological sharp power due to China's totalitarian regime.

¹⁹ Li Ya, “Scholars Analyze US-China Relations. It is Facing Four Traps,” *Voice of America*, July 26, 2018,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relations-and-traps-20180726/4500759.html>. (in Chinese)

²⁰ For exampl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considered propaganda tools, and their activities even prohibit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iananmen, Xinjiang, and Taiwan. Matt Schrader, an analyst at the German Marshall Foundation, considers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be an autocratic party platform that is hostile to liberal ideas and spreads state-approved narratives. In its 2019 report on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censors certain topics and perspectives in course materials on political grounds and uses hiring practices that take political loyalty into consideration. Pratik Jakhar,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growth of China's controversial cultural branch,” *BBC*, September 7,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9511231>. Furthermore, in 2018-2019, the Hanban subsidized Renuka Mahadeva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lso sponsored the university's launch of formal courses on “Understanding China,” with its contents obviously defending China's official policies. It appears that China intends to use academic freedom to cover its sharp power and train its agents in the Australian academia to defend China's official policies and image and erase criticism against China. See Shiao-shyang Liou, “Observation of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teaching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Defense Security Weekly*, No. 70, October 25, 2019, p. 14. (in Chinese)

(B) Thucydides Trap

As far as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cerned, Yaqing Qin believes that 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s still a vital challenge for China,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cydides concluded in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at an emerging country will challenge an established great power, and the great power will in turn contain the emerging country. The two sides will eventually resolve this problem through means of war. From Yaqing Qin’s viewpoi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the latter regards its global leadership as a core goal and regards the former’s rise as a challenge to U.S. lead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given up it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does not respec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domestic order. By contrast, Xi Jinping in 2014 called on both sides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idea that a powerful country can only pursue hegemony does not apply to China. Yaqing Qin even compares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ith the “New Silk Road Proj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ing that China’s initiative reflects the inclusive spirit of engaging i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making joint contributions, and sharing benefits.²¹

Yaqing Qin’s explanation is naturally a unilateral Chinese statement. He also specifically takes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 to indicate that China has no hegemonic ambitions. There is an argument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ndependent enterprise, and can operate parallel to the U.S.-le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ach leading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orders and coexisting peacefully.²² However,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still ongo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even indicat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the potential to disrupt trade worldwide,

²¹ Yaqing Qin, “Reflections on th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May 27, 2015, p. B05. (in Chinese)

²² James Kynge, “China’s Ancient Strategies Creat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7,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5975472-ea30-11e7-8713-513b1d7ca85a>.

calling it “insulting.”²³ The United States obviously believes that China has expanded its influence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extremely multifaceted global strateg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he West is concerned that its global order will be challenged by China. But seeing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hallenge to the U.S.-led world order, and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mingly unable to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ome controversial soft power projects within Chinese initiatives are identified as sharp power. For example, Richard Fontaine and Daniel Kliman believe that China exports autocracy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undermine democracy.²⁴ In the near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y soon be labeled as sharp power. The more China reshapes its overseas image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erceive it as wielding sharp power.

(C) Kindleberger trap

Distinct from the argument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void conflict, Ny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perhaps no need to worry about China falling into the “Thucydides trap,” as China cannot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hus properly manage U.S.-China relations. However, Nye believes that China may fall into the “Kindleberger trap,” hoping to remain a free-rider after its rise rather than taking on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Nye still believes

²³ “Trump rails against China during dinner with executiv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9,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58869/trump-rails-against-china-during-dinner-executives>.

²⁴ Richard Fontaine and Daniel Kliman, “On China’s New Silk Road, Democracy Pays A Toll,” *Foreign Policy*, May 1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16/on-chinas-new-silk-road-democracy-pays-a-toll/>. For example, China is exporting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authoritarian states and stabilize the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uch as in Venezuela and Zimbabwe. In August 2019, the Zimbabwean authorities used Chinese technology to block public meetings and demonstration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See Chong-sheng Zheng, “Chinese-style Surveillance Goes Out, Big Brother Watches You All Over the World (I),” *Radio Free Asia*, September 17, 2019, <https://reurl.cc/62RA6Z>. (in Chinese)

that China has the opportunity to avoid the “Kindleberger trap,” because Xi Jinping has expressed support for an ope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Hence, China does not intend to overthrow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it wants to benefit from it and increase its influence.²⁵

In a report made during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proposed a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engaging i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making joint contributions, and sharing benefits.²⁶ This concep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can be seen as Chinese global governance put into practice. In analyzing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Yaqing Qin reiterated Xi Jinping's statement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global public good provided by China, and it must meet local needs to truly be implemented. Furthermore, Yaqing Qin also pointed out that a country may be regarded as a threat by others when protecting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s current status and image are asymmetrical with its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With the power over media discourse controlled by the West, many signs will be magnified, misinterpreted, and even deliberately distorted.²⁷

Yaqing Qin has implicitly mentioned China's international predicament of not currently being trusted. Perhaps China is unwilling to fall into the “Kindleberger trap” and is willing to assum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it is still suspected of having ulterior motives. From the Chinese standpoi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meant to change China's image but also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for the world,

²⁵ Yi-jing Wu, “The Father of Soft Power Nye: I Am More Worried About the Rise of Trump than China's Rise,” *Common Wealth Magazine*, No. 361, September 12, 2017,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22>(in Chinese); Joseph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²⁶ “Xi Jinping: Decisive victor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winning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7, 2017,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in Chinese)

²⁷ Yaqing Qin,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New Era of China's Diplomacy,”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No. 3, 2018, pp. 3-4. (in Chinese)

different from the Marshall Plan in its “business is business” approach. However, som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solvent, and have needed to pledge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s or ports to China, such as Djibouti allowing for Chinese military bases to be built and Sri Lanka leasing Hambantota Port. Distrust explains why Western democracies accuse China of wielding sharp power, but China providing infrastructu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needs of host countries and saddling them with liabilities with its deceptive behavior also plays a role. This is why some claim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form of debt trap diplomacy.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has constantly manipulated information on various occasions to win the trust of others. For example, during a briefing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at “The Secon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pril 2019,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Yi Wang refuted a journalist’s suspicions with the specific figure of 126 countries and 2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urrently sig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urthermore, China has also promoted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in partner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June 2018, China convened the Belt and Road Journalists Forum, with 100 media representatives from 47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September 2019, the Belt and Road News Network (BRNN)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Its website publishes news in six languages, but its content comes from the *People’s Daily*, promoting positive content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le deliberately ignoring negative news about China.

During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September 2018, China announced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another 60 billion U.S. dollars to assist African development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thout any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t will forgive the debts of some impoverished African countries. Furthermore, China also arranged for Cyril Ramaphosa,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to refute the accusation that China is engaged in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instead emphasizing that African countries welcom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Chinese propaganda was blunted by Tanzania’s boycot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pril 2020. John Magufuli, President of Tanzania,

believes that the Bagamoyo Port project is not beneficial to Tanzania and has asked for renegotiation on the plan for years, but China is concerned over the cascading effects that the resumption of negotiations in Africa may bring, and has ignored Tanzania's request.²⁸

Thus, China's means is in line with the description provided by Walker and Ludwig. China has greatly expanded its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ests, masking its policies with the influential initiative, and suppressing criticism abroad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is the objective of Chinese sharp power: diverting attention and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²⁹ As an economic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n turns into a tool for sharp power, and China utilizes the needed economic aid to force the leaders of target countries to spread untruthful and manipulated inform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over, China also utiliz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xport its media influence to partner countries, beautifying the initiative and coordinating with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Kindleberger trap" has indirectly driven China into wielding sharp power.

III. Influence

A. The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terms of sharp power, Nye draws upon different insights from others. Nye believes that means similar to sharp power have already been used before, so sharp power is only a "new term" that describes an "old threat." After all, the manipulation of ideas, political perceptions, and electoral processes has a long history.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used the same means during the Cold War.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ly funded the Italian anti-communist party, assisting it in the 1948 electio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so secretly funded the anti-communist group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The Soviet

²⁸ Shiau-shyang Liou, "On Tanzania's Aboli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greement,"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Immediate Analysis*, No. 10, April 28, 2020, pp. 1-3. (in Chinese)

²⁹ Walker and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KGB fabricated fake news in the 1980s and claimed that the HIV virus was produced through U.S. biochemical weapons experiments.³⁰ Thus,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democracies and non-democracies have confronted each other using means similar to sharp power. However, this scenario between democracies and communist countries now feature democracies and autocracies as the new protagonists.

As Nye mentioned, soft power is only a tool and does not carry value judgment. Democracies use the term “sharp” to describe sharp power because autocracies deploy means that “sharply” pierce democratic systems, threatening their democratic val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Beijing or Moscow, the use of soft power by democracies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may be real “sharp power,” because soft power also “sharply” pierces authoritarian systems.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due in part to soft power, and China has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overcome such trials. The crux may be that autocratic political and media systems do not allow the free genera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within or without, but openness is taken for granted in democraci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can be surmised that both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re tools in essence, and the underlying crux of the matter is actually the conflict of values between democracies and autocracies.

B. “Containment” Agai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i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sharp power is to draw democratic attention to the challenge of sharp power from autocracies, especially China.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as a strong governmental slant and its task is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As its main source of funding comes from the U.S. Congress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ction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re often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official U.S. intentions. This is why China believes th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intends to engage in regime change.

³⁰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 example, the Hong Kong *Wen Wei Po* news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ecretly support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³¹ H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China's sharp power may be regarded as a counterattack by autocracies against democracies, especiall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 we respond to China's sharp power? Walker and Ludwig believe that democracie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soft power model, so they ignore sharp power, fail to reach a consensus, and cannot marshal effective responses to sharp power. What democracies can do now is to uncover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autocracies wield sharp power and reaffirm its own democratic values.³² Nye believes that openness is simultaneously a disadvantage and yet also an advantage of democracies. Maintaining a policy of openness is still the best defense, as it is the source of democracy's power of attraction and persuasion. Democracies should be cautious if they wish to imitate the same offensive behavior, as this may hurt their soft power.³³ By comparison, *The Economist's* proposal is relatively tough. It maintains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practical defenses, and assets such as counter-intelligence, law, and an independent media are the best protections against subversion. In addition to sticking to principles and not engaging in witch hunts, Western democracies should coordinate if possible, and act independently when necessary. The first step in 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 for Western democracies is to use its own values to blunt China's sharp power.³⁴ Perhaps democraci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nor conceived an appropriate defense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China's sharp power. Thus, the countermeasures we currently know of are mostly conservative. Regardless, the action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re tantamount to throwing down the gauntlet to China, but will democracies form a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Sharp Power,” or even

³¹ “Foreign Think Tanks Kicked Off behind the Scenes to Support ‘Occupation’,” *Wen Wei Po*, October 2, 2014, p. A11. (in Chinese)

³² Walker and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³³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³⁴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22, 2017, p. 9.

pursue a policy akin to “contain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once more?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old War, bu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contai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not limited to hard power confrontation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proxy wars and the arms race, but also other forms of confron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vested deeply in cultural diplomacy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ruman's “Campaign of Truth” remains an excellent example, viewing the propagation of truth as the best strategy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worldwide.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Greece, Italy, and Turkey after World War II is another example, and it later prevented communist expansion by assisting in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Marshall Plan. Owing to the app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cies quickly assembled and confronted the communist bloc. Although the current struggle between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is similar to the Cold War in how values and ideology are entwined in both, they are not entirely the same on a practical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Nye believes that Trump is abandoning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since World War II and returning the country to isolationism.³⁵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withdrawn from several treaties and institutions after Trump assumed the presidency, he has actually involved himself in world affairs selectively rather than being truly isolated. Trump has not only launched trade wars with several countries but also resum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 He is also the only U.S. President who has met with the North Korean head of state. Rather than suggest that the U.S. is returning to a policy of isolationism, it is perhaps better to suggest that the country is awkwardly “isolated.” Such an awkward “isolation” is naturally based on Trump's personal standards. Although Trump's behavior is unpredictable,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contexts to follow.

“America First” is undoubtedly Trump's primary principle, and he

³⁵ Jing-ling Jiang, “Nye, the Father of Soft Power, Analyzes the Smart Power of the U.S. and China,” *China Times*, November 6, 2017, p. A9. (in Chinese)

aims to make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again economically, but it has also put the United States at odds with its traditional allies, as many of them have a high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Like his predecessors, Trump is dissatisfied with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gimes, but he has turned his dissatisfaction into practical action. Trump also rarely expresses interest in democracy or human rights, to say nothing of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s or common values. For example, Fontaine and Kliman warn that a wealthy and more globalized China has not become more democratic. Beijing is exporting its narrow values overseas through its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untries that cannot afford to repay its loans can only be politically attached to Beijing and cannot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The countries that benefi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not only less willing to criticize China's domestic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ut are also unwilling to oppose China's foreign policy. Such a scenario has already occurred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2017, the EU failed to pass a joint condemna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due to a veto from Greece, which received a mass influx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its Port of Piraeus.³⁶ But Trump seems to have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sharp power, concerned only with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sulting" and may interfere with global trade. He is unconcerned with the conflict of valu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as can be seen with the current U.S.-China trade war, a dispute of interests instead of values, and unrelated to democracy. Although Trump attempted to prevent Italy from participating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was concerned only over Italy's symbolic significance as a member of the Group of Seven. He also attempted to unite the members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four members of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raditional European allies to form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front against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banning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and ZTE from participating in U.S.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se measures seemed to be an attempt at forming a policy of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by democratic states against autocratic states, but American

³⁶ Fontaine and Kliman, "On China's New Silk Road, Democracy Pays A Toll."

allies have been unwilling to fully cooperate due to their ow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market factors, and even the members of the “Five Eyes Alliance” have been unwilling to completely boycott Huawei. However, more importantly, Trump’s true intention in establishing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front is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This explains why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ed the Clean Network program in August 2020, and wanted to ban Chinese apps deemed a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such as TikTok and WeCha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far more threatening than the Soviet communist revolutions of the past. Moreover, China is now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China from it, much less contain China. In other words, as the main rival to democratic states, China is far trickier to handle than the Soviet Union. Althoug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as called on the world to face the threat of China’s sharp power, the extent to which it can represent Trump’s intentions is a problem.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China’s most powerful opponent, but democratic values are not a priority for Trump, who instead places greater value on economic security, having once publicly emphasized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³⁷ Pompeo’s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speech in July 2020 mark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a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eal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n the basis of “distrust and verify,” and called upon the free world to “change the CCP, otherwise it will surely change us.”³⁸ After th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gnized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ica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ficially regards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propaganda tools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changes can be considered

³⁷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³⁸ 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20,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significant measures against China's sharp power, but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policy document presented to Congress by the White House in May 2020 indicated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not inevitably lead to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nor does it wish to disengage from the Chinese people.³⁹ Thes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olicy statements may be a two-pronged strategy against China, or one of Trump's campaig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light of the high uncertainty in Trump's past polic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provide more guarantees to its allies if it is to call for a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Sharp Power". In addition,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 the end of 2020, the new U.S. President's China policy will still b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contain China. Thus, China's sharp power is tied to the survival of democratic values, but it will not be easy to return to a policy of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in its defense.

IV. Conclusion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mixed security threa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ans,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new typ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but according to the object it intends to affect, the security threat of China's sharp power is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main objective for which China wields sharp power is to seek its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ts means include infiltrating and subverting the target country, enhancing its own positive image, and forcing others to engage in self-censorship to silence unflattering commentary against China.

In the broadest sense, China's sharp power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soft power with the coercive characteristic of hard power, but

³⁹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p. 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packaged within the camouflage of soft power. There is actually only a fine line between China's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Once it crosses the red lines of truthfulness, openness, and coercion, China's hidden coercive intentions will be revealed, and its soft power will transform into sharp power. To a certain extent, both sharp power and soft power are tools, but while soft power can be either benign or malicious, sharp power is vicious and deceptive. If China's sharp power becomes a recognized standard for defining the export of ideological influence from autocracies hereafter, or arouses a sense of crisis within democracies that aligns them collectively against China, then China's sharp power may cause a paradigm shift.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trap effects defin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sharp power. Among the autocracies that export sharp power, China's ambitions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re even more threatening than Russia's. Thus, the concept of sharp power as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can be said to be tailored for the rise of China. The traps of empire als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rive China's sharp power. For example, China cannot avoid the "James Dean trap," is eager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 countries, and even hopes to gain the power to direct discourse. Hence, China wields its self-conceived soft power to silence criticism abroad, and imposes its own wishes or values around the world, but Western society regards it as the output of ideological sharp power due to China's totalitarian regime. Although China believes that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voids the "Thucydides trap," Trump believes in turn that it is "insulting" and may interfere with global trade. In other words, it seem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labeled as sharp power, and scholars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China has exported autocracy to undermine democracy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believes that it has avoided the "Kindleberger trap" and provided public goods for the worl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China often uses this initiative to construct infrastructure that does not meet the needs of host countries, causing them to be saddled with a large amount of debt to China and be beholden to it. This is tantamount to deceptive behavior. In order to silence criticism of debt trap diplomacy,

China continues to pus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mask such policies. Thu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Kindleberger trap” has indirectly driven China into wielding sharp power.

China's sharp power is a “new term” that describes an “old threat.” Similar means were used during the Co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jing, the use of soft power by democracies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may be the real “sharp power,” as soft power may compromise its governance and pierce its authoritarian system. From this perspective, both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are tools in essence, and the crux behind both is actually a conflict of valu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sharp power is tantamount to throwing down the gauntlet to China. However, democratic values are not a priority for Trump. Establishing an information security front against China may resemble a policy of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but Trump is actually prioritizing 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Further verification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tic and autocratic values,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hardline attitude toward China may be a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light of the high uncertainty in Trump's past policies, it is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provide more guarantees to its allies if it is to call for a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Sharp Power.”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 the end of 2020, the new U.S. President's China policy will still b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contain China. Hence, China's sharp power is tied to the survival of democratic values, but it will not be easy to return to a policy of ideological “containment” again.

Bibliography

Book

Nye, Joseph, *The Future of Power* (NY: Public Affairs, 2011).

Cardenal, Juan Pablo,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Book Chapter

Collins, Alan, "What is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9.

Wæver, Ole and Barry Buzan, "After the Return to The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curity Studies,"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93-410.

Journal article

"Forwa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1, Summer 1976, p. 2.

"Sharp Power,"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22, 2017, p. 9.

Buzan, Barr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orl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o. 1, 2010, pp. 113-133.
（[英]巴里·布贊，〈論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架構〉，《世界政治與經濟》，第1期，2010年，頁113-133。）

Liou, Shiau-shyang, "Observation of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teaching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Defense Security Weekly*, No. 70, October 25, 2019, pp. 13-17.（劉蕭翔，〈中國介入昆士蘭大學教學之觀察〉，《國防安全週報》，第70期，2019年10月25日，頁13-17。）

Liou, Shiau-shyang, "On Tanzania's Aboli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greement,"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Immediate Analysis*, No. 10, April 28, 2020, pp. 1-3. (劉蕭翔,〈坦尚尼亞廢除中國「一帶一路」協議評析〉,《國防安全即時評析》,第10期,2020年4月28日,頁1-3。)

Nye, Joseph,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Autumn 1990, pp. 153-171.

Qin, Yaqing,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New Era of China's Diplomacy,"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No. 3, 2018, pp. 1-4. (秦亞青,〈《十九大報告》與中國外交的新時代〉,《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頁1-4。)

Newsletter

"Foreign Think Tanks Kicked Off behind the Scenes to Support 'Occupation'," *Wen Wei Po*, October 2, 2014, p. A11. (〈外國智庫踢爆美幕後支援「佔中」〉,《香港文匯報》,2014年10月2日,頁A11。)

Jiang, Jing-ling, "Nye, the Father of Soft Power, Analyzes the Smart Power of the U.S. and China," *China Times*, November 6, 2017, p. A9. (江靜玲,〈軟實力之父奈伊,剖析美中巧實力〉,《中國時報》,2017年11月6日,頁A9。)

Qin, Yaqing, "Reflections on th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May 27, 2015, p. B05. (秦亞青,〈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的幾點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27日,頁B05。)

Internet Material

"Trump rails against China during dinner with executiv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9,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58869/trump-rails-against-china-during-dinner-executives>.

"Xi Jinping: Decisive victory,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 round way, and winning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7, 2017,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Fontaine, Richard and Daniel Kliman, “On China’s New Silk Road, Democracy Pays A Toll,” *Foreign Policy*, May 1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5/16/on-chinas-new-silk-road-democracy-pays-a-toll/>.
- Gertz, Bill, “CIA Gives More Power to Spies to Bolster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Washington Free Beacon*, July 26, 2017, <https://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cia-gives-power-spies-bolster-intelligence-operations/amp/>.
- Jakhar, Pratik,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growth of China’s controversial cultural branch,” *BBC*, September 7,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9511231>.
- Kaplan, Robert D., “The Trap of Empire and Authoritarian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5,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trap-empire-authoritarianism-24761>.
- Kynge, James, “China’s Ancient Strategies Creat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7,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5975472-ea30-11e7-8713-513b1d7ca85a>.
- Li Ya, “Scholars Analyze US-China Relations. It is Facing Four Traps,” *Voice of America*, July 26, 2018,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relations-and-traps-20180726/4500759.html>. (莉雅，〈學者分析美中關係 正面臨四大陷阱〉，《美國之音》，2018年7月26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hina-relations-and-traps-20180726/4500759.html>。)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p. 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Nye, Joseph, "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4,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soft-and-sharp-power-by-joseph-s--nye-2018-01>.

Nye, Joseph,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4,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Nye, Joseph,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Peng, Nian, "How c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hieve its 'Closer People-to-People Ti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August 31, 2019, <http://www.nanhai.org.cn/info-detail/26/8287.html>. (彭念,〈「一帶一路」如何做到民心相通?〉,中國南海研究院,2019年8月31日, <http://www.nanhai.org.cn/info-detail/26/8287.html>。)

Pompeo, Michael R.,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20,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Rogin, Josh,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are causing alarm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chinas-foreign-influencers-are-causing-alarm-in-washington/2017/12/10/98227264-dc58-11e7-b859-fb0995360725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3d2025f73ac1.

Trump, Donald,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Wu, Yi-jing, "The Father of Soft Power Nye: I Am More Worried about the Rise of Trump than China's Rise," *CommonWealth Magazine*, No. 361, September 12, 2017,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22>. (吳怡靜, 〈「軟實力之父」奈伊：與中國崛起相比，我更擔心川普的崛起〉, 《天下雜誌》, 第361期, 2017年9月12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22>。)

Zheng, Chong-sheng, "Chinese-style Surveillance Goes Out, Big Brother Watches You All Over the World (I)," *Radio Free Asia*, September 17, 2019, <https://reurl.cc/62RA6Z>. (鄭崇生, 〈中國式監控走出去 老大哥全世界看著你(上)〉, 《自由亞洲電臺》, 2019年9月17日, <https://reurl.cc/62RA6Z>。)

撰稿規則

- 一、分節標題：文章之大小標題，
中文請以「壹、一、（一）、1、(1)、a、(a)」為序。
英文請以「I. A. (A) 1. (1) a. (a)」為序。
- 二、引語：原文直接引入文句者，於其前後附加引號；若引言過長，可前後縮排二字节獨立起段，不加引號。若為節錄整段文章，則每段起始空二字。
- 三、簡稱或縮寫：引用之簡稱或縮寫，可依約定俗成之用法；惟於第一次出現時必須使用全稱，並以括號註明欲使用之簡稱（寫）。
- 四、譯名：使用外來語之中文譯名，請盡量用通行之翻譯，並請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稱。
- 五、標點符號：中文標點符號一律以「全形」輸入。引用中文書籍、期刊、雜誌、報紙、網站等名稱，請以《》標記；文章名稱以〈〉標記；外文書籍、期刊、雜誌、報紙、網站等名稱請用斜體字，索引文章名稱加“”標記。
- 六、數字表示：
 - （一）年月日、卷期等數字及頁碼一律以中華民國年份（本國資料）或西元年份（中共資料）及阿拉伯數字表示。
 - （二）屆、次、項等採用國字表示，如：第一屆、第三次、五項決議。
 - （三）整的數字採用阿拉伯數字，如：50 人；但百位以上整數之數字「可以」國字表示者，以國字表示，如：二億三千萬。
 - （四）不完整之餘數、約數以國字表示，如：七十餘件、約三千人。
- 七、附圖、附表：
 - （一）編號採用阿拉伯數字，寫法如：圖 1、圖 2、表 1、表 2，圖 1-1、圖 1-2 等類推。
 - （二）表之標題在該表上方（置中），圖之標題在該圖之下方。
 - （三）圖表的資料來源與說明，請置於圖表的下方（置左）。

註釋體例

- 一、所有引註均須詳註來源。如係轉引非原始資料來源，須予註明，不得逕行錄引。
- 二、簡、繁體字中文書籍，使用相同註釋體例。
- 三、所有注釋置於正文頁腳。
- 四、時間表示：中文註腳內日期，以民國○年○月○日或西元○年○月○日表示；英文以 month day, year 表示。
- 五、出版地的寫法
 - （一）出版地若在美國，要分別列出城市名及州名，州名採縮寫且不加縮寫號。
 - （二）若非美國，則寫出城市名和國名。
 - （三）出版地若為下列主要城市，則不必寫出州名或國名，包括：
 - 臺灣／臺北 (Taipei)；
 - 美國／巴爾的摩 (Baltimore)、波士頓 (Boston)、芝加哥 (Chicago)、洛杉磯 (Los Angeles)、
 - 紐約 (New York)、費城 (Philadelphia)、舊金山 (San Francisco)；
 - 英國／倫敦 (London)；
 - 法國／巴黎 (Paris)；
 - 德國／柏林 (Berlin)、法蘭克福 (Frankfurt)、
 - 慕尼黑 (Munich)；
 - 荷蘭／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義大利／米蘭 (Milan)、羅馬 (Rome)；
 - 奧地利／維也納 (Vienna)；
 - 瑞士／日內瓦 (Geneva)；
 - 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 俄羅斯／莫斯科 (Moscow)；
 - 中國／香港 (Hong Kong)、上海 (Shanghai)、
 - 北京 (Beijing)；
 - 日本／東京 (Tokyo)；
 - 韓國／首爾 (Seoul)；
 - 以色列／耶路撒冷 (Jerusalem)。

六、專書

- (一) 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頁 x-x。（初版無需註明版別）
- (二) 英文書籍：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 (三) 如引用全書時，可註明該書起迄頁數或省略頁數。

範例

陳鴻瑜，《南海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 年），頁 3。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

七、專書譯著

- (一) 中文：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書名》，（書名原文）（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初版無需註明版別）
-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Volume number (if any), p. x or pp. x-x.

範例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 - 全球戰略大思考》，（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 年），頁 67。

Jhumpa Lahiri, *In Other Words*, trans. Ann Goldstei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6), p146.

八、期刊譯著

- (一) 中文：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篇名〉（篇名原文），《刊物名稱》，第 x 卷第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
-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trans. Translat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Journal*, Vol. x, No. x, Month Year, p. x or pp. x-x.

範例

Kelvin Fong 著，王玉麟譯，〈亞太區域潛艦概況〉〈Submarines in the Asia-Pacific〉，《國防譯粹》，第 33 卷第 7 期，2006 年，頁 89-95。

九、專書論文或書籍專章

-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編者（群）姓名，《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 x 或頁 x-x。（初版無
需註明版別）
-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Chapter Title," in Editor/Editors'
full Name(s), ed(s).,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of publication), p. x or pp. x-x.

範例

林正義、歐錫富，〈宏觀 2009 亞太和平觀察〉，林正義、歐錫富
編，《2009 亞太和平觀察》，（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2011 年），頁 3。

Kaocheng Wang, "Bilateralism or Multilateralism? Assessment of
Taiwan Status and Relations with South Pacific," in Ming-Hsien
Wong, ed,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agenda*, (New Taipei City: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

十、學術性期刊論文

（請依個別刊物實際出刊項目，完整臚列）

- (一)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刊物名稱》（出版地），第 x
卷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臺灣出版之期刊無需註
明出版地，但若與其他地區出版期刊名稱相同者，仍需註
明出版地，以利識別）
-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Periodical, Vol. x, No. x, Month Year, p.x or pp. x-x.

範例

汪毓瑋，〈美近公布「威脅評估報告」之評析〉，《展望與探索》，
第 4 卷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92-97。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June 1994, pp. 72-107.

十一、學位論文

- (一) 中文：作者姓名，《學位論文名稱》，學校院或系所博士
或碩士論文（畢業年份），頁 x 或頁 x-x。
-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Dissertation/
Thesis," (Ph.D. Dissertation/Master's Thesis, Name of the
Department, Name of the Degree-granting University, year of

graduation) , p.x or pp. x-x.

馬振坤，《從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剖析中共三次對外戰爭》，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2002），頁 1。

Stacia L. Stinnett, “The Spratly Island Dispute: An Analysis,” (Master’s Thesis,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2000), p.1

十二、研討會論文

（一）中文：作者姓名，〈篇名〉，發表於○○○○研討會（地點：主辦單位，舉辦年月日），頁 x 或頁 x-x。

（二）外文：Author’s full name, “Paper Title,” presented for Complete Titl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of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zer, Date of conference in month day, year), p. x or pp. x-x.

範例

許文堂，〈南沙與西沙 - 他者的觀點〉，發表於「七 0 年代東亞風雲 - 台灣與琉球、釣魚台、南海諸島的歸屬問題」學術研討會（臺北：台灣教授學會，2013 年 10 月 27 日），頁 1。

Wen-cheng Lin, “Cross-strait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presented for Compar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Taiwan Strait Conference (Stockhol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December 16-17, 2005), p.1.

十三、官方文件

（請依個別刊物實際出刊項目，完整臚列）

（一）中文：官署機構，〈文件名稱〉（行政命令類）或《文件名稱》（法律類），卷期（案號），日期，頁 x 或頁 x-x。

（二）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範例

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令〉，《總統府公報》，第 7426 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頁 3。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p.1.

十四、報刊、非學術性雜誌

（若為社論、短評、通訊稿或作者匿名，則可不列作者欄）

（一）中文報紙：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出版地），

年月日，版 x。（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省略作者和篇名，臺灣出版之報紙無須註明出版地。）

（二）中文雜誌：作者姓名，〈篇名〉，《雜誌名稱》（出版地），年月日，頁 x 或頁 x-x。（無須註明第卷第 x 期。臺灣出版雜誌無須註明出版地）

（三）英文報紙：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Newspaper*,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四）英文雜誌：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Magazine*, Date, Page x or pp. x-x.

範例

張晏彰，〈臺美夥伴關係 印太安定力量〉，《青年日報》，2019 年 6 月 19 日，版 3。

陳文樹，〈澎湖空軍基地的設立和演進〉，《中華民國的空軍》，2019 年 6 月 12 日，頁 21。

Jason Pan, "Defense think tank inaugurated," *Taipei Times*, May 2, 2018, p.3.

Office of Defense Studies, "Commentary: 2012 Pentagon Report on Mainland China's Military Development," *Defense Security Brief*, July 2012, p.9.

十五、網際網路資料

（一）請依照個別線上網站實際資訊，詳細臚列。

（二）引用網路版報紙的一般報導，無須註明版次，但須附上網址，其餘體例不變。

（三）引用電子報紙雜誌評論文章，或電子學術期刊論文，在頁碼後面註明網址，其餘體例不變，無頁碼者得省略之。

（四）直接引用機構網站的內容，請註明文章標題、機構名稱，日期與網址。

（五）中文：

1. 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網站名稱》，網址。

2. 論文：作者姓名，〈篇名〉，《刊物名稱》，第 x 卷第 x 期，年月，頁 x 或頁 x-x，《網站名稱》，網址。

3. 官方文件：官署機構，〈文件名稱〉（行政命令類）或《文件名稱》（法律類），卷期（案號），日期，頁 x 或頁 x-x，《網站名稱》，網址。

4. 報導：作者姓名，〈篇名〉，《媒體名稱》，日期，網址。
範例

王業立編，《臺灣民主之反思與前瞻》（臺北市：臺灣民主基金會，2016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download/book20160830.pdf>。

舒孝煌，〈美陸戰隊 F-35B 前進遠征與輕型航艦部署〉，《國防情勢月報》，143 期，2019 年 5 月，頁 36，《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Download/%E5%9C%8B%E9%98%B2%E6%83%85%E5%8B%A2%E6%9C%88%E5%A0%B1-143.pdf>。

中華民國國防部，《106 年國防報告書》，2017 年 12 月，頁 1，《中華民國國防部》，<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歷年國防報告書網頁專區/歷年國防報告書專區.files/國防報告書-106/國防報告書-106-中文.pdf>。

游凱翔，〈國防安全研究院掛牌 唯一國家級國防智庫〉，《中央社》，2018 年 5 月 1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1805010122.aspx>。

（六）外文：

1. 專書：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 x or pp. x-x, URL.

2. 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Periodical*, Vol. x, No. x, Date, p.x or pp. x-x, URL.

3. 官方文件：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URL.

4. 報導：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Media*, Month Day, Year, URL.

範例

Robert D.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19), p. 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cfrd8-files.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SR%2084_Blackwill_Trump_0.pdf.

Ralph A. Cossa, "Regional Overview: CVID, WMD, and Elections Galor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Quarterly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Vol. 6, No. 1, April

2004, p.1, Pacific Forum, <http://cc.pacforum.org/2004/04/cvid-wmd-elections-galor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p.1,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Colin Clark, “Mattis’ Defense Strategy Raises China To Top Threat: Allies Feature Prominently,” *Breaking Defense*, January 18, 2018,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18/01/mattis-military-strategy-raises-china-to-top-threat-allies-feature-prominently>.

十六、第二次引註之格式

首次引註須註明完整之資料來源（如前述各案例），第二次以後之引註可採以下任一格式：

- （一）作者姓名，《書刊名稱》或〈篇名〉，或特別註明之「簡稱」，頁 x-x。
- （二）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單一作品，可簡略為——作者，前引書（或前引文），頁 x 或頁 x-x。
- （三）某一註解再次被引述，簡略為——同註 x，頁 x 或 x-x。
- （四）英文資料第二次引註原則相同：op. cit., p.x or pp. x-x（前引書，頁 x 或頁 x-x。）
- （五）Ibid. p.x or pp. x-x.（同前註，頁 x 或頁 x-x。）

十七、文末之參考文獻

- （一）參考文獻原則上與第一次引述的註釋體例格式相同，惟書籍、研討會論文及博碩士論文無須註明頁數。
- （二）所有文獻依前述註釋類別排列，並依中文、英文、其他語文先後排序。
- （三）中文著作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英文著作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 （四）將書籍專章列為參考書目時，依專章作者排序。
- （五）翻譯作品依翻譯語文類別，中文譯作按譯者姓氏筆畫排序，英文譯作按原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 （六）同一作者有多篇著作被引用時，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序。
- （七）每一書目均採第一行凸排 2 字元。